

# 新疆

## 反对 民族 分裂 主义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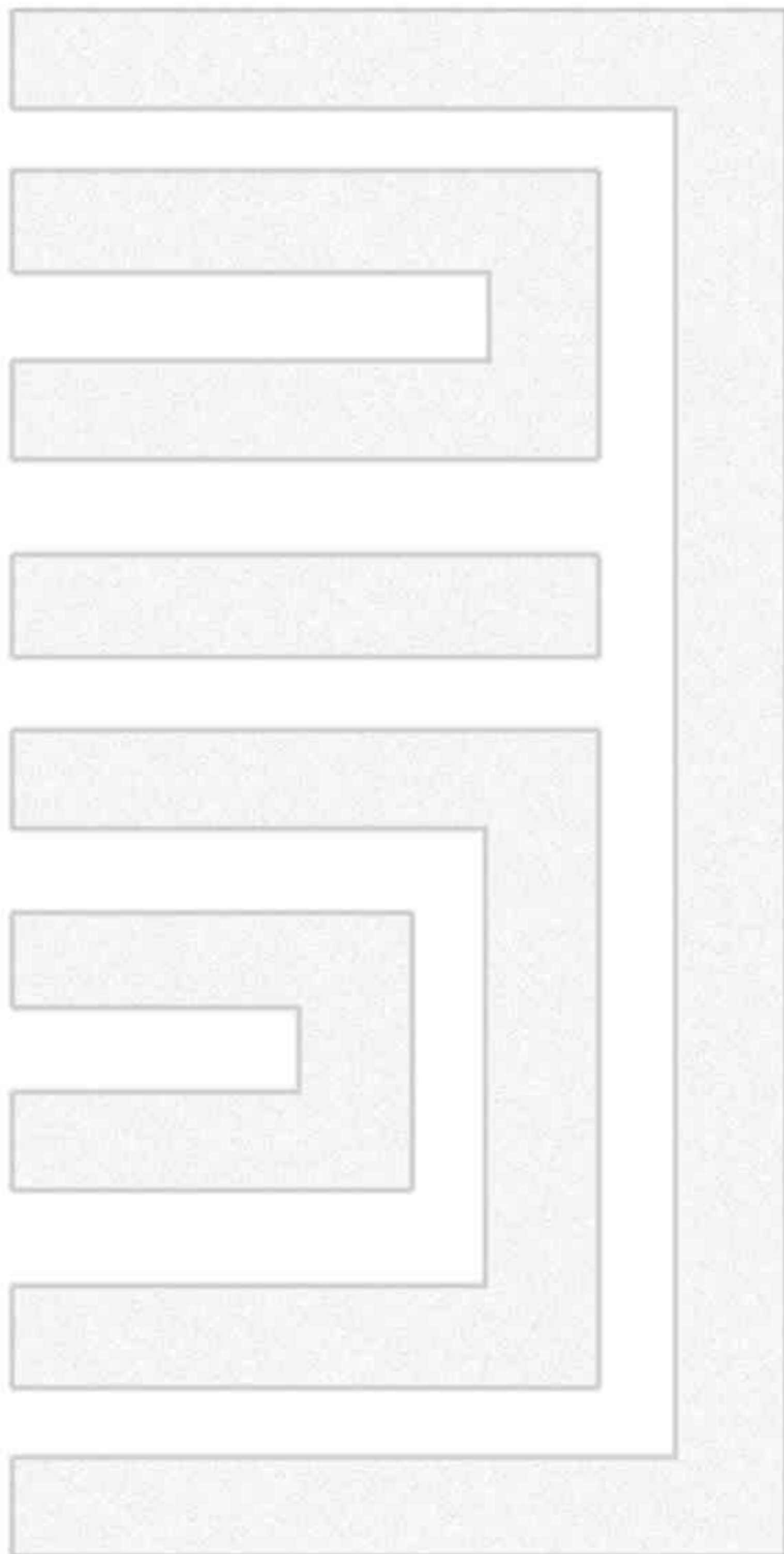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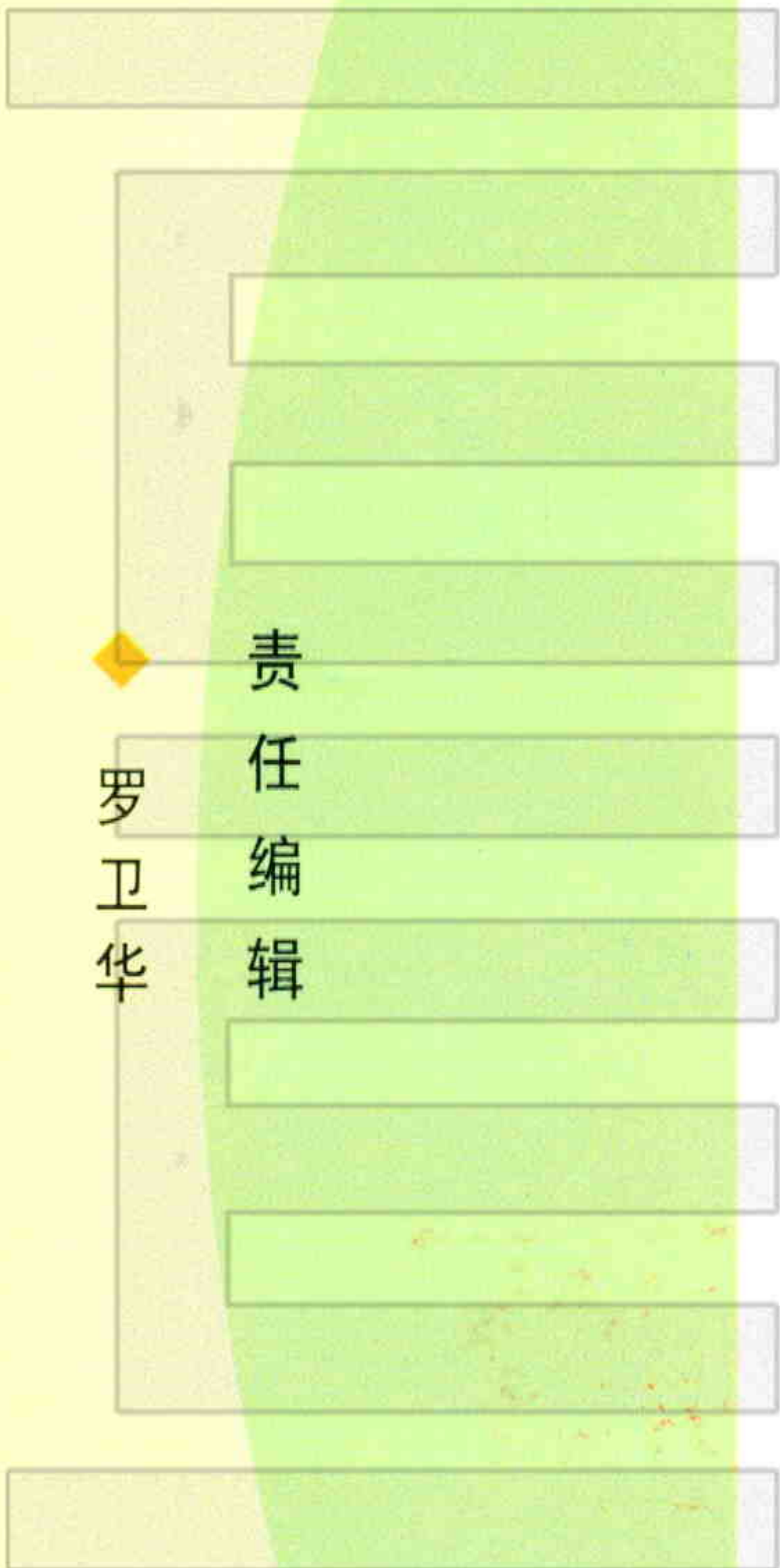
XIN JIANG  
FAN DUI MIN ZU  
FEN LIE ZHU YI  
DOU ZHENG SHI HUA

# 斗争史话

◆ 新疆人民出版社

罗  
卫  
华

责  
任  
编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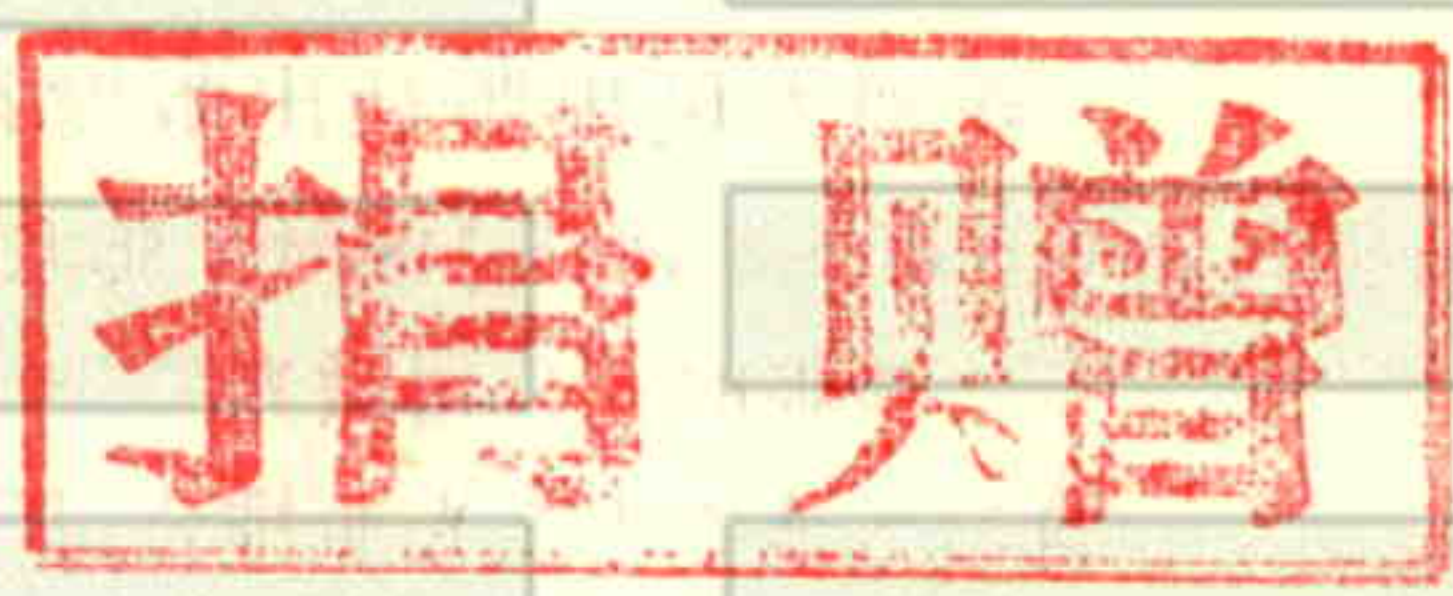


# 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斗争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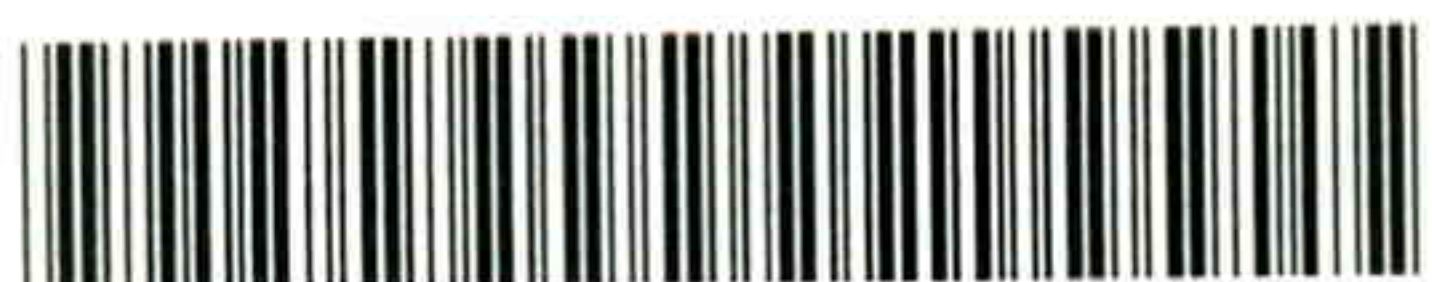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主 编 徐玉圻

副主编 陈奕善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7500

责任编辑：罗卫华

责任校对：李玉新 赵 珍

## 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史话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时通公司激光照排

自治区地方志激光照排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10千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册

ISBN 7-228-05108-4/D·555

定价：12.00元

## 前 言

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这不仅关系到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关系到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历史证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兴旺发达、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反之,如果发生分裂和动乱,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要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

民族分裂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国家内的一种极端表现,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以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为目的的一种反动思潮和反动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民族分裂主义就在新疆地区进行分裂活动,即使新疆解放后,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对新疆的分裂、颠覆活动也从未停止过。虽然他们的罪恶活动一出现就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并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后盾面前和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威慑、打

击下,一再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他们决不会善罢甘休,一旦有机可乘,又跳将出来,进行破坏、捣乱。80年代以来,国内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再度活跃,他们积极配合西方敌对势力针对我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和一些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遥相呼应,企图在新疆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搅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分裂主义阴谋破坏活动的主要手段有:宣扬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反动思想;篡改新疆历史,歪曲新疆地区与祖国的关系;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对立,制造民族纠纷,鼓动反汉排汉;煽动宗教狂热,号召进行“圣战”;培植反动骨干,建立反动组织;制造动乱,甚至策划、组织武装暴乱,进行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在新疆各种危及社会稳定的因素中,民族分裂主义是危害社会稳定最重要、最危险的因素,也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危害最大的因素,因而,它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

我们同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一定范围内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推动民族进步与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阻碍民族发展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核心仍然是政权问题。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分裂活动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

力策动的，民族分裂活动从来都是外国侵略势力割取我国边疆领土的内应力量。他们既背叛了祖国，也出卖了自己的民族，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帝国主义和外国敌对势力为了侵略、分裂我国，总是要千方百计培植、利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为其代理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破坏祖国统一、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目的，也要寻找外国侵略势力作为靠山，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所以，民族分裂主义和外国侵略势力历来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

民族分裂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国际上存在敌对势力，国内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他们的分裂活动就不可能消失，我们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斗争也不会止息。因此，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有时也是很激烈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认识，保持高度警惕，不可有丝毫麻痹大意。江泽民同志在视察新疆工作时强调指出：“全区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不管来自哪个民族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必须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而义不容辞。只要是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活动，不管是什么人搞的，不管策划和参与这种活动的人是哪个民族的，大家都要团结起来，坚决加以反对，依法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有半点含糊，不能有任何退让。这也是对全区各级干部的重要考验。领导干部不仅

自己要旗帜鲜明,而且要充分发动和组织各族群众,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宁,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是新疆反侵略、反分裂斗争的主力军。在反侵略、反分裂斗争中,各族人民相互支持,团结对敌,生死与共,在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进程中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光辉篇章。我们要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伟大旗帜,发扬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分裂的光荣历史传统,坚持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增强军政、军民团结,进一步做好维护新疆稳定的各项工作,为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和民族进步,为把一个安定团结、蓬勃发展的新疆带入 21 世纪而努力奋斗。

编者

1999 年 2 月



## 目 录

前 言 .....	(1)
一、1840年—1932年新疆的反侵略、反分裂斗争 .....	(1)
二、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覆灭 .....	(30)
三、三区革命时期三区内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 .....	(48)
四、新疆解放初期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 .....	(62)
五、50年代和田人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 .....	(72)
六、“文革”期间“东突党”的出笼与覆灭 .....	(94)
七、80年代新疆各族人民反对暴乱、动乱的斗争 .....	(102)
八、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	(114)
九、平息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 .....	(129)
十、阿克苏地区各族人民粉碎民族分裂主义制造的系列案件 .....	(152)
十一、破获喀什“5·12”凶杀案 .....	(168)
十二、平定伊宁“2·5”打砸抢骚乱事件 .....	(177)
后 记 .....	(191)

## 一、1840—1932 年新疆的反侵略、反分裂斗争

清朝初年,从 1667 年康熙主政起,即积极致力于统一大业,到乾隆年间,18 世纪 50 年代后期,清军先后平定了天山南北分裂势力的叛乱,设伊犁将军府,直接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1884 年新疆建省后,新疆地方政权与内地完全一致,实行郡县制,清王朝在新疆委派官吏,驻扎军队,征收赋税,新疆和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清王朝直接统治新疆的一百五十多年中,新疆发生较大规模的分裂、动乱和外敌入侵有 5 次,前四次即和卓后裔张格尔、玉素甫、“七和卓”、倭里罕等人的作乱,都是在浩罕的支持并参与下进行的;后一次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先是各族群众发动的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由于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继之而起的是篡夺了各地起义领导权的封建宗教头目之间的混战,最后导致浩罕军官阿古柏和沙俄的军事入侵。每一次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都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员大量死亡,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近代外敌的入侵,造成了中国西北边疆的严重危机,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但是上述5次分裂、动乱或外敌入侵,从时间上讲,总共不到20年,稳定和发展仍是清朝统治新疆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新疆各族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始终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分裂的斗争更是势不可当,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而现实又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回首近两个世纪新疆各族军民反侵略、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从中汲取可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维护当今新疆的安定团结局面,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不无裨益。

### **(一) 新疆各族人民反对沙俄入侵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国力比战前更加衰弱,为了支付战争赔款,竟不顾西北边陲的安危,采取了缩减新疆军费、裁撤伊犁镇总兵军事机构的错误措施,使侵略成性的沙俄有机可乘,加紧了对中国新疆的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沙皇俄国对新疆的入侵主要采取蚕食领土和经济侵略两种方式。

沙俄蚕食中国领土主要采用堡垒推进的方式。先是起用小股哥萨克军队非法占领我国领土的重要据点,建立军事堡垒;接着在堡垒附近实行武装移民,巩固入侵基地并准备继续入侵的条件;然后将这些据点用公路连接

起来,形成分割我国领土的堡垒线,待条件成熟以后,又将堡垒线向前推进,侵占我国更多的领土。至19世纪50年代,沙俄用这种蚕食方式强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

沙俄的经济侵略异常猖獗。1851年,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清王朝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通过这一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新疆攫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章程》规定,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派驻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即俄国领事在中国新疆享有按照其本国法律对其本国侨民行使司法管辖权的特权。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章程》规定:“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sup>①</sup>这个通商免税的规定,实际上只对俄国单方面有利,因为当时主要是俄国向中国倾销商品,所以这一规定不仅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且为俄国向中国新疆大量倾销商品大开了方便之门。《章程》还规定,俄国商人可以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建立贸易圈,即可以买地盖房,修建住所和经营场所,并逐渐排斥中国主权在贸易圈内的行使。

《章程》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是近代新疆地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不仅巩固了沙俄的侵略事实,并使沙俄在新疆地区的中俄贸易中牟取了巨额暴利。

<sup>①</sup> 《新疆简史》第二册,第2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尽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使沙俄的侵略行径一再得逞,但富有斗争精神的新疆各族人民对沙俄的入侵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1850年4月,入侵我国托乌楚别克的沙俄侵略军,被四千余名中国哈萨克族牧民包围,哈萨克族牧民在柯尔克孜族牧民的配合下,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1855年,沙俄侵略军由古尔班阿里玛图向西进犯,我国柯尔克孜族牧民予以迎头痛击,侵略军被迫撤回伊犁河。1856年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牧民再次联合出击,袭击了大小阿拉木图哥萨克村。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人民的抗俄斗争显示了新疆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精神。

1855年2月,沙俄为了霸占塔城雅尔噶图金矿,指使其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率武装士兵两百余人强行驱散雅尔图的中国矿工,随后又接连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共杀害中国矿工两百余人。事发后,塔城矿工在徐天尧、安玉贤等人率领下向专管塔城通商事务的章京萨碧屯控诉沙俄罪行,由于萨碧屯拒绝受理,代表们又向参赞大臣英秀申诉,亦遭拒绝。塔城各族人民义愤填膺,为捍卫祖国的神圣主权,焚烧了沙俄贸易圈,将沙俄在贸易圈里的51间栈房、住房及囤积的货物全部焚烧殆尽。塔塔林诺夫和俄国奸商如丧家之犬,狼狈逃回巴克图,这就是焚烧沙俄贸易圈事件。然而腐朽的清王朝竟屈服于沙俄的淫威,赔偿对方的所谓损失,将英秀、萨碧屯免职,安玉贤被杀害,徐天尧被判刑充军。清王朝以扑灭人民的反抗怒

火向侵略者献媚,但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犹如日月经天,永垂史册。焚烧沙俄贸易圈这一壮举与同时发生在新疆其他地区的抗俄斗争汇合在一起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 (二)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和卓余孽的分裂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的新疆不仅面临着沙俄武装入侵的严重危机,而且还遭受到和卓后裔复辟势力叛乱的频频骚扰。和卓是阿拉伯词汇的音译,意为“圣裔”,即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实际上多数和卓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头面人物的自我标榜,借以维护自身的统治。清王朝统一新疆初期曾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和卓后裔遂逃亡中亚封建王国浩罕,并借助浩罕封建主的力量,不断入侵骚扰,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恢复他们对新疆的反动封建统治。1830年玉素甫和卓的叛乱平定后,新疆保持了十余年的平静,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力的衰弱、边防的懈怠,和卓势力在浩罕的支持下再度掀起新疆的动乱。

1847年以和卓后裔迈买的明、倭里罕为首的七和卓,纠集上千名匪徒,在浩罕商人奈迈提的策应下围攻喀什噶尔回城得手,进而围攻英吉沙尔。清廷派陕甘总督布彦泰率军平叛,和卓武装放弃喀什噶尔回城,劫掠大批财物逃亡,这就是“七和卓之乱”。

此后在 1852 年 6 月至 8 月,铁完库里、倭里罕等四次作乱。1855 年发生玉散霍卓依善和卓的叛乱。1857 年的“倭里罕之乱”规模更大。是年 6 月,倭里罕勾结阿斯图阿尔图什庄(今阿图什县)的斜黑阿訇密尔爱玛提发动暴乱,在四五千浩罕商人协助下一度攻入喀什噶尔回城,并水淹火攻汉城,又分兵东袭巴尔楚克,围攻叶尔羌,气焰极为嚣张。1857 年 9 月,清军先后由伊犁、乌鲁木齐、喀喇沙尔等地聚集五千余名兵力全力平叛。倭里罕不敌,竟裹胁一万五千余人,劫掠骆驼驮子一千余峰和四十余匹马驮子装着抢走的财物逃往浩罕。

和卓后裔余孽的叛乱给新疆尤其是南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 1847 年的“七和卓之乱”中,和卓武装攻入回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的汉族商人,抢掠他们的货物,占有他们的妻女”<sup>①</sup>。在叛乱期间单是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两处受和卓胁迫迁往浩罕的各族人民就有三万七千余人,许多人在迁往浩罕的途中冻、饿毙命,而和卓们则在战乱中大发横财,仅迈买的明一人就掠夺了大约十六峰骆驼的银子。倭里罕和卓特别强化宗教统治,禁止不戴面纱的妇女上街,违者割其头发并处鞭笞。所有 6 岁以上的男性都得缠头,每天必须到清真寺做 5 次礼拜,违者则处以重刑。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因为违反这些规定而被杀害的。倭里罕喜爱的消遣之一就是

<sup>①</sup>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 36 页。

亲手砍掉冒犯者的头颅。“在专制者面前的一个不慎的动作,一句话,一个呵欠,都足以导致死亡”<sup>①</sup>。据说被倭里罕杀死的无辜者的人头,曾堆积起了四堆高达两丈四尺的人头塔。

对和卓后裔们的暴行,新疆各族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在历次平叛中,清军各族官兵浴血奋战,奋勇杀敌,功不可没,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与感人事迹。1855年玉散霍卓依善和卓在发动叛乱之前,派人去阿斯图阿尔图什庄联络,妄想取得当地人民的支持。该庄什户长爱孜木表面答应能凑集二万人和三百多名枪手,并给玉散霍卓依善和卓送了杏子、茶叶等礼物,双方还约定了集合人员的时间和地点。7月的一天,伊善和卓等十三名匪徒持械潜入卡伦,于日落到达阿斯图阿尔图什庄,找到玉孜巴什(即百户长)迈买提库完沙、哈斯木二人家中,许多维吾尔族群众闻讯前来“问候”。叛匪们得意忘形,毫无警觉,遂被爱孜木所率领的维吾尔族群众全部捕获,一举消灭了这伙叛匪。

同年,铁完库里和倭里罕的作乱亦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痛击。塔什密里克庄五品阿奇木伯克、世袭公爵花翎迈买特热衣木沙率领维吾尔族人民固守卡伦,痛斥叛徒的多次诱降,并为清军侦探敌情,部署防御,率领马队打仗杀敌,表现十分英勇。

<sup>①</sup>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45页。



倭里罕作乱,叛军骚扰英吉沙尔,正在叶尔羌的前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胡达巴尔底立即请命带兵前往英吉沙尔作战,与维吾尔族群众一起抗击敌军,表现了誓为祖国统一而战的精神。

尔后,倭里罕又重点进攻南疆政治中心叶尔羌。保卫叶尔羌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阿奇木伯克阿克拉依都组织维吾尔族人民防守险要,同时在城内巡防,清除内奸。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亦注意顾全大局,安抚各族群众,晓以民族大义,巩固了回城。在叛军进扰时,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同时联合住在城内的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印度等外国商人组织的骑兵,利用他们对叛军暴行的不满共同对付倭里罕,为保卫叶尔羌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上述平定和卓叛乱中,新疆各族人民对清军的有力支援是不容忽视的,其实早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新疆各族人民始终站在平叛清军一边,为了保证平叛军队的粮食供应,各地维吾尔族群众更是出物出力,动人事迹处处可见。驻阿克苏数万清军的粮食,主要是从乌鲁木齐和伊犁运送。乌鲁木齐距阿克苏近千公里,沿途设32个转运站,要在这么远的路程中转运数百万公斤粮食,在畜驮人拉的当时,确非易事,为此,仅库车一地维吾尔族群众就出动一千余人,捐助车200辆、马500匹、牛1500头、驴1000头参加运粮。从伊犁运粮至阿克苏,路程虽比乌鲁木齐略短,但中间必须翻越天山,特别是自噶克察

哈尔海至塔木哈塔什一段道路,约有七十余公里终年冰雪覆盖,山高路险,驼马难行。为此,维吾尔族群众出动2 000人,每人每次背粮25公斤,冒雪踏冰,翻越冰达坂,硬是把数百万公斤粮食背运过天山,其艰苦状况可想而知。维吾尔族群众为捍卫祖国神圣领土,不畏艰险,历经苦难,功不可没!在上面我们讲到的平叛战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禀承了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的优良传统,配合清军积极平叛,浴血奋战的动人事例不胜枚举。

从和卓后裔的历次叛乱及其覆灭的下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和卓们惯于打着宗教的旗号迷惑群众,但是热爱祖国的新疆各族人民终能识破他们的阴谋,看清他们妄图破坏祖国统一的丑恶嘴脸,并与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平叛斗争的胜利,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但是清王朝对和卓之乱的善后工作做得并不得力,吏治混乱亦未改观,这些都为后来的混乱埋下了隐患,新疆各族人民在后来的岁月面临更加严峻的反分裂、反侵略斗争的考验。

### (三)新疆各族人民反对浩罕阿古柏的入侵

清王朝自1759年统一新疆后,曾经为新疆的发展稳定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在一些方面出现了较大失误,这些失误给国外侵略者和国内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具体表现在:

(1)政治制度上采取军府制下的伯克制,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新疆的封建农奴制。这些维吾尔族伯克依仗官府权势,霸占土地和水利,残酷压榨和剥削农民,残害百姓,无恶不作,暴虐甚于官府,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2)清王朝对新疆只重守边,不重经济发展,使新疆经济发展缓慢。如嘉庆帝时,一位疆臣想开办铅厂以增加新疆税收,竟遭嘉庆帝怒斥,他说:“新疆重任,以守成为本,切勿存见讨好之念。”<sup>①</sup> 长期维护新疆旧的经济体制,不图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新疆的动荡。

(3)清王朝在吏治上亦出现失误。选拔赴疆的官员自嘉庆开始就每况愈下,正如那彦成所指出:“大臣又伪手阿奇木伯克厚敛于民。”<sup>②</sup> 官吏如此腐败,政局当然难保稳定。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对和卓后裔的叛乱与分裂活动熟视无睹,对新疆的稳定与统一居然持异常消极的态度,在治国方略上既不能触动原有积弊,又不能推陈出新,改弦易张,终于导致了19世纪60年代后在新疆绵延数十年的大动荡。

19世纪中期以来,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陕甘回民起义的浪潮也波及新疆,同时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剥削日益导致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在这一形势下,1864年新疆爆发了大

<sup>①</sup> 《清仁宗实录》卷305。

<sup>②</sup> 《那文毅公奏议》卷77,《新疆图志》卷22。

起义。

率先举起起义大旗的是库车人民。1864年库车一批农民不堪忍受繁重的徭役，在托乎提尼牙孜哈里等人带领下，在库车渭干河水利工地揭竿而起，杀死了监督徭役的2名官吏及15名维吾尔族伯克，起义农民迅速向库车城内挺进，城外的维吾尔、汉、回族群众纷纷响应。6月6日，起义农民攻入库车城，杀死办事大臣萨灵阿等清朝官吏和以阿奇木伯克库尔班为首的大小伯克，控制了库车城乡，动摇了清王朝在南疆的统治。

与此同时，乌鲁木齐南山回民起义，攻占达坂城。7月15日，回族阿訇妥明联合乌鲁木齐绿营署理中军提标参将索焕章，趁清军南援库车之机攻占乌鲁木齐汉城，紧接着昌吉、绥来（今玛纳斯）、木垒、呼图壁等地回民相继起义。

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中心伊犁亦爆发了回族、维吾尔族群众起义，起义军打出“官逼民反”的旗号，1866年3月8日，起义军攻占了惠远城，已被革职的伊犁将军常清被俘，伊犁九城尽入起义军之手。至此，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已是风雨摇曳，朝不保夕。

新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的是腐朽的封建统治，他们既反对腐朽的清王朝，也反对贪婪的各族封建权贵，因此，起义军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起义迅速地被混入起义军内部的封建宗教贵族引入了歧路，胜利果实

亦完全被篡夺。这些封建权贵别有用心地将起义之初的尖锐阶级矛盾逐渐转化为民族矛盾,利用宗教大搞民族仇杀,制造混乱,他们的倒行逆施遭到各族富于正义感的人士和群众的反对。

然而由于封建权贵们已完全掌握了各支起义军的领导权,各个封建割据政权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政权,互相攻伐,互不相让,新疆形势一片混乱,各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有人为了扩张势力不惜引狼入室,勾引外敌入侵新疆,使新疆各族人民陷入浩罕军官阿古柏的血腥统治之中。

浩罕是由中亚乌孜别克封建主建立的一个封建汗国,曾与清王朝有藩属关系,到19世纪中期发展成为中亚的一个强国。19世纪以来浩罕一直是我国新疆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或直接派兵入侵,或支持和卓后裔作乱,而1864年全疆大起义又为其提供了一次插手新疆的契机。当时割据喀什噶尔的司的克为了对抗其他政权,欲从浩罕处引入和卓后裔布素鲁克,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他派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前往浩罕游说,浩罕随即派其军队司令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从而开始了为期十年的阿古柏匪徒入侵之乱。

1865年1月,阿古柏进入南疆,利用南疆割据势力各自为政的局面,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将南疆全部纳入手中,随后又兵指吐鲁番,最后击败清真王妥明,占领了乌鲁木齐,近大半个

新疆沦入阿古柏之手,随后拼凑了所谓“哲德沙尔”伪政权。

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打击阿古柏侵略者,新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使侵略者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在喀什噶尔遭到了柯尔克孜族人民的顽强阻击,阻击虽不幸失败,但揭开了抗击阿古柏入侵的序幕。接着阿古柏勾结叶尔羌割据势力阿奇木伯克尼牙斯进攻叶尔羌,当地人民群起反抗,人们高喊“杀死安集延人”的口号奋力作战,阿古柏匪军惨败逃回喀什噶尔。<sup>①</sup>可惜由于叶尔羌回民军忙于围攻汉城没有如期响应配合,革命军队在罕阿里克(今疏勒县东南)被入侵者击败,但是紧接着库车军又重整军力与入侵军决一死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阿古柏险些丧命,只是由于库车方面的指挥不力而得以逃脱。阿古柏攻取喀什噶尔汉城时,虽出现了绿营管带何步云这样的投降者,但大多数守城清军浴血奋战,用生命抗击入侵者,还有许多清军同参赞大臣奎英等各族官员自杀尽忠,表现出了高风亮节。

是年秋季,阿古柏收罗了被俄军击败的一批残兵七千余人,加上早年亡命浩罕的南疆维吾尔宗教贵族农奴主的后裔如倭里罕和卓等残兵败将,自以为增加了侵略

<sup>①</sup> 当时南疆人习惯于将乌孜别克人或中亚一带人,统称为安集延人。中亚人则习惯于将我南疆人或维吾尔人泛称为喀什噶尔人。

本钱,其侵略欲望顿时膨胀起来,妄图在异国之边建立自己的“乐园”。阿古柏发动了第二次入侵叶尔羌战争,遭到回族义军、柯尔克孜族人民的联合反击,阿古柏再次陷入绝境,只是由于各派力量不能协调,才使其得以逃回喀什噶尔。1866年6月,阿古柏第三次入侵叶尔羌,遭到库车与叶尔羌回军的联合反击,但由于伊斯喀布尔上层分子的背叛,叶尔羌人民的抗击惨遭失败。1866年12月,阿古柏入侵和田,和田人民拼死抵抗,妇女都参加了战斗,整整坚持了一个多月,五万多和田军民为反击阿古柏入侵壮烈牺牲。1867年,阿古柏在库车同样遭到了当地人民的拼死抵抗,损失惨重,攻入库车城后城内居民坚持巷战,打死了阿古柏的儿子胡达·胡里·伯克。

1870年,吐鲁番城被围半年,城内军民殊死搏斗,宁死不屈,最后在叛徒马仲、马人得父子的指引下,阿古柏付出3.3万人的代价才攻占了吐鲁番。在乌鲁木齐,阿古柏同样遭到各族人民的迎头痛击,妥明组织当地兵力6万、玛纳斯兵力4万御敌,战斗在五处同时进行,给阿古柏入侵匪徒以重大杀伤。阿古柏恼羞成怒,破城后对各族人民残酷屠杀,下令见中国人就杀,小孩、俘虏一个不留。妥明被这种屠杀吓破了胆,竟将各族军民弃之不顾,于11月下旬开城投降。阿古柏派马仲为乌鲁木齐伪阿奇木,又派兵袭取绥来,而此后徐学功等汉族民团与回民义军、群众摒弃前嫌,联合反攻乌鲁木齐,一度取得胜利并擒获伪头目马仲。这一事实又一次证明,面对外敌

入侵,新疆各族人民总是把民族大义放在第一位的。

#### (四)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占伊犁的斗争

沙俄于1864年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我国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其中包括占伊犁地区4/5的伊犁西路,这样伊犁地区仅存九城及周围的屯田区。即便如此,沙俄仍不甘心,还企图吞并伊犁全境。

同时沙俄与英帝国主义在中亚的争夺趋于白热化。英国利用其在土耳其、阿富汗的优势向入侵新疆并建立伪“哲德沙尔”政权的浩罕军官阿古柏施加影响,使其几乎成为一个亲英政权,这样在南疆英国占有优势。然而使俄国更为不安的是,阿古柏不断北窜,大有吞并伊犁之势,因此沙俄迫不及待地企图侵占伊犁,以便保持其与英国殖民统治对抗的平衡。

伊犁各族人民顽强反击沙俄对伊犁的侵略。首先表现在伊犁艾拉汗政权拒绝承认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于是沙俄开始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积极准备入侵伊犁。

1870年6月,5名俄国武装分子非法闯入伊犁特克斯地区寻衅,被击毙1人,俘获3人,俄方立即提出通牒,随即沙俄出动大军占领了伊犁南部战略通道之一——穆扎尔特达坂,拉开了入侵伊犁的序幕。此后沙俄调兵遣将,积极备战,除大量增兵外,还大肆进行军事间谍活动,



不断找借口挑衅滋事。1871年春,原属中国的哈萨克阿勒班部落的首领塔扎别克率众在沙俄新占领区起兵反抗沙俄殖民统治失败后,带一千余户牧民投奔中国。此后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族牧民因不满沙俄残暴统治,也陆续逃往伊犁。于是,沙俄以此为借口对我国伊犁地区进行武装入侵。

沙俄的蛮横无理激怒了中国人民,各族人民积极备战,准备迎头痛击入侵的沙俄军队。5月15日,沙俄开始大规模入侵伊犁,首先出动一个步兵连,90名哥萨克军人,携2门大炮进犯霍尔果斯口岸,伊犁军民退守麻札尔,同时切断河流供水,使入侵敌人干渴异常,狼狈不堪。19日,抗俄军民英勇出击迎敌,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冲锋,终因武器陈旧落后而失利,俄军随即占领麻札尔。中国军民坚壁清野,阻截敌军供给,使俄军难以维系,被迫撤退,途中受到中国军民的不断狙击,西线战事暂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俄军从克特缅山入侵,把战火燃到了伊犁南路。在克特缅山口,中国军民顽强抗击,并从侧面包抄,战斗持续了一天,但在俄军优势炮火下损失惨重,难以坚持,不得不后撤。6月9日,克特缅村陷落。6月11日,中国军民得到增援后分三路反击俄军,与俄军多次展开白刃肉搏,在俄军猛烈密集的炮火下,中国各族军民不畏牺牲,前仆后继。由于兵力不足,“许多年迈的老人和少年儿童”也都挥戈上阵,投入战斗。

当中国军民被吸引在南线时,俄军暗地里把大量援军调往北线,由远征军司令郭尔帕科夫斯基率领,准备最后攻取伊犁。伊犁军民在清水河子、绥定(今霍城县城)等处加强了防御,并迫使艾拉汗6月27日正式向俄军宣战。6月28日,俄军对霍尔果斯河防御阵地发动猛攻,中国军民依托城堡,骑兵两翼展开,奋勇抗击,激战一天,城堡失守。7月1日,俄军进犯绥定,该城回民贵族开城投降,紧接着艾拉汗被侵略者吓破了胆,于7月2日投降,伊犁各族人民的抗战就这样被无耻地出卖了。

尽管伊犁抗战失败了,但在50天的抵抗中,中国各族军民面对装备精良的侵略者,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使侵略者每迈出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伊犁各族军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新疆近代反侵略的壮丽篇章。

俄军占领伊犁后,进而企图侵犯乌鲁木齐,并多次进犯绥来等地,受到徐学功等汉族民团与回族义军的联合打击,损失惨重,其计划被迫搁浅,伊犁九城7万平方公里土地遂沦入沙俄殖民统治之下。

## (五)清王朝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收复新疆

### 1. 入侵之敌对新疆人民的残暴统治

无论是浩罕阿古柏匪徒还是沙俄入侵者,他们为了维护殖民统治,无不采取极为残酷的手段奴役人民。

阿古柏匪徒统治新疆的支柱是军队与封建宗教。阿古柏在其南疆占领区实行一种名谓“苏玉尔阿列”的军事封建采邑制,把侵占的土地分封给军队管理,而采邑内的各族人民则沦为农奴,被迫忍受着各种非人的剥削和压迫,各族人民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果实被剥夺,同时还要承担繁重的无偿劳役,把原先满族官僚拥有的土地和汉族移民开垦的土地当作私产重复出售,敲诈勒索,当地人民怒斥阿古柏“将七层地皮都卖完了”<sup>①</sup>。另一方面,阿古柏自称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sup>②</sup>。他用宗教麻痹人民的反抗,以严厉的伊斯兰教法典限制各族人民,同时却用重金和各种实利收买伊斯兰教上层分子为其卖命。在阿古柏倒行逆施之下,整个南疆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沙俄侵占伊犁后,采取了直接军事占领的方式,专设由俄军司令郭尔帕科夫斯基负责的伊犁事务特别办公室,总管当地的军事、政治、治安、经济等各类事务。全区划4个县,由占领军军官充任县长,对各族人民分而治之,以不同民族不同的管理方式瓦解人民的反俄斗争。为了巩固其军事统治,俄军多次收缴武器,清查各族所谓“反叛者”,把伊犁与新疆各地的联系完全割裂,经济上采用“以战养战”政策,最大限度榨取伊犁各族人民的钱财,

<sup>①</sup> 《伊米德史》下册,第108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72页。

<sup>②</sup> 《巴达吾来特传》,按汉文史籍曾将“巴达吾来特”译作“毕调勒特汗”,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37页。

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每年伊犁人民被盘剥的白银不下数百万两。

为了将伊犁变为俄国领土,沙俄还采取各种强化殖民政策。

首先,以没收的形式强占清朝在伊犁的屯田、耕地,侵占中国的土地产权,使占领区内满、汉、锡伯、索伦、察哈尔族人民各类营生被夺,土地被占。沙俄的强盗行径,遭到伊犁各族人民同声唾骂,“眼睛是蓝的,心肠是黑的”<sup>①</sup>。这句话在当地人民口中普遍流传

其次,强迫占领区各族人民加入俄籍,对各族人民先劝说“归附”,后“逼迫投降”,不从则任意拷打,百般凌辱。

第三,阻挠清政府对伊犁地方事务的管理,企图剥夺清政府对伊犁的管理主权。他们切断伊犁与外界的联系,不许清朝官兵照管伊犁难民,不许占领区内人民相互往来。

第四,在占领区内实行俄国法律,废弃清王朝在伊犁地区的司法主权。

第五,鼓励俄国商、民迁居伊犁,占据市场,把持经济。自俄迁居的俄人,趾高气扬,横行霸道。

面对入侵者的残暴行径,各族人民从未屈服,一方面与之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企盼着清王朝收复新疆,回归祖国。南疆各族人民“在街头巷尾成群结伙地在

<sup>①</sup> 《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64页。

一起议论着‘汉人就要来了’的消息。不管这些消息是真是假,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意编织出许多故事,以悦人心,更悦己心”。在春播时,有人说这是在‘播种’汉人,期待着秋季有大量汉族人到来,人们年复一年‘日夜盼望着汉人,为汉人做着祈祷’<sup>①</sup>。伊犁人民同心同德,誓不降俄,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冲破俄军封锁,与清政府官兵联系。

以上事实生动说明:新疆各族人民除一小撮民族败类外,驱逐外敌、心向统一的意愿是不可动摇的。在携手并肩的各族人民面前,无论是阿古柏还是沙俄都将被赶出祖国的大地。

## 2. 清军驱逐阿古柏

新疆各族人民希望赶走入侵者,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也主张迅速进军新疆,收复失地。于是清王朝决定,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任命金顺为帮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收复新疆。

在左宗棠的率领下,西征清军陆续出关,至1876年6月,入疆清军达七八十营,连同原有在疆军队人数接近6万。左宗棠进抵肃州(今酒泉),运筹帷幄,制订了在战略上“先南后北”、战术上“先北后南”的用兵方案,即先讨南路阿古柏,再集中力量解决伊犁问题。这一方案是针对沙俄强而阿古柏弱,有的放矢逐步解决的明智方案,具体

<sup>①</sup> 《伊米德史》下册,第111—112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79页。

作战计划则“先北后南”，在阿古柏的北疆据点古牧地、乌鲁木齐打硬仗，挫其锋芒，然后取达坂城下南疆，一举克复南疆。

阿古柏面临清朝大军的进攻，一方面在古牧地、达坂城和胜金口、吐鲁番与托克逊设三道防线，调集重兵布防，妄图阻止清军西进；另一方面频频活动于英、俄之间，妄图借助于列强阻止清军。英国出面进行所谓“调停”，但清廷严厉拒绝，清驻英公使郭松焘严正声明，喀什噶尔本中国辖地，中国理应收复。沙俄则以空头支票来为阿古柏打气。

1876年8月，清军首战古牧地。阿古柏匪军重兵严守黄田水源，清军前敌指挥刘锦棠发动夜袭，次日克黄田，经过激战，一举攻克古牧地进而又收复乌鲁木齐，至11月，北疆阿古柏势力完全肃清。清军继而兵指南疆门户吐鲁番，阿古柏政权一片混乱。一些外来匪徒携款而逃，不少被迫从敌的上层人士纷纷反正，投向清军；阿古柏的掌财司库吾守尔携大量金银，率四十余名骑兵投降清军；阿古柏在托克逊、达坂城的军需、粮草被反正人员与当地群众点燃，损失极重。1877年4月，清军南下首攻达坂城，城内维吾尔族人民冒死投向清军大营，并报告了匪军企图弃城南逃的情报，清军严密封锁，加紧攻城，20日收复达坂城，随后攻克托克逊、胜金口及吐鲁番，先后歼敌万余人，打开了通往南疆的门户。身在库尔勒的匪首阿古柏方寸大乱，在与属下的殴斗中，伤重而亡。

8月25日,清军向南疆八城发动总攻。10月7日收复喀喇沙尔(今焉耆),又在当地蒙古族、维吾尔族群众帮助下,越过敌军掘开的开都河洪水,收复库尔勒,攻占库车。在拜城、阿克苏两地,维吾尔族、回族人民发动起义,近十万余人占领城池,并击退匪军反扑,等候清军,乌什、阿合奇两地的柯尔克孜族人民向西窜匪徒发动攻击。10月下旬,清军进驻拜城、阿克苏及乌什,东四城完全收复。西四城之敌如惊弓之鸟,各寻出路,和田尼牙斯投降清军,喀什噶尔汉城何步云起义迎接清军,叶尔羌守敌玉努斯逃往土耳其。12月清军攻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完全克复西四城,阿古柏入侵势力基本肃清。

在此后几年里,南疆各族人民配合清军,肃清了阿古柏余孽的分裂叛乱活动。如和田一工匠报告清军,尼牙斯在反正后谋取世袭王位不成,竟募集工匠秘密打造兵器阴谋暴乱,后尼牙斯被捕。1878年冬、1881年5月,经当地人民的告发,清军又成功破获了沙雅尔署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和英吉沙尔忙升庄百户长阿不拉两起私藏洋枪“纠众谋乱”的阴谋叛乱事件<sup>①</sup>,消除了隐患,巩固了反侵略斗争的战果。

总的来看,收复新疆的战役进行得非常顺利,西征统

<sup>①</sup>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3卷,第88页,《刘襄勤公·奏稿》第3卷,第29—30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98页。

帅左宗棠亦不曾预料，“戎机顺迅，近罕其比”<sup>①</sup>，其最根本原因是清军收复失地是一场正义之战，大军所到之处得到新疆各族人民全力支持，左宗棠也讲到，“戎机顺迅”是与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特别是南疆人民配合清军的进剿而掀起的武装斗争分不开的。在整个作战期间，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的事屡见不鲜；克复地方以后，各种事宜皆暂委当地“头目承办，均无贻误”<sup>②</sup>。《伊米德史》中记载：清军从吐鲁番出发到喀什噶尔沿途，“没有一个城镇向皇帝陛下的大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还为皇帝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sup>③</sup>。而长期在新疆坚持反侵略斗争的汉族民团、蒙古兵勇等也在收复新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证明，新疆各族人民要摆脱外国侵略者的奴役，离开同汉族人民的团结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力排众议，坚持收复新疆，精心策划，前敌总指挥刘锦棠率各族将士冲锋陷阵，横扫阿古柏匪军，他们在收复新疆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建立了功绩。入疆西征的清军主力湘军、豫军及满族八旗军、回族等将士，以及吉林、黑龙江马队等内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万里迢迢，出征新疆，风餐露宿，出生入死，都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503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96页。

② 《陕甘新方略》第306卷第11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97页。

③ 《伊米德史》下册，第160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197页。



### 3.《伊犁条约》的签订与伊犁的收复

1879年,除伊犁地区外新疆完全收复。此时,沙俄在欧洲、远东的战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俄双方两次在彼得堡就伊犁问题举行谈判,中方首席代表崇厚昏庸无能,在俄方精心设计的圈套下受骗上当,没有利用我国边境军民歼灭入侵阿古柏匪帮的胜利这一事实去争取谈判主动权,而且未候朝旨,于1879年10月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机亚条约》)。

该条约的签订,满足了俄国封建贵族的侵华欲望,将中国北方完全向俄国开放,允许它深入长江流域的汉口,甚至允许它贩运“洋药”(即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民。增设的领事几乎遍及整个西北。俄国不费一兵一卒,所得权益比强加于战败国的条件还苛刻。崇厚签约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全国上下同声谴责崇厚擅权卖国,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以儆将来”<sup>①</sup>。全国一致声讨沙俄罪行。中国人民的反俄义愤给清政府和官员巨大影响,总理衙门迫于形势,也认为崇厚所订条约损失太多,清政府态度随社会舆论高涨而变化,不久令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将回国后即行革职的崇厚定了“斩监候”的死罪。沙俄见已写上条约的权益为清政府否决,恼羞成怒,准备以武力干涉,清政府也做了防范。

此时,各帝国主义国家从各自利益考虑进行干涉,对

<sup>①</sup>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9卷,第6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二册,第213页。

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终于让步,6月26日免除崇厚“斩监候”的死罪,派曾纪泽去俄谈判。经过激烈交锋,1881年2月中俄正式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涉及新疆的内容主要如下:

(1)俄国归还所占之伊犁地方。

(2)伊犁人民愿入俄国籍者,一年之内准予迁居。

(3)割地。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割让给俄国,自伊犁河以南之廓里扎特村东往南,则顺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旧界;阿尔泰、塔尔巴哈台地段之边界,自奎屯山至萨乌尔山之间划一直线,由分界官员在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喀什噶尔西边之交界,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

(4)俄国在嘉峪关、吐鲁番等地增设领事。

(5)俄商赴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

(6)赔款,共九百万卢布。

《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俄国对我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日益高涨的结果。1881年9月2日,清政府命令伊犁将军金顺督办交还伊犁事宜。第二年,当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抵达伊犁,与俄方代表商订收交伊犁办法,召集伊犁人民宣读并张贴中国政府告示时,受到伊犁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3月22日,中俄双方互换文约,清政府正式接收伊犁。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保卫过的伊犁,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 (六) 辛亥革命前后新疆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

20世纪初中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反对腐朽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沙俄侵略魔爪不断伸向祖国边疆。面对沙俄入侵,新疆各族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1901年,住在喀什的1名俄国信使戏弄侮辱妇女,激起各族人民无比义愤,引发了二千多人在俄领事馆前的游行示威,与领事馆卫队展开英勇搏击,此次事件虽遭镇压,却显示了中国人不可辱的民族气节。1901年2月,一俄国军官持道台的信,带4名士兵与4名随从,窜到色勒库尔,声称是经巡抚批准来管理该地邮政业务,此事引起当地人民的反对。为维护国家主权,当地人民向叶尔羌清朝官吏递交了一份百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反对中国邮政由外国人管理。1912年5月,伽师、和田等地也多次发生抗俄斗争,反帝爱国的策勒村事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

策勒村即今天的策勒县,当时是于田公署所辖一重要集镇,是俄商往来贸易的地区之一。沙俄驻喀领事馆在此非法设立商约,成立俄侨组织。这些俄侨、商约非法发展俄侨,把中国人变为俄国人,他们胡作非为,无恶不作。而当时策勒村的商约色依提就是这些人中最为凶恶

的一个，他仗势欺人，极为猖狂。

当伊犁革命党人举行武装起义，向清王朝在新疆的反动统治进攻时，沙俄到处煽动祸患策动暴乱，色依提也大肆活动，蛊惑当地人民加入俄籍，接受沙俄的“保护”，散发武器弹药，阴谋暴乱，妄图分裂新疆。对那些不受诱惑的群众，色依提多方欺凌，甚至不给渠水灌田，致使禾苗枯焦。1912年2月，当地人民将他们告官，结果被扣押，色依提却打着所谓“俄侨”的幌子恐吓官吏，很快在沙俄的庇护下得以释放。色依提继续胡作非为，在沙俄派兵侵入喀什噶尔后，他更加有恃无恐，威逼策勒村村民加入俄籍，当地人民再次向政府控告他。当时控制喀什噶尔局势的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非常支持策勒村人民抗俄，将莎车参将熊高升及其助手赵大胜派到策勒村查办此事。于田人民要求将其严惩，色依提却指使爪牙开枪拒捕，当场打死周树棠及士兵2人，打死群众数人，伤1人。各族群众面对这一暴行忍无可忍，苏皮尔格带领臂缠红布条的人民群众，手持木棒、长矛、砍土镩等反击，当场击毙匪徒29人，焚烧了色依提的房院，色依提乔扮成女人，趁夜色挖开后墙逃往喀什噶尔躲入领事馆。愤怒的群众以此乘机捣毁沙俄在策勒村设立的非法的商约，关闭了沙俄非法开办的俄籍学堂。策勒村人民的正义斗争，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

但袁世凯政府却在沙俄淫威下出卖了策勒村人民，答应给沙俄赔礼、惩凶、抚恤等要求。沙俄见北洋政府软

弱可欺，得寸进尺，于8月26日夜俄军悍然炸毁喀什噶尔城门，进城蓄意挑衅。面对侵略者的淫威和政府的叛卖，新疆各族人民英勇斗争。当袁世凯和杨增新扣留、查办“肇事者”熊高升等人时，皮山、叶城、莎车等地爱国军民却以极隆重仪式鸣炮迎接熊高升等人，表现了对英雄的崇敬。沙俄驻喀副领事贝伦斯窜到策勒村搜集“材料”时，当地爱国官兵公开予以抵制。在和田、喀什各族人民的愤怒反抗中，沙俄不得不放弃处死我国官民180人的无理要求。

1913年2月，对策勒村事件的审判在喀什噶尔开庭，面对所谓“原告”索柯夫等26名假俄侨，“被告”熊高升等七十多名爱国官民用事实痛斥色依提的种种罪行。铁证如山，无可置辩，这使索柯夫陷入极尴尬的境地，由原告变成被告。索气急败坏，暴跳如雷，进行捣乱，审判被迫中断。但是北洋政府在沙俄的胁迫下，撤销了和田州官唐允中和于田县令沈永清的官职，予以罚款；判处熊高升12年徒刑、赵大胜6年苦役，以苏皮尔格为首的策勒村40名爱国村民，也分别处以苦役4—10年。中国还给沙俄赔偿7万两银子。

策勒村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虽蒙受这种不公正的处理，但是各族人民并未屈服。后来喀什噶尔、和田、皮山、叶城、莎车和伊犁、阿勒泰等地各族群众也进行了类似的抗俄斗争。当策勒村爱国村民的首领苏皮尔格刑满回家时，全村老少出来欢迎，有的甚至跑到150公里外的和田

去迎接。苏皮尔格等人回村后,又和当地人民一起继续投入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在皮山等地许多被骗加入俄籍的中国人,在认清沙俄罪恶面目后,奋起揭发、控诉沙俄侵略者的罪行,纷纷要求恢复中国国籍。1915年于田各族人民与沙俄侵略者斗争,公开声明要将这些侵略者统统赶回俄国去。同年四五月,在阿勒泰地区承化寺、哈巴河、布尔津一带,沙俄非法移入大批殖民者,他们控制耕地牧场,掠夺耕牛,控制水源,欺压人民,各族人民奋起抗争,在当地驻军配合下,与侵略者进行斗争。

总之,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尽管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与新疆地方军阀的昏庸,沙俄趁机加大了对新疆的入侵。但素有反侵略斗争传统的新疆各族人民,在内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到反侵略的斗争中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领土与主权,将沙俄分裂中国、霸占新疆的迷梦击得粉碎,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史上又写下光辉的一页。这些史实充分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为抗击外国侵略者不畏强暴、团结战斗的光荣传统。

从上述1840年到1932年近百年历史中,我们看到,在众多不利因素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心向祖国,用鲜血和生命与各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外来侵略者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捍卫了祖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同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日后的反侵略、反分裂斗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 二、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覆灭

20世纪30年代初,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新疆的一小撮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鼓吹者,公开上演了一场妄图分裂中国的丑剧,搞了一个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场闹剧一开场,就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迅速掀起了一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正义斗争,使得这出分裂祖国的闹剧,不足半年,即一命呜呼。这是近代新疆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传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得到较为充分的暴露,因此,我们首先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出现及其在新疆的传播讲起。

### (一)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产生

泛伊斯兰主义始于19世纪中叶,创始人是阿富汗人哲马鲁丁。起初,他因耳闻目睹西方殖民者的暴行和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冲击以及穆斯林宗教意识的淡化,

便萌生和形成了振兴伊斯兰教的思想,并逐步形成了泛伊斯兰主义,主张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哲马鲁丁传播的泛伊斯兰主义是超民族、超阶级、超国家的狭隘宗教观,它既不提反对封建制度,也未能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因而泛伊斯兰主义后来被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所利用,从而也失去了它仅有的一点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掠夺,寻求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光辉。列宁曾揭露泛伊斯兰主义的阶级本质,认为它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工具<sup>①</sup>。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些国家中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就将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分裂这些国家的思想工具,严重危害着这些国家的统一。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一样是一种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思潮。泛突厥主义主张由奥斯曼土耳其来统一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建立突厥大帝国,其范围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阿尔泰山,甚至从地中海延伸到太平洋,旨在重温16世纪奥斯曼帝国极盛时期的旧梦。泛突厥主义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尤其是在沙俄境内的鞑靼人中间。由于泛突厥主义思想恰好适应奥斯曼土耳其的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使得泛突厥主义在奥斯曼土耳其扎下了根子,并由此推向世界各地。然而世界上从未形成过突厥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突厥曾作为一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



个游牧部落而存在,到唐朝因东西突厥汗国的灭亡,突厥部落联盟宣告瓦解,使得突厥失去了发展成为近代民族的历史机遇,原先突厥统治的各个部落都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那么为什么要那样大肆宣扬泛突厥主义呢?正如恩格斯揭露泛斯拉夫主义的本质时所说的那样,“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人计划,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sup>①</sup>。因此,我们可以说,泛突厥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突厥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重温奥斯曼帝国历史旧梦,进而推行大突厥帝国的骗人计划。

由此可见,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是一种反动思潮,是适应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对外侵略政策所需要的。因此,自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出笼后,帝国主义国家就竭力把这种反动思想向各国渗透,中国新疆则成为它们的重要目标。从此,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在新疆时起时伏,兴风作浪,长期危害与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 (二)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和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出现

新疆地处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是多民族地区,多数民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3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

族信仰伊斯兰教。当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出现以后,帝国主义和土耳其就竭力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传播到新疆。19世纪80年代,泛突厥主义最早的传播者伽思普林斯基创办的《译文报》杂志就流传到新疆。1915—1916年,以德国人冯·亨蒂希为首的特务组织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的新疆地区散发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小册子上万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同时也是为了侵略和宰割中国,加紧了在中亚和新疆的思想文化渗透,其主要内容就是大肆散布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其渗透的手法主要是开办学校,公开在青少年学生中灌输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1914年2月,土耳其泛伊斯兰主义分子艾买提·卡马尔,受土耳其“统一和进步党”(泛突厥主义狂热鼓吹者的政党)首领穆罕默德·塔拉先的派遣,来到新疆阿图什,他以创办学校为名,竭力向学生灌输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迫使学生奉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为领袖,把奥斯曼土耳其的哈里发尊为精神上的父亲,连唱歌都要唱土耳其歌曲,以淡化各族青少年的祖国观念,为其分裂中国服务。此外,还有一些塔塔尔人、土耳其人在库车、莎车、吐鲁番等地开办学校,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当时留学国外的一些人,例如麦斯武德等在留学期间接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回国后,在伊犁办“图冉”学校,公然叫嚣“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

祖国是土耳其”。一些学生受这种反动思潮的侵蚀,蜕变成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者,后来充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头目的沙比提大毛拉就曾在阿图什受过这种教育。

除办学校外,他们还利用宗教活动传授经文,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肆意煽动与迷惑群众。此外,他们还在从新疆去麦加的朝觐者,或去土耳其、印度与中亚等地留学、经商与做工的人中进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蛊惑宣传。

由于帝国主义者不断加深对中国新疆的思想文化渗透,到20世纪20年代,在新疆逐渐出现了麦斯武德、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以下简称伊敏)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者,他们竭力寻找时机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30年沙比提大毛拉与伊敏在伊宁相识,他们臭味相投,沆瀣一气,密谋推翻金树仁政府,建立“独立”国家。

### **(三)乘反对金树仁统治和新疆政局混乱之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纷纷登台亮相**

1928年,金树仁在镇压了“七七政变”以后,取得了对新疆的统治权。他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尤其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掠夺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1931年哈密农民首先发动了武装暴

动。由此，反对金树仁统治的斗争一发而不可收。在动乱的年代，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乘机兴风作浪，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充当帝国主义的附庸。1933年1月，库车脚夫揽头铁木尔响应哈密农民反金斗争在库车起义，攻占库车城，随后又夺取轮台、拜城。2月5日进占阿克苏城，并积极准备进攻喀什，在起事过程中他提出过“兴回灭汉”，建立“伊斯兰教国”的分裂主张。

这时在和田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者伊敏得知哈密起义消息后，迫不及待地派他的大弟阿不都拉以行医为名，到迪化、吐鲁番等地了解哈密起义的细节以及各地反金斗争的情况。同时，伊敏在墨玉县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网罗了一百三十多名成员并秘密制造各种兵器。此时沙比提大毛拉刚从印度归来，两人又一次相遇，认为这是实现他们1930年在伊宁取得的共识的时候了，沙比提大毛拉全力支持伊敏策划的行动。1932年底，阿不都拉返回和田，向他汇报了哈密起义以及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等地人民反金树仁统治的情况，以及沿途各地社会动荡的情景。不久库车爆发了铁木尔的暴动，给予他们极大鼓舞，伊敏和沙比提认为行动时机已成熟。在夺得金树仁从印度运回的一批军火后，于1933年2月15日在墨玉举行暴动，接着伊敏率暴动队伍奔袭和田，沿途队伍不断扩大，很快攻占了和田、于田等地。攻占和田后，伊敏组织了分裂政权“和田伊斯兰政府”，选举当地著名的宗教人士买迈提尼牙孜担任政府首脑，伊敏被授予

“艾米尔”(国王)负责军事,沙比提大毛拉为宗教事务负责人,猖狂地进行分裂国家统一的罪恶活动。“和田伊斯兰政府”成立后即派兵由伊敏之弟夏满苏尔和沙比提大毛拉带领向东进攻皮山、叶城、泽普、莎车等县,并力图攻占喀什,成立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 (四)“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与覆灭

在南疆动乱、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活动频繁之时,英帝国主义密切地注视着南疆时局的发展。长期以来,英帝国主义就阴谋破坏我国的国家统一,妄图把我国领土西藏分裂出去,制造一个“大西藏国”。所谓“大西藏国”,是把西藏全区,以及新疆南部、青海、西康(今四川省西部)、云南西北部等广大区域在内的我国西半部领土分裂出去,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同时,英国还想策动南疆独立,再与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国合并,建立一个“大伊斯兰教国”。可见策划南疆独立是英国侵略亚洲总体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策划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时,马上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1933年8月,英国通过印度政府派出间谍潜入喀什,利用印度商人与南疆各界有广泛接触和联系的有利条件,收买一些人充当英国间谍或宣传员,利用他们在南疆大肆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

义,还在喀什仿照“青年土耳其党”的模式组织了“青年喀什噶尔党”。为支持分裂活动,英国拿出51万卢比作为活动经费。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在关于新疆南部独立运动问题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报告中指出:“该伪政府之组织及一切叛逆举动皆受英之主使,英国在和田派有代表暗中操纵。”<sup>①</sup>

在英国支持下,沙比提大毛拉和伊敏加紧进行分裂活动。1933年5月,铁木尔、沙比提大毛拉勾结喀什行署下属的柯尔克孜族营营长乌思满,里应外合,进攻喀什,铁木尔占据了回城。沙比提到喀什后,会见当地各阶层人士,发表演说,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煽动民族仇视,鼓吹新疆独立,公开打出民族分裂主义的旗号,竭力拼凑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所谓“突厥斯坦”,是指突厥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出现于公元8世纪前后,后来突厥斯坦的范围越来越大,扩大到所有操突厥语诸民族居住的地方。18—19世纪,俄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将突厥斯坦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划分为“西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外国人一般把新疆的南疆地区或新疆全部称为东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本是地理名词,后来这一名词被帝国主义利用,成为分裂中国的工具。“东突厥斯坦”这一称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新疆,正适应民族分裂主义者分裂国家的需要,于是沙

<sup>①</sup> 《关于新疆南部独立运动的问题盛世才等的报告及其有关文电》(193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比提大毛拉一伙进入喀什后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政府”的问题，把分裂主义口号付诸行动。由于当时铁木尔与和田方面彼此矛盾很深，沙比提大毛拉的主张未能被接受。1933年8月，马世明所属马占仓部袭击并杀了铁木尔，沙比提大毛拉与乌思满又联合夺回疏附。此后，沙比提大毛拉与英国加紧勾结，炮制“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沙比提大毛拉出生于阿图什，自小接受系统的伊斯兰神学教育，后成为阿图什、喀什等地著名的宗教人士。1928年以后，他离开家乡，沿塔里木盆地北上，先后在阿克苏、库车等地的宗教学校执教，后又转赴伊犁，继续从事宗教教育活动。1930年以后，他到阿富汗、印度等国留学，接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并与英国间谍机关建立联系。1933年初回国支持伊敏发动墨玉暴动，并充当和田“伊斯兰政府”的宗教负责人。随后他率军与铁木尔等联合攻占了喀什，并积极策划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于与铁木尔有矛盾，使这一分裂计划一时受阻。铁木尔被杀后，沙比提大毛拉在英国的支持下加紧拼凑分裂国家的伪政权。他四处网罗反动的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人士，先搞了一个“和田援战物资管理局”，作为进行分裂活动的组织，后将此组织改名为“和田伊斯兰政府驻喀什噶尔办事处”，9月10日又改名为“东突厥斯坦独立协会”，他在该协会的成立会上公开提出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伊斯兰共和国”的主张，至此，分裂主义

面目暴露无遗。沙比提大毛拉深知哈密农民起义领袖和加尼牙孜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声望,为给分裂政权装点门面,他派人赴阿克苏请和加尼牙孜担任“政府总统”。在英国驻喀什领事的精心策划和导演下,沙比提大毛拉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划,1933年11月12日夜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终于炮制出笼。和加尼牙孜未到场,仍被推举为“总统”,沙比拉大毛拉为“总理”,一批封建地主、大商人、宗教上层人士、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分子掌握了这个分裂政权的大权。这个伪政权制定了“宪法”、政府组织纲领、施政纲领和各部、厅实施办法。在组织纲领中公然宣布“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要求南京或国际联盟予以便利,以达最终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独立。这个纲领充分说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分裂政权,它的出笼是破坏国家统一的严重事件。

这个分裂政权是在英国的精心策划下搞起来的,它一开张就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甘当外国的附庸和走卒。其头目沙比提大毛拉先后派人到印度、阿富汗、伊朗、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要求承认。沙比提大毛拉在给阿富汗国王巴图尔·穆罕默德·纳第尔的亲笔信中恬不知耻地说:“我们请求王宫在枪支、大炮和弹药方面给我们以援助。……如果可能时,请派一支您的战无不胜的军队前来支援。……如果您不愿意使我们失去您的指导和援助,那么,引导我们,把我们置于您的庇



翼之下……”<sup>①</sup>

这个分裂政权,大肆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煽动民族主义狂热,仇视和屠杀维吾尔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就连与他们信仰同一宗教的回族,也因马仲英(回族)势力与他们对立,而恨之入骨,竟认为“东干回(即回族)比汉人更为吾人之仇敌……对东干须小心防备,要激烈对付,绝不能客气”。他们竭力否定新疆自古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史,否定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互相学习、互相交往、密切联系、共同发展的历史,胡说“黄汉人与东土耳其斯坦本无丝毫关系,黑东干亦无多大关系,东土耳其斯坦者乃东土耳其斯坦人之东土耳其斯坦”<sup>②</sup>。

这个分裂政权宣布以伊斯兰教立国,建立宗教法庭,对各族人民滥施肉刑,无端加以残害,不少不按教规戴面纱的妇女竟遭枪杀。

这个分裂政权代表着卖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宗教上层的利益,反映的是民族分裂主义的愿望。因此,它一出笼就遭到各族人民的反对,人民奋起抗纳租税的事件屡有发生。这个分裂政权与活动于喀什附近的其他势力的矛盾错综复杂。当时占据疏勒的是喀什行政长马绍武和马仲英下属马占仓部,与分裂政权势不两立。当时占据阿克苏的和加尼牙孜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势力。和加尼牙

<sup>①</sup> 新疆历史研究所资料,第1800号,转引自《新疆简史》第3册,第2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sup>②</sup> 洪涤尘:《新疆史地大纲》,第329页,转引自《新疆简史》第3册,第20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孜在哈密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成为反金树仁斗争的领袖,在反金斗争中他得到外蒙古的支持,是他把马仲英从甘肃引入新疆的,他原本与马仲英联合反对金树仁,后因分赃不均,反目为仇。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统治了新疆,他为了反对马仲英,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的帮助下,与和加尼牙孜达成妥协,并任命和加尼牙孜为南疆警备司令,从此和加尼牙孜站在盛世才一边反对马仲英,后在南疆与马仲英作战失利,退到阿克苏。他与马仲英势力相对抗,这与分裂政权有一致的地方。在当时的南疆,和加尼牙孜的势力可谓首屈一指,所以南疆的其他各种势力都想倚仗和加尼牙孜的势力,借以壮大自身的力量。那个分裂政权也不例外,它一出笼就迫不及待地推举和加尼牙孜为“总统”,企图借助和加尼牙孜的势力来维护分裂政权。

为攻打马占仓部,和加尼牙孜与麻木提率军离阿图什向喀什进发,1934年1月13日进入喀什。由于和加尼牙孜人多势众,装备又强,很快在军事上控制了喀什。这时驻守在疏勒城的马占仓部是对分裂政权威胁最大的武装力量,和加尼牙孜与马仲英已反目为仇,所以,他进驻喀什回城后,就向马仲英部属马占仓进攻,疏勒危急。马仲英即派马世明率两千人增援马占仓。“和田伊斯兰政府”为堵截马世明的部队,派努尔买买提率领三百多人前往伽师县境内抵御马部。和田军与马世明部交锋一触即溃,马世明部冲破一处又一处防线,很快打通了进入喀什

的通道。和加尼牙孜却对马世明部不屑一顾，亲率自己的卫队，先于马世明部在疏勒县的亚夏牙村布阵设防，马世明部与和加尼牙孜部队激战半天，和加尼牙孜不敌，退回喀什老城，马世明部进入疏勒城解了马占仓的围。马世明进入疏勒，喀什老城一片混乱，沙比提大毛拉及其军政官员相继离城逃窜。和加尼牙孜与麻木提率部退往英吉沙。维吾尔等新疆各族人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纷纷起来反对这个反动的分裂政权。1934年2月6日，存在只有88天的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即一命呜呼，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历史告诉人们，在新疆搞分裂是不得人心的，其下场必定是可悲的。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覆灭后，沙比提大毛拉如丧家之犬到处流窜，他到英吉沙，“和田伊斯兰政府”守军头目努尔买买提拒不接纳，他只得在英吉沙、莎车一带躲藏。和加尼牙孜率部队退出喀什以后，还想联合和田力量抵御马世明部队，但得不到各地响应，孤军与马世明部在伽师作战失败。和加尼牙孜退到阿图什后，经乌恰退到中苏边界上中国口岸伊尔克什坦木，想得到苏联援助，重振旗鼓。在口岸他与苏联官员会晤，苏联官员责问他：你同盛世才政府已经签订了协定，为什么不遵守诺言，反而在非法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任职务？和加尼牙孜辩解说：这个政府不是我成立的，我没有参与过沙比提大毛拉的非法活动。苏联官员为验证和加尼牙孜所说的话，要他把沙比提大毛拉等伪政府官员逮捕，苏

联才能给予他援助。和加尼牙孜遂离开伊尔克什坦木，取道乌帕尔，到达英吉沙尔，与麻木提会合。之后，他们用很大力量侦察沙比提大毛拉一伙的行踪，后得知他们在莎车一带。1934年4月中旬，和加尼牙孜在莎车捕获了沙比提大毛拉以及伪政府的几名部长。伊敏对和加尼牙孜的行为深为不满，与和加尼牙孜分手，率部返回和田。和加尼牙孜率部转移到阿克苏专区的阿瓦提县，把伪政府官员交给了追击马仲英的省军。沙比提大毛拉被押往迪化，后死于狱中，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和加尼牙孜逮捕沙比提大毛拉后，取得了苏联的信任。盛世才刚刚击败张培元、马仲英，政权尚待巩固，而且原先他曾与和加尼牙孜签有合作协定，所以，盛世才决定暂时利用和加尼牙孜，遂任命和加尼牙孜为省政府副主席，其部队整编为新疆骑兵第六师，任命麻木提为师长，驻扎喀什。

此外，围攻省城迪化的马仲英部于1934年2月被支援盛世才的苏联红军击败后，向南疆撤退到喀什。1934年7月经人斡旋，马仲英等人由苏联驻喀什领事馆派员护送，越过边界进入苏联。其余部由其姐夫马虎山统率，移驻和田。这时和田还有一个分裂政权“伊斯兰教王国”。马虎山率兵消灭了这个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政权，其首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伊敏被迫逃往国外，继续在国外从事分裂新疆的勾当。

麻木提、马虎山野心很大，他们热衷于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这样，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

## (五) 平定麻木提、马虎山叛乱, 新疆完全统一

1934年8月和加尼牙孜到迪化就任省政府副主席, 他的部队留给其亲信麻木提率领, 驻防喀什。麻木提是吐鲁番三堡的大地主, 主张亲英, 反对盛世才政权的亲苏政策, 他认为苏联搞的是共产主义, 而共产主义是“反宗教”的。他把在新疆成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政府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在曾积极支持过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灭亡以后, 继承了沙比提大毛拉的衣钵, 继续在喀什地区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他竭力煽动宗教狂热, 在六师师部设立礼拜寺, 规定无论何种情况, 无论何人, 都必须每天做5次“乃玛孜”; 他还强征“乌守尔”、“扎尔提”宗教税, 用来开办学校, 鼓吹民族主义, 培植分裂势力; 他以保护宗教为名, 竭力鼓吹分裂中国的谬论, 叫嚷要建立什么“伊斯兰教维吾尔国”; 他进驻喀什后, 还拨出专款大力资助鼓吹分裂的《新生活报》, 通过该报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以致南疆的民族分裂活动一时甚嚣尘上。麻木提危害国家统一的种种倒行逆施, 也威胁到盛世才在喀什的统治, 于是盛世才对麻木提这支割据势力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并准备根除这支势力。在军事上, 1934年9月, 盛世才派苏联少将热巴列肯到六师训练部队, 经热巴列肯建议麻木提选派3名军官到苏联塔什干受训, 受训的结果使这些军官倾向苏

联,不听麻木提指挥。盛世才又调麻木提部十几名军官到迪化进修,盛世才多次接见,笼络抚慰,并宣传政府“六大政策”,使这些军官转变立场,表示要忠于政府、要为新疆和平与建设作贡献,反对搞分裂。这样,麻木提企图煽动全师反政府、搞分裂已不可能。在政治上,盛世才派中国籍联共党员王宝乾(赵实)任喀什行政长,委派得力人员任喀什公安局长,监视、制约麻木提。1935年,在联共党员满素尔的建议下,政府接管了《新生活报》,铲除了公开鼓吹民族分裂的喉舌。此外,盛世才还在喀什扶植亲苏人士乌甫尔大毛拉,利用他的威望抵消麻木提的影响。

麻木提逐渐察觉盛世才的意图,深感不安。当时他还不敢公开反盛,只在暗中积极准备用武力对抗。他清洗了部属中的亲政府分子,同时,内联喀什、阿克苏等地的反动宗教、封建势力,对外勾结英、日帝国主义,以求一逞。他通过阿不都拉伯克大毛拉,接受了英帝国主义的大批金钱。他甚至派密使企图潜赴日本,请求日寇派兵来新,帮助搞“独立”,十足暴露了他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但其投日的企图因派去的人中途受阻,而未能得逞。麻木提与盛世才政府的矛盾日益深化。1936年5月乌甫尔大毛拉在喀什被麻木提所派的人暗杀,使矛盾更加尖锐。乌甫尔大毛拉是喀什地区很有声望的人士,1935年他参加了全疆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表示拥护政府“六大政策”,荣获金质奖章。回喀什后,他与麻木提抗衡,宣传政府“六大政策”,号召各族民众忠于政府,识破帝国主义

的谣言和阴谋。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毅然反对麻木提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径。乌甫尔的正义行动为麻木提所不容。1936年5月,盛世才政府决定由乌甫尔大毛拉任团长率领实业考察团去苏联参观访问。麻木提认为乌甫尔大毛拉已经完全倒向盛世才,他的存在对自己非常不利,遂乘乌甫尔大毛拉动身去迪化之际,将其暗杀。麻木提也深知盛世才很快要对其下手,便加紧策划反盛活动。1936年底,麻木提又几次密谋叛乱,遭到倾向于政府的一些军官的反对,并将麻木提的阴谋报告了政府。

1937年初,盛世才以即将召开全省第三次民众代表大会为由,请麻木提晋省,拟在迪化除掉他。麻木提深感此去凶多吉少,他一方面假惺惺地声称即将离喀去迪,另一方面却加紧准备叛乱,如有不测即逃往国外。

1937年4月2日清晨,麻木提以去阿克陶围猎为名,悄然离开六师师部所在地,潜赴英吉沙,洗劫了该县政府、税务局等处的钱财后,直奔莎车。在莎车他又指使其心腹四团团副伯沙克尼牙孜捕杀团长沙依木、县长阿合买提江等人,洗劫莎车县政府、税务局、银行库存的金钱财宝,以及人民群众的财物、马匹,县城汉人几乎被屠杀殆尽。他原计划以莎车为根据地,接受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再进攻喀什回汉两城,以实现其建立“伊斯兰维吾尔独立国”的梦想。但是,分裂不得人心,遭到各族人民的反对,广大士兵也不肯为其卖命,其分裂祖国的阴谋迅速破产,不得不狼狈出逃,取道棋盘山,经拉达克、克什米

尔,逃往印度。1939年12月,他又从印度到日本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京成立“东突厥斯坦独立促进会”,自任主席,继续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1944年回国,不久死于北平。

在麻木提举兵叛乱之时,盛世才命马虎山部配合喀什省军镇压麻木提叛乱。马虎山是一个野心家,他公开表示“决不附和叛军”、“决整队予以消灭”<sup>①</sup>。实际上暗中与麻木提部下阿不都拉尼牙孜勾结,联合进攻喀什。马虎山攻占喀什回城,包围疏勒,公开反对省政府。马虎山凭借自己实力与阿不都拉尼牙孜一道很快攻占了伽师、巴楚、麦盖提、乌什,并进逼阿克苏,对盛世才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如果马虎山阴谋得逞,麻木提将卷土重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将复活。因此,马虎山的叛乱必须尽快平定。盛世才调遣了一切能动用的省军,连军校学生也开赴南疆参战。双方在激战中伤亡很大,战局吃紧,省军兵力不足,盛世才不得不再次请求苏联出兵支援。1937年9月,苏联派机械化部队1个团,在40架飞机、20辆坦克配合下,从吐鲁嘎尔特山口进入南疆,给马虎山部第36师以致命打击。10月马虎山携带大量黄金,率少数亲信逃往印度,马虎山叛乱被平定。从此,新疆割据势力基本上铲除,新疆实现了完全的统一。

<sup>①</sup> 《新疆简史》第三册,第24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 三、三区革命时期三区内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

盛世才统治新疆的初期，亲苏联共，制定并实施进步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新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民族关系比较融洽，有“延安第二”之称，成了有志之士向往的地方。然而，为时不久，盛世才即显露出军阀的本来面目。他用反动的独裁、恐怖政策代替进步的“六大政策”，多次制造所谓的“阴谋暴动案”，打击、摧残各族进步人士和中共在新人员。在民族问题上，盛世才抛弃了初期“民族平等”的面纱，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破坏民族之间的关系，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残酷迫害各民族人民群众。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不堪忍受政治迫害，积极行动起来，秘密建立地下组织，动员群众，准备起而推翻盛世才的反动统治。与此同时，阴谋分裂祖国、企图破坏祖国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乘机利用人民反盛情绪，大肆蛊惑煽动，妄想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1944年8月，盛世才调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部长，吴忠信接替其职位。接着，新疆西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专区爆发了少数民

族解放运动,史称“三区革命”。

### (一)泥沙俱下,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乘机进行分裂活动

新疆三区革命由于没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直接领导下进行,初期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封建势力、宗教上层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手中,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同时,发生了严重的民族分裂主义的错误。三区革命初期的最高领导人艾力汗·吐烈是一个极端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者。他是原苏联乌兹别克斯坦人,出身于宗教世家。十月革命以后,因散布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反动思想,1924年被苏联政府逮捕,后来到新疆,以行医布道为名在穆斯林群众中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宣传。在艾力汗·吐烈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极力煽动下,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中的民族分裂和民族复仇情绪恶性膨胀。

1944年11月7日,伊宁起义爆发,12日起义群众占领市区。就在这一天,“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艾力汗·吐烈任临时政府主席。在“临时政府”委员和各部门领导中,大牧主、大地主、宗教上层等封建势力占绝大多数,进步人士占极少数。1945年12月,三区在伊宁召开各族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艾力汗·吐烈大权在握,更是不可一世。他

多次在集会中向群众演讲,声称“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他还大肆鼓吹反汉、独立的“圣战”,叫嚷“活着为英雄,死了享荣誉”、“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在我们圣洁的大地上没有黑大爷(指汉族)的份,他们的国土在3500公里的长城里边”,自称他自己就是“一个拥有700万人口国家的首脑”、“黑大爷滚出新疆去,路费我来掏”,等等。这些反动叫嚣影响极为恶劣,在他的煽动下,一些地方发生了杀害战俘和汉族群众、污辱汉族妇女、抢劫汉族群众财物的事件。无辜汉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伤害。

## (二) 逆境抗争,进步分子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三区的进步分子大多接受过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教育,视野开阔,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素养,能较为实事求是地看待民族问题。但是他们的力量当时还十分弱小。阿合买提江在总结三区革命时曾经说过,“我们的民族运动的基本动力是农民,但他们完全处在封建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统治下面”<sup>①</sup>,因此,进步知识分子不可能在运动中取得支配权,也不可能主宰运动的发展方向。但是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汉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sup>①</sup> 《新疆和平解放》,第15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在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进步知识分子的干预下，军事指挥部曾公布对实行掠夺与奸淫者处以死刑的命令。1945年1月1日，“临时政府”特别军事法庭对攻下惠远后杀害多名无辜汉族群众的拉甫桑处以极刑。时任临时政府内务厅厅长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曾下令内务厅工作人员尽快制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并用内务厅的名义，发给伊宁、霍尔果斯、清水河、芦苇沟等地的汉族群众受保护的证明，还顶着舆论的压力，亲自将一些汉族群众接到自己家里加以保护，并指名释放了一些汉族群众。尽管阿巴索夫只能保护极少数汉族群众，但他所做的努力代表着三区革命的正确方向。由于阿巴索夫的正义行为触怒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被免去内务厅厅长之职，调任民族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5月，“临时政府”为保护汉族群众，把他们集中到各县公安局，然后将东五县的千余名群众集中到宁西县，将西四县的两千多名群众集中到惠远。9月，“临时政府”还批复绥定县政府，不得没收未迁往惠远仍定居芦苇沟的57户汉族群众的牲畜、财物和粮食。

阿山曾一度出现强迫汉族人為自己干私活，侵犯汉族百姓利益的事，为此1945年11月17日阿山专区行政公署颁布了经达列力汗签发的第23号《关于保护汉族群众利益》的决议：

- (1) 禁止机关、部队或个人让汉族群众为自己劳动。
- (2) 若任意让汉族群众服劳役则以侵犯人权追究其

责任。

(3)各县政府要统计好本县汉族人数,受理好他们的上诉。

(4)在特殊的情况下,各县政府有权在适当时间内让汉族群众服劳役,但必须按政府的规定付给其劳动报酬。

(5)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严禁各机关任意没收汉族群众的财产,若汉族群众仍占有应交政府的财产,须经法院决定后方能没收。

(6)由专区内务处和法院负责监督本决定执行的情况。<sup>①</sup>

除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保护汉族群众外,有些少数民族群众也自发地行动起来,保护汉族百姓。尽管他们的行为无法从根本上清除民族分裂主义,只是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民族分裂主义的危害,但是他们毕竟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1945年9月上旬,三区民族军挺进至距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大桥西岸,国民党急调重兵死守东岸,双方隔岸对峙。经过苏联斡旋,三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和平谈判,签订了和平条款。根据条款规定,国民政府给予新疆各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和自由,三区废除“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承认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1946年7月1日,省联合政府正式成立。省联合政府成立前

<sup>①</sup>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3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夕,反对和谈,坚持分裂、独立的艾力汗·吐烈等人被送回苏联,阿合买提江等进步分子掌握了三区领导权。

省联合政府成立后,艾力汗·吐烈等分裂主义的思想影响和反汉、排汉现象仍然严重存在,特别是1947年8月省联合政府破裂后,又有蔓延的趋势。三区进步分子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促使三区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开始纠正初期在民族分裂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方面的错误,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6年8月22日,阿合买提江在省政府委员座谈会上指出:“东土耳其斯坦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作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并表示:“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部分。……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所要求的是解放、自由和平等。”<sup>①</sup>这番话表明了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进步分子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以及他们领导的三区革命的斗争方向。

1947年2月17日,阿合买提江在省维文会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针对一些人继续打着东突厥斯坦旗号,要求“独立”,分裂国家统一的问题严肃地指出:“我在国民大会上<sup>②</sup>曾提出新疆要民族自治,但那并不是独立的意思,

<sup>①</sup>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8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sup>②</sup> 指1946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阿合买提江时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主席作为新疆省国大代表参加了该会。

而且我们需要的民族自治,并非只限于一个民族……乃是要实行全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自治,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的。凡以为民族自治只是为一个民族的单独自由者,这种人的思想是太错误了。”接着,他明确而坚定地说:“《和平条款》签订后,‘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自己体面地宣布解散,如同其他专区一样,都仍旧归属于省政府领导了……如果今天有人宣扬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的话,那就是反对《和平条款》”,“我们的人民今天并不是要成立什么‘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与此同时,也绝不允许干扰《和平条款》的实施。”关于三区革命的对象问题,阿合买提江指出:“要知道我们民族的敌人不是汉族,而是以往专制制度下的汉族腐败官吏。我们不要将这两者区别不清,以致错以为汉人是我们的敌人。”他又指出:“我们这一次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针对哪一个民族的运动。这一次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为保障我省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的运动。不料使同独裁政权没有牵挂的汉族人在革命初期受到了冲击。尽管这毕竟是少数人所为,但我们不能否认发生过这回事……我们的敌人不是汉族人,而是独裁政权的拥护者和侵犯人民权利的顽固分子及其拥护者。”这就非常明确地批判了一切排汉、反汉的错误思想。最后,阿合买提江正告新疆各族人民:“我们的人民应该有所了解:如今我们并不是反对汉族和国家的统一,如果有人反对汉族和国家的统一,那就是反对《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就不是我们的朋友。

因此,对于《和平条款》以外的任何行动,我们坚决不予支持。”<sup>①</sup>

三区革命的领导者明确否定了“独立”之途,肯定了  
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争取民族平等和民主自由的  
革命方向,这就为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的斗  
争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此后,三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维护祖国统一。1947年11月19日,阿山专署发表80号命令,要求阿山专署各部门、各县的牌匾、公章、文号、名称一律取消东突厥斯坦字样。1948年8月1日成立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没有沿用东突厥斯坦字样,而是坚持用新疆这一名称。阿合买提江为此解释说:“虽然按言论自由的精神,我省的地理名称可以随意称呼,但在政治上、程序上称之为新疆,这在新盟组建会议上已做了专门规定。”<sup>②</sup> 表明三区维护祖国统一的心愿。

三区革命的领导者们懂得,要消除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引导三区干部群众自觉维护祖国的统一,就必须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三区革命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关系,说明新疆各族人民的前途与整个中国人民的前途的联系。为此,三区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从理论上做了大量工作。自从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

<sup>①</sup>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14—2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sup>②</sup>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8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攻后,三区报刊不断报道来自内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阿合买提江等领导人更是密切关注着解放战争的动向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1949年5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在新盟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所做的题为《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用专章论述了三区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我们民族解放运动,不仅在其他的特点方面及其任务方面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相同,而且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中国民族问题得到彻底和正确解决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有着密切联系”,“新疆的本地民族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帮助下,才能很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只有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新疆人民才能得到解放,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sup>①</sup>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这些论述,对于广大干部群众都起到了深刻的教育作用,增强了三区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利益相关的意识,提高了对中国革命是全局、新疆三区革命是局部的认识水平。

<sup>①</sup>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142—14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 (三)反省并纠正三区革命初期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用正确的民族观教育各族群众

1947年7月31日,阿合买提江在写给塔城专员巴斯拜·楚拉克巴平等人的信中指出:“人民这一词的含义包括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全部的人们,因此,也包括汉族人民。……要改变我们过去片面的认识,我们的人民过去所受的压迫不能怪罪于汉族人民,那是汉族专制统治者们的罪过。……因此,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工作。”<sup>①</sup> 这表明阿合买提江对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和对群众教育工作的重视。三区领导人回到三区后,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整顿便悄然展开。阿合买提江等人严肃地指出欺侮、迫害汉族百姓的事件仍在继续,这种情况不利于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坦诚地表明“不隐瞒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要揭发这些错误,找出产生错误的根源,从而去清除这些错误”<sup>②</sup>。关于错误的根源,进步分子认为,除了初期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极力蛊惑、煽动外,少数民族群众因长期以来受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误把普通汉族群众与汉族统治者同等对待,发生了敌我不分的错误。没有看清汉族百姓也是与少数民族群众一

<sup>①</sup>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38—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sup>②</sup>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13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样受本民族统治者剥削、压迫的,因而在本质上也是反对本民族统治者、属于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的。阿合买提江还特别提到汉族民主分子对三区革命的支持,他说:“乌鲁木齐的一批汉族民主主义者,于1945年为配合我们抢渡玛纳斯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准备起义。在乌鲁木齐的一批汉族民主主义分子同我们一道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和平条款’之后所实行的反动政策而进行斗争活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我们过去所采取的反对一个整体民族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正确的路线。”<sup>①</sup> 关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危害,进步分子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正中企图利用汉族与本地民族之间的隔阂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下怀。因此,对于民族解放革命来说,“大汉族主义的危害性有多大,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性也就有多大”<sup>②</sup>,“我们本民族的解放、平等和自由的问题,只有国内各民族的民主主义者,进行同志式的联合奋斗,才会得到保障”<sup>③</sup>。这些论述发人深省,无疑对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群众都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三区领导人还非常重视对青少年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1947年1月13日,阿合买提江在伊宁维、哈、柯俱乐部对伊宁各学校教师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sup>①</sup>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7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sup>②</sup>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7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sup>③</sup>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7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指出教师应该加强学生的民族团结的教育,增强他们的民族平等观念。

除了在思想上对各族群众进行深刻教育外,三区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政策,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加强各民族平等、自由的发展,并惩处了一些严重侵犯汉族百姓利益的分子,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7年9月21日至27日和10月下旬,三区先后召开蒙古族人民代表大会和锡伯族—索伦族代表大会,强调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号召各民族积极行动起来,为和平条款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会上分别成立了蒙古族文化协会和锡伯族—索伦族文化协会。三区还提倡和建立了汉族文化协会,各民族都有了用本民族语言培养本民族子女的学校。1949年4月19日,新盟中央组织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为解决汉族子女上学问题,决定增办汉族学校,由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安尼瓦尔·汗巴巴、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等人组成专门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三区还克服经济困难,帮助各民族出版本民族的报刊。到1949年5月,伊宁出版维吾尔、哈萨克、汉、俄罗斯、锡伯、蒙古等六种民族文字的报刊杂志,尽量编印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课本,吸收了各民族的优秀干部参加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各地行政部门的正职、副职以及各科、股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当地人数较多的民族中配备的。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成立后发出的第一个文件《新盟告全省人民书》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要建立包括汉族在内的各

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指出:“我们相信,生活在我省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汉族、回族、乌孜别克族和其他民族,为了永远消灭贫困落后无权的奴隶地位,而团结一致的话,新疆就可以建成一个和平、友爱、正义、真理、自由的社会。”<sup>①</sup> 这表明各民族在三区内政治上的一律平等,特别是三区已将汉族群众与汉族反动统治者区别开来,并将汉族人民作为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的成员。对于残存的危害汉族群众的不法行为,三区领导特别重视,要求各地司法部门采取强有力措施予以严厉打击。1948年1月22日,阿合买提江写信给塔城汉文会,表示要严肃处理塔城最近一段时间里接连发生的几起汉族群众被杀、财产被抢的事件。他在信中指出:“无论任何人、任何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受法律保护。杀害罗德、王华文、王茂苏等人的刽子手,将会根据其罪行,受到严厉的惩处。为此,我已给司法部门做了专门指示。请你们放心,无论任何时候,司法部门都会严惩此类事件,你们将会感到我们的法律部门是真正为各民族人民公正办事的。”<sup>②</sup>

1949年8月,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来到新疆伊宁,受到三区领导人的欢迎。阿合买提江等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到处在

<sup>①</sup> 三区革命史资料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文件选编》(送审稿),1994年2月,第6页。

<sup>②</sup>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第4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偏僻地区的他们,并派人来此联络,使他们感到很大的兴奋”<sup>①</sup>。他们积极协助邓力群工作,提供三区各方面情况报告给中央,并欣然接受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邀请。他们对毛泽东主席在邀请信中所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句话感到非常满意。从此,三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区革命随之汇入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1949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三区革命所追求的解放全新疆的目标得以实现。

三区革命终于走上了新疆少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当然,三区革命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过严重的分裂、独立、反汉排汉的错误,但在三区进步分子的领导下,顶住了强大的民族分裂主义的压力,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sup>①</sup> 《新疆和平解放》,第13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 四、新疆解放初期粉碎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

新疆解放前夕,国内外反动势力不甘心在新疆的失败,他们相互勾结,负隅顽抗,妄图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他们使用一切卑鄙伎俩,竭力煽动民族仇视,制造民族分裂,策动反革命叛乱,妄图把新疆从我们祖国分裂出去。因此,新疆解放初期面临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

### (一)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伊斯兰共和国”胎死腹中

1949年6月,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会谈过程中苏联方面提供情报:美帝国主义企图插手新疆,策划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地方军阀势力撤到新疆,与当地反动势力相结合,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此阴谋如果得逞,将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危害,对苏联也极端不利,解放新疆的阻力就会更大。苏方建议中国方面加速向新疆进军,粉碎帝国主义阴谋。刘

少奇将此情报转报毛泽东主席,建议加速解放西北的进程,提前进军新疆。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决断,将进军新疆的日期从1950年提前到1949年底。

当时,美国驻迪化领事派克斯顿和副领事马克南正积极活动,千方百计地拉拢、收买马步芳等地方实力派,同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尧乐博斯、伊敏、艾沙之流相勾结,紧锣密鼓地策划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

马步芳是个很有野心的人物,号称西北一霸。以他为首组成的“马家军”有一定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西北局势。1949年5月24日,马步芳接替张治中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独揽了西北军政大权。马步芳一向把新疆看作他的势力范围,他认为新疆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同回族信仰是一致的,信徒都是穆斯林,利用宗教很容易鼓动和迷惑群众。马步芳说:“新疆是在我手里,新疆有我的军队,新疆人民听我的话,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sup>①</sup>

1949年夏,扶眉战役后,西北地区国民党胡宗南军队所剩无几,马步芳的马家军基本上没受什么触动,他的五万多人马控制着青海、宁夏和甘肃部分地方,又多是骑兵,机动性大,有一定战斗力。美国看上了马步芳,国民党也在马步芳身上下赌注,要他在西北对抗人民解放军。

<sup>①</sup>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3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2月版。



马步芳则企图在青海、宁夏顶住共产党，控制甘肃，以新疆作为退路，准备大干一番。驻新疆国民党骑五军军长（后整编为骑兵第一师）马呈祥是马步芳外甥，新疆军权也部分地控制在马家军手里。这样，马步芳不仅有西北军政长官的头衔，而且兵权在握，确是西北地区权势最为显赫的人物。

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伊敏、艾沙之流，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也把负隅顽抗的希望寄托在马步芳身上。1949年6月，尧乐博斯到兰州找马步芳试探口气。马步芳很早就垂涎新疆，双方一拍即合。从此，新疆这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马步芳紧紧勾结在一起。尧乐博斯一伙还阴谋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武装，然后推翻包尔汉为首的新疆省政府。尧乐博斯想取代包尔汉当新疆省主席，让伊敏、艾沙、安绪武为副主席，马国义为民政厅厅长，以及与马步芳集团有密切关系的张韶为省政府秘书长。为实现这一图谋，8月，艾沙在马呈祥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新疆各族人民向马长官致敬献礼团”，艾沙任团长，带领省政府宣传委员会所属的新疆歌舞团，乘马呈祥的专车前往兰州。艾沙向马步芳献了旗，赠送了礼物：战马500匹，黄金5000两，现洋10万元。还声称要组织10万维吾尔族青年给马步芳当兵，并请马步芳向蒋介石提出允许他们在西北组织一个回教“独立国”。马呈祥则帮助伊敏组织了一个“维吾尔青年训练班”，番号为“骑一师工兵连”，在迪化郊区头屯河地区进行秘密训练。

美国也积极活动,密切配合。美国驻迪化领事派克斯顿和副领事马克南出面召集会议,发放枪支、弹药,策动乌斯满、贾尼木汗等人发动武装叛乱。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获悉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活动后,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加速西进,速战速决,消灭其有生力量,并要堵截“马家军”不使其逃窜新疆。总的战略意图是“不叫胡马渡天山”,粉碎敌人分裂新疆的阴谋。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报,指示西北战场要加速向未解放地区推进,年底前进军新疆,把“马家军”消灭在新疆境外。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意图,彭德怀分兵两路,扫荡西北残敌。右路大军在许光达、王世泰率领下,翻越六盘山,沿西(安)兰(州)公路进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兰州,经五昼夜奋战,8月26日攻克兰州,马步芳主力两万七千余人被歼。马步芳见势不妙,逃回青海,企图固守老巢。左路军第一兵团将士在王震率领下,攻克宝鸡、天水后,挥戈甘南,强渡洮河、黄河,直捣马步芳老巢西宁,并于9月6日占领西宁。这次决战的胜利,加快了解放大西北进程。宁夏马鸿逵残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打击下,9月20日通电投降,23日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国民党胡、马残部约四万余人退守河西走廊张掖至酒泉一线。为全歼胡、马残部于河西走廊,完成解放新疆的战略部署,左路军第一兵团从西宁出发,跋涉百余公里的沼泽地,翻越风雪弥漫的祁连山,直插张掖。右

路军第二兵团从兰州出发沿兰新公路向西北追击,越终年积雪的乌鞘岭,经山丹,急行军17天,9月21日与第一兵团会师张掖,迎头堵截了妄图逃往新疆之敌的退路。在人民解放军威逼之下,集结在酒泉地区的国民党残部四万余人,宣布起义投诚。至此,西北的陕、甘、宁、青四省均告解放,新疆之敌孤悬塞外,人民解放军兵临玉门关下,新疆解放指日可待。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新疆各族人民积极配合,开展了反分裂求解放的斗争。进步人士包尔汉一方面在许多场合反复向维吾尔族及新疆各族人民表明自己的观点:只有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新疆才有前途。另一方面,他义正词严地批驳伊敏等分裂国家的谬论,指出: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如果说新疆只有维吾尔族一个民族的话,在新疆的范围来说就是犯了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在全国范围来说,就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当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国民党主战派合谋妄图分裂新疆、阻挡新疆各族人民解放的关键时刻,包尔汉还联络进步民主人士涂治及地下进步群众组织,协同军界顺应历史潮流,走上了和平起义道路。新疆进步的地下群众组织战斗社、先锋社等也用各种方式,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军队顽固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散发传单,出版

报纸,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表达新疆各族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愿望。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以陶峙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和以包尔汉为首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宣布起义,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仅使新疆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而且也使长期猖獗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一批老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美国策划以马步芳为首的反动势力拉拢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在新疆搞“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出笼,即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被彻底粉碎了。

## (二)平息伊宁、昭苏、巩留等地的反革命叛乱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策划在新疆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的阴谋被粉碎后,又竭力策划武装叛乱,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疆。

在此期间,北疆一些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也十分嚣张。伊宁发生了以热合曼诺夫为首组织发动的分裂暴乱事件。1950年初,驻伊宁的五军城防营排长热合曼诺夫发起组织了名为“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党伊犁组”。3月28日,这个反动组织在伊宁幸福园街买买提街长家中召开

了第一次会议,举行宣誓仪式,并决定发展成员,壮大组织。同时,在伊宁大肆散布谣言,散发标语、传单,叫嚣“打倒共产党,为解放新疆而斗争”、“我们的祖先生长在东突厥斯坦,高举星月旗,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奋斗”。7月初,他们又煽动少数反动势力、宗教上层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上街游行示威,公然叫嚣把新疆的伊、塔、阿三个地区并入苏联。热合曼诺夫在其阴谋败露后,孤注一掷,7月26日以城防营100人为基础,并纠集社会上的一批地痞流氓,发动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原计划刺杀我伊犁区党委领导后,进攻巴彦岱监狱及五军军法处,收罗在押犯人,与巴克也夫率领的一连叛军会合,再同山里的土匪勾结起来,扩大暴乱规模。我侦破热合曼诺夫的分裂叛乱活动后,当即采取果断措施,收缴了企图叛乱的部队的枪支,并逮捕了巴克也夫等骨干分子。热合曼诺夫于7月24日率叛兵携械前往伊宁县吐鲁番圩孜潜藏,并杀害了前去拘捕的城防营政治指导员,后流窜于伊犁各乡村,继续秘密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他在伊犁各地先后发展了8个小组,总人数在1500人以上。8月17日,在伊宁县克西拉克塔米村地下室将热合曼诺夫捕获,并在其家中查获步枪73支、机枪6挺、大刀91把,以及参加反革命组织的誓词、申请书、证件等大批罪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还派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有关负责人到伊宁做疏导教育工作,随后赛福鼎·艾则孜代表新疆分局到伊宁处理这一事件。由于宣传疏导工作做得

及时,广大群众明白了真情,分清了是非,因此,很快粉碎了这一分裂阴谋,制止了一场暴乱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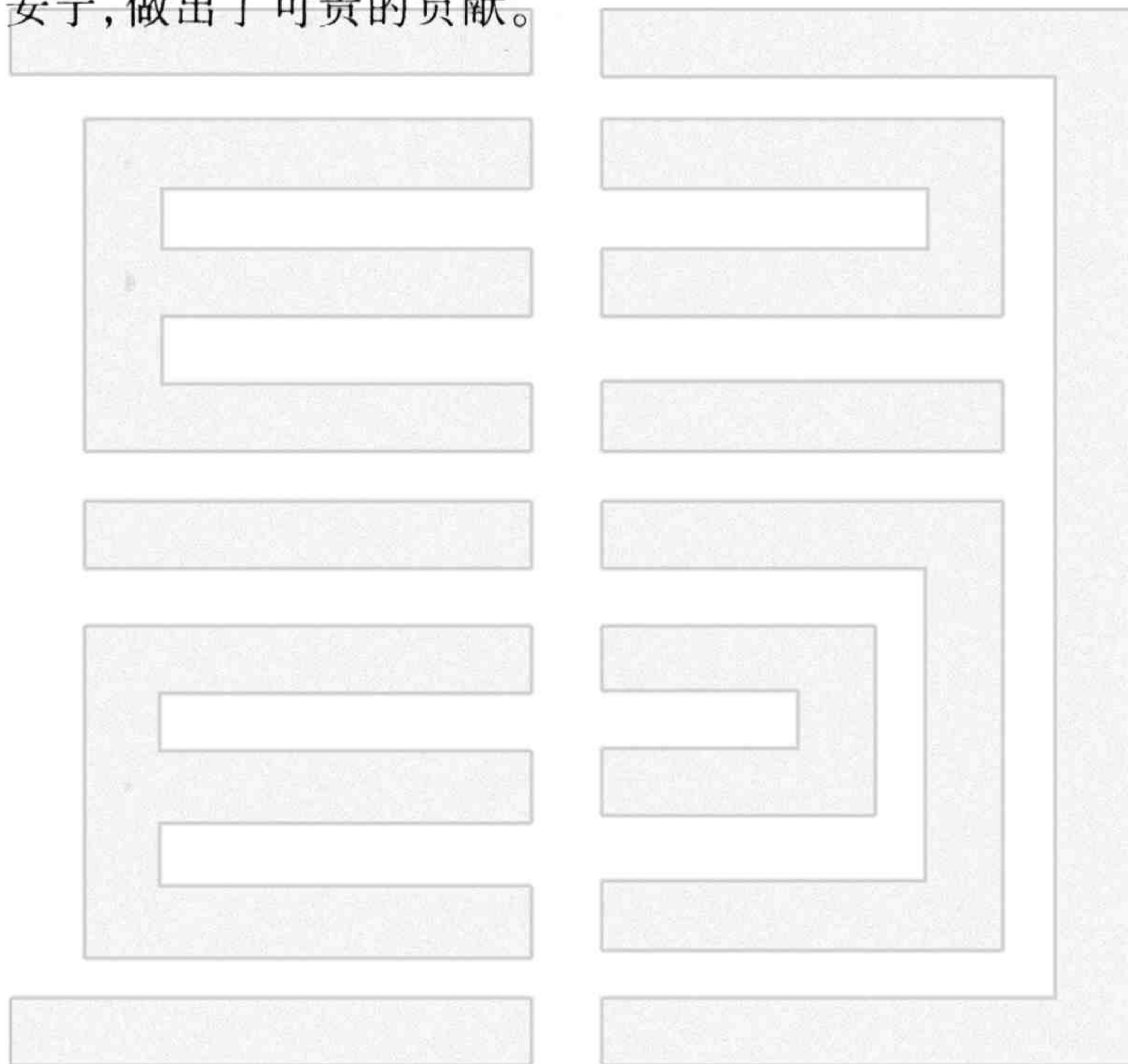
热合曼诺夫武装叛乱事件被粉碎后,1950年8月18日,昭苏又发生一起反革命武装叛乱。这起暴乱同乌斯满有关。1950年2月,乌斯满派人到昭苏活动,与当地驻军伊得利斯·奴尔派斯(哈萨克族,苏联十月革命时来新疆,三区革命时加入民族军)、马木尔汗(昭苏县夏塔区区长)勾结,阴谋叛乱。8月18日,率部36人,携带步枪36枝、机枪2挺,抢夺群众马匹,叛乱出走。中途停留夏提村,召集群众百余人开会,叛匪骨干艾德里斯·吾斯塔尔煽动:“今天是主麻日,全疆约定今天暴动”,“我们三区过去革命,是为了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家”,并恶毒地造谣:“共产党已把阿合买提江等谋害,现在又来压迫我们”,“共产党领导一切,排斥我们,限制我们,没收财产,消灭宗教”,接着又为自己壮胆,“美国已在苏联投下原子弹,我们是在美国援助下,建立伊斯兰政府”等等。另一个叛乱骨干夏维里大毛拉叫嚣:“我们不暴动,两年后就会被消灭”等。叛匪在夏提村纠集两百余人参加暴乱,自称“伊斯兰政府忠义军”,随后窜到阿克苏村,继续煽动、裹胁当地群众参加叛乱。当这股叛乱分子被我人民解放军重创后,流窜于尼勒克、特克斯、昭苏等县。1950年12月24日,人民解放军在公安机关的紧密配合下,将该股匪徒全部围歼或捕获,叛乱被彻底平息。

昭苏反革命武装叛乱平息后,1951年10月27日,伊

犁地区巩留县又发生了以马力克·阿吉为首的反动牧主、地主、恶霸、惯匪和反动宗教势力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马力克·阿吉纠集匪徒 41 人，捆绑了巩留县莫合尔乡农会主任阿不都沙也提及农会会员、治安员 6 人，然后召集匪徒们开会，马力克·阿吉煽动说：“巩留、特克斯、新源明天同时暴动，我们要统一行动，谁要不愿意参加，格杀勿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全世界都起来了，你们都要跟我们走”等等。随后马力克·阿吉自封为暴动“总指挥”、艾太黑牙为“副总指挥”。会上众匪徒举行了宗教宣誓仪式。当时聚集匪徒 110 名，裹胁群众二百余人。10 月 28 日凌晨开始暴乱。首先袭击了在霍尔吉土哈依地方担负牧羊任务的解放军，打死解放军 4 名，抢走 9 枝步枪。暴乱发生后，巩留县委一面教育安定群众情绪，一面发动群众防范匪徒偷袭，在军民密切配合下，仅 3 天时间，叛匪大部被歼。1952 年 1 月 8 日，余匪在拜城以西盐水沟、玉儿滚一带被人民解放军全部围歼，生俘马力克·阿吉等匪徒，暴乱全部平息。

解放初期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搞的这几起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叛乱活动，均在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的打击下被粉碎了。在反对分裂、平定叛乱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同共产党和解放军站在一起，送信、带路、传送情报，积极参加平叛。有的民族干部被土匪绑架，逃出后，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到公安机关和解放军所在地报告情况，并积极协助围剿叛匪。叛匪所到之处的各民族群

众,在威胁、恐吓面前,毫不惧怕,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倒行逆施,叛乱分子十分孤立。新疆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为新中国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宁,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 五、50年代和田人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

1954年,党所领导的镇反、减租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广大农民斗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但是被推翻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千方百计欲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蒋介石集团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解放前逃往国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也乘机兴风作浪,他们通过写信、派遣特务等方式与和田的分裂势力互相勾结,积极策划暴乱,妄图分裂祖国,成立伊斯兰王国,于是,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在和田展开了。

### (一)伊敏的阴影

穆罕默德·伊敏系和田洛浦县人,是个冥顽不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1933年组织伪政府失败后逃往克什米尔,继续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一心想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他故意歪曲新疆历史,杜撰《东突厥斯坦历史》

一书,为其分裂新疆制造历史“根据”。以后伺机投靠了国民党。1946年,新疆组织联合政府,伊敏被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为新疆省民政厅厅长,不久又成了省政府副主席。这样,他就凭借手中的权力,肆意宣扬民族分裂主义,并组织突厥主义青年团、青年党等反动组织,猖狂地进行分裂活动。解放前夕,伊敏派他的老婆阿米娜前往和田等地进行分裂宣传,煽动青年上街游行,叫嚣要使“新疆脱离中国”。新疆解放在即,伊敏又亲临和田,召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及反动毛拉,为他们布置潜伏任务,然后匆匆逃往国外。据查,接受任务潜伏下来的达百余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与伊敏联系,接受指示,成为后来历次暴乱中的骨干分子。

1949年12月,被伊敏煽动起来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妄图趁解放军未到达和田之机,发动暴乱,阻碍解放军进驻和田。他们组织人员,准备了几千根大头棒,还拟定了成立分裂政权的计划。由于解放军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连续行军,天兵天将般突然出现在和田,和田的暴乱阴谋才被阻止。

伊敏逃亡国外后,继续从事颠覆新疆的分裂活动,成立组织,搜集情报,联络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分子,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据1956年10月统计,和田地区有解放后返国的阿吉、脚夫153人,其中接受伊敏等经济资助的28人,有11人负有间谍任务,与伊敏在新疆的亲信建立联系,传递信息,发展反动组织,有的长期潜伏,伺机活

动。如墨玉县的那依甫阿吉曾出国3次会见伊敏和阿米娜,返国后成为和田暴乱的首要骨干。和田暴乱发生后,伊敏的祝贺信和对暴乱的指示也是通过这些人的传递。

同伊敏相呼应的还有莎车的反动宗教头目、依禅教的大依禅,名叫阿尤甫·哈日,他经常以讲经为名,召集宗教人员,宣扬民族分裂主义思想。解放前夕,他在莎车荒地讲经堂召集追随者举行应变会议,商讨阻止解放军进军新疆的对策,并制定了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同时委任了宗教头目,要他们积极发展依禅教徒,实际上是以发展教徒为幌子,为今后的反革命活动积蓄力量。不久,阿尤甫·哈日在绝望中死去,木沙海力排继承师钵,继续从事民族分裂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木沙就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又活跃起来。1950年9月,木沙召集党徒在荒地讲经堂举行预谋暴乱的会议,指定了南疆数城暴乱组织的负责人,并决定首先在和田举行暴乱。但由于当时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各族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很高,分裂分子害怕发动暴乱会引火烧身,只好更加小心地用宗教将自己掩饰起来,以待时机。

可见,伊敏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及其宗教势力在和田有很深的影响,成为50年代和田暴乱的主要祸根。

## (二)大毛拉要当“斯拉木政府”的主席

伊敏的追随者阿不都·依米提是和田地区的依禅教大依禅(教主),但一向怀有政治野心。他追随一群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绞尽脑汁要使新疆或新疆的某一地区脱离中国,他好捞个一官半职。50年代,他利用本地教徒对他的迷信心理,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分裂,连续策划了四次颠覆人民政权的分裂活动,成为和田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总头子。

1954年12月31日,和田发生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反革命暴乱,暴乱总指挥就是阿不都·依米提。

当时,和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开始。基层政权的一些乡村干部,由于工作方法简单,缺乏应有的政策水平,出现了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引起群众的不满;而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由于执行政策中出现的偏颇而造成的群众生活困难,又加剧了群众的不满情绪。以阿不都·依米提为首的民族分裂分子以为时机已到,便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煽动暴乱。

早在1954年初,依米提就开始行动了。当年2月,正当他感到势单力孤之时,遇到了一个名叫帕提丁·买合苏木的人。此人是伊敏的积极追随者,曾接受过伊敏布置的潜伏任务,解放后犯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刚刚刑满释放,即与依米提一拍即合,他们商量决定仍以宗教为掩

护,秘密联系党徒,积极扩充力量。5月,他们召集骨干分子,组织了“斯拉木政府联盟委员会”,依米提自任主席。其后,又多次开会,讨论组织纲领和行动计划,并逐步将计划付诸行动。

6月,依米提亲自来到了墨玉,怕暴露行踪,便悄悄藏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人迹罕至之处,指挥其弟阿不都·色买提大毛拉、帕提丁和买买提·依布拉音等人的行动,督促他们加快暴乱步伐。在依米提的亲自督阵下,阿不都·色买提、帕提丁等真假宗教头目更加频繁地出入和田、墨玉、洛浦等地的一些宗教场所和教徒家中,煽动他们的不满情绪,鼓动他们反对政府。并通过宗教仪式威逼教徒们手捧《古兰经》,宣誓效忠依米提大毛拉,为建立“斯拉木政府”进行“圣战”。

1954年12月21日,“斯拉木”组织的骨干成员在同伙买买提·库莫里外提家里举行第三次会议,也是暴乱前的最后一次“斯拉木”的核心会议,会议选出了“斯拉木”政府的11名委员,确定了各部部长。依米提为主席兼军事部部长,阿不都拉·哈孜大毛拉为副主席,帕提丁为军事部副部长兼秘书长,那斯尔大毛拉任总裁判长,此外还有外交、财政、民政、教育、卫生等各部部长。会议还确定了暴动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他们决定在1955年1月1日举行暴乱,并拟定了占领城市后各部门的任务分工及工作条例。会议结束后,他们便开始分头行动,召集各自的人马,再次祭起“圣战”旗号做最后的煽动。

12月27—28日,帕提丁在劳改队附近的玉素甫大毛拉、尼亚孜拜克二人家里聚集两百余名依禅教徒以做“杜瓦”为名,进行组织动员,欺骗宣传。31日又率众集体宣誓:为保卫伊斯兰而战,生为英雄,死为烈士。随后,向众人分发大头棒、匕首、砍刀、绳索等暴乱凶器和手电筒、馕等物品。

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加紧活动的同时,和田地委接到了一位在墨玉县政协任职的宗教人士的报告,说墨玉县的依米提大毛拉准备利用宗教集会进行暴动,建立“斯拉木政府”。和田地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制订预防措施,并指示各有关单位加强警戒。同时在和田、洛浦、墨玉三县召开宗教人士座谈会,宣传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防止他们上当受骗。

12月29日,艾合买提率领一伙人准备袭击农三团,发现农三团已有戒备,不敢贸然发动进攻。便商议趁第二天(30日)的巴扎日人多,伺机煽动群众暴乱。30日,艾合买提等来到墨玉县城,地委派出的武装宣传队正在召开群众大会,教育群众警惕坏人诱骗。艾合买提一伙惟恐被识破,不敢久留,迅速溜走。31日,艾合买提等见处处设防,暴动无望,便率一伙暴徒抢劫了五区供销社。地委获悉后,立即派农三团副参谋长杜秀全率众赶来,经群众举证,当场拘捕了首要分子艾合买提。

这伙企图暴乱的分裂分子被瓦解了,但是另两路人马仍在按照计划行动。31日夜里,阿不都·依米提亲自

出马,率帕提丁以下百余人潜到和田二十里巴扎河曲劳改队,包围了砖厂中队的院子。他们乘哨兵不备,将其乱刀砍死后一拥入院。其中五六个人撞入指导员冯臣生宿舍,冯未及起床即被乱棒打死。班长王占奎闻声持枪冲出,开枪击毙暴徒1名,被身后暴徒偷袭击中头部牺牲。这时战士宿舍大门已被暴徒封死,战士们据内向外射击,击毙暴徒1名,击伤2人。暴徒们乘战士装弹之机拥入室内,室小人多,步枪无法发挥作用,双方展开肉搏,由于敌众我寡,室内战士被悉数杀死。另一伙暴徒冲入中队长王振海宿舍时,王正和司务长算账,在搏斗中司务长被打死,王振海乘乱只身逃出,前往大队部报告。

和田地委得到暴乱的消息后,立即派出了平暴公安部队,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制订平暴措施,布置城市安全防范,同时指示平暴武装要本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严办”的方针,认真区分首恶分子和胁从者。我方完全自卫,不轻易开枪。

暴乱分子在劳改中队得手后,帕提丁立即将抢夺的枪支发给骨干分子,命令将监狱大门打开,鼓动犯人参加暴乱,一块去攻打和田。随后又胁迫胡奎(原国民党上校补给站站长,被我判刑20年,在劳改队开车)开车运送他们去和田。行至途中,依米提发现犯人们并不想随他暴乱,原来被他骗来的人也越来越少,便招呼头目们去附近一家人的院子里开会,决定分头隐匿潜藏。待他们开会回来,发现司机也不见影了,心知不妙,便都自顾自地逃

走了。

不一会儿，地委派出的平暴人员已乘车赶到，当即组织搜捕，共捕获暴徒三十余人，并缴获了“斯拉木委员会”的组织纲领、成员名单、会议记录、行动计划、印章、油印机及大批布告、旗帜、棍棒、刀斧等。方才同依米提一同开会的6名首要分子全部落网，只有依米提一人，心怀鬼胎，及早逃脱了。1955年1月1日，公安人员又在和田街上捕获十余人。这些人手持木棒或刀斧，身染血迹，显然是参加暴乱的匪徒，这时，他们认为和田已被大毛拉占领了，正大摇大摆地准备去邀功请赏。

准备攻取洛浦的一路人马于31日晚由依明大毛拉带领埋伏于和田城东碱滩，买买提明大毛拉率六十余人埋伏在古江庄一带，专等依米提·帕提丁攻下砖厂后，一同去攻打洛浦。但等到天亮，得到的全是一些骨干分子被抓的消息，依米提大毛拉也顾不上他的教徒们，自己抢先逃命去了。这伙人知道等下去凶多吉少，便一哄而散，十余名没来得及逃去的小头目被前来巡逻的公安人员抓获。至此，暴乱被迅速平息，整个局势得到控制。

以阿不都·依米提为首的和田暴乱，完全是一起以颠覆国家政权、分裂祖国为目的的反革命暴乱。在他们发布的文告中明目张胆地说道：“宗教的敌人——共产党已占领了穆斯林的祖国，抢劫了穆斯林的土地区、矿产和其他财物，把自己的法律放在伊斯兰教规之上”，“现在让我们民族劳动，又不让我们民族当劳动果实的主人”，“伊斯兰



法律上说过,假如异教徒侵占了穆斯林的地方,反抗异教徒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义务,现在已经到了暴动的时候了”。据此,1955年1月1日,和田地委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各族人民揭露暴乱分子所犯罪行,号召各族群众擦亮眼睛,识破暴乱者的真面貌,不要再受骗上当。同时正告被胁迫人员立即放下武器,协助公安机关捉拿骨干分子,限令参与暴乱者自动前往公安机关登记,以争取宽大处理。

根据中共新疆分局的指示,和田地委迅速作出部署,捕暴徒,抓逃犯,妥善处理了善后事宜,稳定了局面,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协助下,捕获参与暴乱人员一百四十余人,自动投案七十多人。经查证,除将27名犯有罪行的骨干分子予以逮捕外,其余人员均予以教育释放,取得了首次平暴的胜利。

解放前夕,依米提参加了阿尤甫·哈日为阻止解放军进军新疆而召开的应变会,会上阿不都·依米提积极为解放后如何进行破坏活动献计献策。由于表现活跃,阿尤甫·哈日委任他为“海力排”(教职,位次于依禅),要求他积极发展“苏皮”(依禅教徒),扩大依禅教派的势力。伊敏出逃前,在南疆布置潜伏任务,阿尤甫·哈日又派依米提为专使去拜见伊敏,商讨对策。依米提对这份差事深感荣幸,受宠若惊。见到伊敏后,他首先转达了哈日的意见,然后怀着一线希望,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也想跟随伊敏出国,也好早晚请教。对于内心的恐惧,他不好直接

说出口,只好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模样。伊敏根本不看依米提略带紧张又充满期待的眼睛,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们是阿訇,共产党对你们不会怎样。我多则三五年,少则两三年就回来。你们留下来发展苏皮,待我回来,一道消灭共产党,建立斯拉木政府,那时,你就是大功臣。”依米提见伊敏一口回绝,很是懊丧,但想到后一句话,也只有强打精神,死心塌地干下去了。

依米提回到和田后,开始着手扩展依禅教势力,培植亲信,特别注意物色30年代参加过伊敏暴乱的人,加以重点培养。依米提虽然在教徒面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一派大教主的模样,但内心却既焦急又恐慌,巴不得马上就暴乱成功,免得成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1950年3月,依米提再次来到莎车,向阿尤甫·哈日汇报自己发展教徒的情况,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进行暴动了,并请哈日对暴动时机、具体计划提出意见。阿尤甫·哈日认为:“人数还是太少,教徒还未扩展到全专区。”不同意马上进行暴动,并劝他耐心等待,继续扩充势力。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也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认为时机已到。9月,木沙海力排遵照阿尤甫·哈日死前的安排,召集骨干分子开会,决定首先在和田举行暴动,因为和田是伊敏的家乡,依禅教派势力大,又有伊敏打下的基础。依米提欣喜若狂,随即投入行动。但在串联组织暴乱过程中他才发现,教徒们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热衷于暴动,他们分得了田地、

财物,加入了农民协会,纷纷称赞共产党好。碰了几次钉子之后,依米提担心起来,弄不好,暴动不成,自己倒先被告发出去。于是,只好取消计划,继续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好在他是阿訇,共产党允许信教,他有合法的身份。于是,依米提走乡串户,四处传教,发展教徒;并积极培养海力排,再利用海力排去发展教徒。从1950年到1954年,依米提在和田、墨玉、洛浦、皮山、叶城等地先后培植委任海力排28名,发展教徒一万五千余人,他成了和田地区依禅教派的大依禅,影响几乎遍及整个和田地区。由于他手下海力排及亲信教徒的大肆吹捧,以讹传讹,依米提在教徒中的声名大振,在墨玉一带,他竟被教徒们奉为“圣仙”。

阿不都·依米提侥幸得以逃脱,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仙气”,只不过他比别的暴乱头目更加狡猾,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

为了争取依米提自动投诚,人民政府对他采取了宽容政策,指出他只要停止犯罪,主动投案,将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但阿不都·依米提不仅无悔改之意,反而继续作乱。他又与墨玉县的巴海大毛拉、巴拉提大毛拉、加帕尔、奴尔强格等人策划新的暴乱。他们通过密谋决定:先攻打墨玉县九区农三团,夺取武器后攻占墨玉和和田县城。随后,纠集一批宗教极端分子和伪军政官吏,以作“乃玛孜”为名,召集会议,筹集钱粮、武器,制作暴乱凶器。还通过亲信苏皮勾结清真寺的伊玛目、经文学校的

塔里甫以及反动地主恶霸、地痞流氓扩充组织,并散布谣言:“农三团是起义部队,里面有我们的人,区长中有人支持我们!”还欺骗群众说:“全世界都在闹伊斯兰,明天伊斯兰政府就会在世界上成立。”

1956年3月9日深夜,200名手持刀斧棍棒等凶器的暴徒秘密集中于农三团附近,准备偷袭农三团夺取武器。10日拂晓,奴尔强格、加帕尔、尤奴斯哈尔等人手持凶器带头向农三团驻地冲去。途中,乘一位巡逻战士不备,暴徒将其连劈数斧致死,并抢去枪支。有了枪,暴徒们气焰更加嚣张,直扑团场附近的侦察组。侦察组的战士迫于无奈,开枪反击,将冲在前面的4名暴徒击毙,其余暴徒四散逃开。农三团武装人员及干部群众闻声赶来,当场逮捕骨干分子29名。

暴乱失败了,躲在幕后的依米提却不死心,鼓噪继续暴动。在依米提的鼓动下,巴海大毛拉、吐逊阿洪依玛目、艾合买提阿吉等人窜到五区、九区的清真寺内,以宗教的名义向做礼拜的教徒进行煽动,蒙骗胁迫三百余名男女教徒各持凶器,狂叫着“打倒共产党”、“杀死异教徒”、“斯拉木政府万岁”等口号向五区区委进攻,途中被闻讯赶来的和田民警中队拦住。带队领导人员劝阻暴乱者遵守政府法令,回家参加生产。暴乱分子不但不听,反而组织暴徒向民警行凶,抢夺武器。为了自卫,民警中队开枪击毙了3个手举白旗指挥暴徒行凶的头目。这时,区委的领导也赶到现场,向在场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

暴乱策划者的罪恶,号召群众不要上当。在区委领导的宣传教育下,受骗群众开始醒悟,纷纷扔掉手中刀斧,并指认了进行煽动并行凶的犯罪分子,巴海等12名骨干分子被当场捕获。同时缴获来福枪3枝及大批刀斧、匕首、棍棒等凶器,第二次暴乱被平息。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躲在暗处不敢见天日的依米提此时就像一个阴险的幽灵,到处煽阴风,点鬼火。依米提在策划墨玉暴动的同时,还勾结洛浦的阿不都卡德尔、艾伯都拉等人策划了洛浦暴乱。

艾伯都拉原来就是依米提的亲信苏皮,对依米提言听计从。他曾在洛浦的阿森木麻扎和阿不都卡德尔一起学经,那时两人就经常在一起发泄对人民政府的不满。现在得到依米提的支持,于是便拉拢解放后受过处分、打击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地痞流氓,成立组织,准备暴乱。1956年4月13日,阿不都卡德尔、艾伯都拉召开了预谋暴乱的首次会议,研究发展成员、攻城计划及暴动日期。此后又多次开会,密商搜寻枪支武器、筹集经费等问题。在暴乱组织手法上,除利用宗教煽动教徒参加暴乱外,还借群众对粮食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中某些偏差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说什么“与其这样受罪,还不如和政府干上一场”,并提出要成立斯拉木政府,占领粮仓和物资仓库,分粮分物,以此煽惑利诱群众参加暴乱。5月3日,阿不都卡德尔召集五十余名骨干分子开会,正式打出了“斯拉木共和国”的旗号。阿不都卡德尔任“共和国”主席

兼暴动总司令，艾伯都拉为副主席兼副司令，同时还任命了政委、团长及4个营长。阿不都卡德尔进行了战前动员：“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应该参加战斗，闹斯拉木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会后，艾伯都拉还率暴徒们在戈壁滩上进行了军事演习。

1956年5月4日早晨，阿不都卡德尔、艾伯都拉等纠集反动宗教头目及抗拒改造的敌对分子两百六十余人，同时裹胁部分农业社社员，打着标明“斯拉木共和国”的旗帜、狂呼“打倒共产党”、“斯拉木共和国万岁”、“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万岁”的口号，手持刀斧、匕首、大头棒等凶器，冲向洛浦四区，分别袭击区政府，抢劫了粮站、物资仓库、合作社及信用社，杀害了公安干警哈买素甫和3名工作干部，打伤5人，同时绑架了区机关干部11人，抢走了区政府印章1枚、长短枪各1枝、人民币千余元及粮食等其他物资。阿不都卡德尔在杀人抢劫后，感到力量不足有些心虚。经商议，来到主玛麻扎，装神弄鬼地欺骗在那里做礼拜的教徒说：“麻扎上有面示，要我们组织斯拉木革命”，“只要我们一闹起来，伊敏就带队伍回来了。”遂将那儿的群众全部蒙骗出来，然后分三路向洛浦县城进攻。途中暴徒们用树木阻断道路，割断通往县城的电话线，沿途又裹胁部分农业社社员，使暴乱队伍一下子增加到一千三百余人，一窝蜂地向县城开去。

这时，和田地委已得到了洛浦四区暴乱的消息，一面派公安干警前往掌握情况，一面派出一批干部带武警战

士骑马前去平暴。在距洛浦 5 公里处,武装警察与前来攻打县城的暴乱队伍相遇。随队干部展开政治攻势,揭露少数分裂分子煽动暴乱的阴谋,劝阻暴乱者立即停止行动,不要上当。暴乱队伍在主谋者的煽动下,不听劝告,反而行凶打人,抢夺武警人员的枪支弹药,打伤干部战士多人。为避免激化矛盾,平暴指战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继续冒着被伤害的危险耐心劝阻。暴徒们把指战员的忍让视作软弱可欺,殴打、抢夺更加肆无忌惮。为防止暴徒抢枪后造成更大损失,平暴部队果断开枪,当场击毙行凶暴徒 15 名。至此,被裹胁在暴乱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开始醒悟,扔下手中凶器,帮助部队捉拿行凶抢劫者。公安人员逮捕了以阿不都卡德尔为首的骨干分子二十余人,平息了这场暴乱。

阿不都·依米提没想到费尽心机发动的千余人的暴动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平息了,又气又急,恨不得自己出马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但这时社会上追捕他的声势很大,他不敢轻易露面,整日提心吊胆,疑神疑鬼,生怕稍不留意,就会被人举报。虽说暴徒们呼喊的口号大都出自他之手,什么“生为英雄,死为烈士”、“为伊斯兰战斗而死,死后可以进天堂”等等。但他自己明白,那是假的,是专门骗那些愚昧无知的教徒的,他自己可不想死,也不想进什么天堂。

此时,人民政府仍在继续争取挽救依米提,政府通过依米提的亲属向他发出公开信,劝他投案自首,争取宽

大。但这时的依米提已决心顽抗到底，为了保险，他不得不蛰伏得更深、更隐秘。

不久，听说墨玉县的黑力其汗经常聚众坐夜念经，借机发泄不满。依米提又打起了算盘。黑力其汗是买力克艾孜乃提（1933年伪伊斯兰共和国副主席）的养女，也是他早期发展的苏皮，现年30岁，此人好逸恶劳因吸食麻烟、卖淫曾被公安局收容审查，最近又和一个叫艾山的麻烟鬼姘居鬼混。依米提决定利用此人拼凑力量，再次发动暴乱。

黑力其汗见教主亲自找上门来商量斯拉木政府的大事，大喜过望，遂死心塌地听任依米提摆布。自此，黑力其汗和艾山便打着依米提大毛拉旗号，利用当地群众浓厚的宗教意识，装神弄鬼，经常诱惑大批群众朝拜麻扎，乘机进行反动宣传，蛊惑人心。黑力其汗自称是天上的“仙女”，向朝拜麻扎的人说：“我们都是依米提大毛拉的信徒，要为建立斯拉木政府而战。”她还利用封建迷信愚弄群众说：“我们暴动后，有天兵天将相助。”与此同时，黑力其汗还用抽麻烟等方式拉拢一些烟鬼和流氓入伙。

1957年4月12日，黑力其汗、艾山召集骨干分子开会，筹划暴乱组织，黑力其汗和艾山为“斯拉木政府”的主席，此外还确定了副主席、暴乱司令及团长、参谋长等大小官职，决定4月17日——伊斯兰教封斋第17日举行暴乱。暴乱的方案是：先攻打和田县六区政府，然后依次抢劫银行、粮库、供销社，袭击缫丝厂，最后攻打和田县



城,建立“斯拉木政府”。

4月15日,黑力其汗等聚集了一百五十余人在和田六区麻扎进行暴乱前的准备。这时,和田县委已得到情报,为防止事态扩大,派出县区干部及公安干警二十余人前往现场平息事态。黑力其汗见政府派来工作人员,不但毫无收敛,反动气焰反而更加嚣张,竟带头持凶器殴打工作人员。由于工作人员中有宗教人士,黑力其汗惟恐群众听从劝阻,停止暴乱,竟当众脱掉裤子,肆意污辱谩骂,拼命煽动群众。在黑力其汗的煽惑下,众暴徒持凶器将工作人员及干警团团围住,大打出手。自治区政协委员、和田县政协副主席那斯尔阿吉被活活打死,3名干警被残害,县政协副主席买买沙力木甫提也被打伤,并抢去枪3枝,洗劫了死者身上的财物。和田地委派出的武警部队赶到后,黑力其汗狂叫着:“大家别怕,只要我们喊一声胡达,政府枪里的子弹就射不出来,那些卡甫尔(异教徒)就会跟我们走。……伊敏已带7000人占了塔瓦沟(和田八区),他们有飞机、汽车接应我们……”在黑力其汗的煽动下,仍留在现场的六十余名暴徒丧心病狂地向武警施暴。武警被迫开枪,将主犯艾山及吐尔地巴海击毙,击伤6人,逮捕37人,第四次暴乱遂告平息。

### (三)各族群众是反分裂的主力军

从1954年的第一次暴乱起,到1957年末,和田的民

族分裂分子共预谋策划并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阴谋暴乱案 14 起,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帮助支持下,其中 10 起在阴谋实施前就被粉碎,4 起暴乱也迅速被平息。在整个平暴过程中,各族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勇敢机智,采取各种方式同分裂暴乱分子作斗争,为平暴的彻底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和田第一次暴乱时,地委最初得到的消息就是由一位墨玉县的宗教人士报告的。暴乱头目依米提曾亲自找他谈话,希望通过他串联教徒参加暴乱,并许诺要委任他做依禅教的头目。这位宗教人士当面回绝了他,并斥责他的犯罪行为。随后,他又向政府做了报告,使地区领导和有关部门有了准备。

在暴乱过程中,墨玉县的暴徒准备偷袭农三团,他们强迫一位治安员在夜间给他们带路。这位治安员灵机一动,满口答应下来。但去带路时,他故意绕道行走,东绕西转,借口天黑难行拖延时间。赶到农三团附近时,天已黎明,这时,他又乘机摆脱暴乱队伍,及时向区委报告,和田领导机关由此掌握了暴乱队伍的活动情况。由于天亮无法偷袭,这股暴徒又转而去抢劫区供销社。一位治安主任得到消息后,孤身一人与暴徒周旋,自动放哨两昼夜不离岗位,并先后抓获暴徒 21 人,最后配合农三团派出的武装人员平息了这股暴徒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国家财产。

墨玉县四区农村的一位宗教人士得到分裂分子来此

串联教徒准备暴动的消息后,认为事情重大,连夜骑毛驴赶往县城报告。由于路远,加上走得太急太快,毛驴在途中累得趴下站不起来,这位阿訇心急如焚,顾不上心爱的毛驴,连奔带跑地赶到县城报告了敌情。

1956年洛浦暴乱时,三区一乡的地主儿子阿不都·艾尼拉煽动乡民参加暴乱。他串联了一百二十余人的队伍,把专区派去的3名汉族干部捆绑起来,准备杀害后再去与其他暴乱者汇合。就在这危急时刻,该区复员军人艾山和加买买提闻讯后,提起一把砍柴刀飞马赶来,孤身闯入人群,义正辞严地斥责暴徒,揭露他们的行为是暴乱犯罪,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因大多数群众都是受欺骗而来,见艾山大义凛然,说得有理有据,便纷纷放下手中武器,解救了被捆的干部。一些群众还愤怒地指责艾尼拉等人诱骗了自己,差点犯了罪,不由分说,大家一拥而上将艾尼拉等3名骨干分子捆绑结实,在艾山带领下,押送到县公安局,并把抢去的东西如数退了回来。

墨玉暴动开始后,一伙暴徒窜到墨玉县一乡一村,煽动该农业社社员参加暴乱。社主任色依提闻讯赶来,严词训斥煽动者,并语重心长地告诫社员,这是犯罪行为,农业社的社员谁也不准去,谁敢去就立刻把他抓起来送公安局。他又声色俱厉地勒令那伙暴徒,赶快滚蛋,要不就把他们都抓起来!在色依提的干预下,这伙人又恨又怕,无计可施,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在巴海率众匪徒裹胁数百群众围攻区政府时,区里的3名领导赶到了现场,

他们不顾暴徒们的嚣张气焰,临危不惧,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向受骗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暴乱阴谋,并号召群众与阴谋分子展开斗争。在这几位领导同志的坚决斗争下,大多数群众识破了煽动者的阴谋,纷纷放下武器,并协助公安部门当场逮捕了为首的骨干分子;粉碎了暴乱阴谋。

在黑力其汗暴乱期间,和田县政协副主席那斯尔阿吉等人协同公安人员前往劝阻。在现场,面对气势汹汹的暴徒,毫不畏惧,坚持说理斗争,大力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坏人阴谋。暴徒恼羞成怒,残忍施暴,杀死了手无寸铁的那斯尔阿吉及数名公安人员。那斯尔阿吉等人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血洗亮了群众的眼睛。在场群众见善良正直的阿吉眼睁睁地被人杀害,大都感到内疚,放下凶器,悄悄地离开了现场。当平暴人员赶到时,现场仅留下强硬分子六十余人,减轻了平暴压力。此外,每次暴乱发生后,都有不少犯罪分子逃离现场,但最终又在群众的检举揭发和直接协助下被捕获。第一次暴乱中,有四十余名漏网分子被检举查出,其中5人为首恶分子;第二次暴乱中有24名首恶分子被查出,由于群众的积极配合,使暴乱分子得到了应有惩罚。

在暴乱过程中,不仅各族干部群众同暴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就是被人民政府处理过的囚犯,也不与暴徒合作,有些还有改恶从善的立功表现。1954年暴徒攻打劳改队砖场时,暴乱头目依米提以为只要攻下劳改队,

打开监狱大门,犯人就会与他们一同造反,而事实与他所想的恰恰相反。犯人胡奎被迫开汽车运送暴徒,途中胡奎设法甩掉暴徒,开着汽车去和田公安处报告情况,并又开车将平暴部队送到出事地点,为及时平暴立了功。有个被迫接受了帕提丁强行发给枪支的犯人,没有放过一枪,摆脱暴徒控制后就主动跑到和田公安处交枪自首。其他被放出的犯人也都自行回到监狱。在整个暴乱中,没有一名犯人追随暴徒作乱。

和田暴乱的总头目阿不都·依米提,虽然极狡猾多诈,但是在广大群众的觉醒和检举下,最终还是从藏身的地窖里被抓获归案。在平暴过程中,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群众,使许多群众认清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真实面貌,他们纷纷站出来,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积极配合缉拿逃犯。一次,有几位维吾尔族老太太向公安人员报告了她们发现的蛛丝马迹。根据这一发现,公安人员跟踪追击,才找到了阿不都·依米提的藏身之处。当依米提被从黑洞洞、臭气熏天的地窖里抓出来时,披头散发,面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腐臭气。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绝望,他全身剧烈地颤抖着。这位在和田曾名噪一时的暴乱策划者、总指挥,如今却双目紧闭,一言不发,在灿烂的阳光,就像一摊烂泥似地瘫在地上。

和田地区坚决贯彻执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精神,紧密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平息了分裂分子发动的四

次暴乱,抓获了暴乱总策划者依米提,挖出了暴乱的根本,消灭了为害和田数年之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人民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从反面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分裂分子的犯罪事实促使群众擦亮了眼睛,辨明了是非,使他们认识到那些分裂分子是这些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根源,要想过安宁的日子,过好日子,就必须彻底铲除那些危害人民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和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自1958年开始,和田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急剧下降,各族人民在祥和的环境中安居乐业,勤奋生产,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在国家困难时期,和田人民除留足自己的粮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外,还向外地外省区调拨粮食738万公斤,为国家与人民渡过难关做出了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反分裂斗争的胜利给和田地区带来的安定环境分不开的。

##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东突党”的 出笼与覆灭

### (一)“东突党”的出笼

新疆解放以来,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在暗中搞所谓新疆“独立”和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反革命分裂活动,多次借机发难,策动暴乱及打砸抢事件,但是都被党和各族人民群众所粉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仍不甘心失败,60年代在苏联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积极活动,广泛串连,密谋成立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的反革命政党,只是慑于当时我国内反帝反霸斗争的强大声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暗中等待时机,窥测方向。“文化大革命”使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有机可乘,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操纵群众组织,以群众组织做掩护,密谋成立反革命政党,策划更大范围的民族分裂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先后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东突厥斯坦独立斗争同盟”、“东突厥斯坦青年救国军”、“青年救国军”、“复仇协会”等反革命

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则是其中最大的反革命分裂集团组织。

1967年4月至10月，“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简称“东突党”）分别在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密谋成立，起初叫“维吾尔亚（斯坦）人民革命党”，后为混淆视听，欺骗群众，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相同的名称，并把成立时间诡称为1960年11月12日（1944年11月12日是三区革命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之日）。1968年2月组成了“东突党中央委员会”，并设有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

“东突党”成立以后，趁“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泛滥之机，迅速发展组织，积极策划分裂活动和打砸抢活动。“东突党”除直接管辖的“天山复仇者”、“天山乌拉尔”、“青年组织”三个反动组织外，从1969年1月至4月，先后成立了“东突党”乌鲁木齐分部、阿勒泰分局、伊犁委员会、博尔塔拉分局、喀什南疆局等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又下设地委、县（市）委、区委、支部等78个基层组织，蔓延到全疆12个地、州、市和自治区22个区级单位。

## （二）“东突党”的纲领及其分裂破坏活动

“东突党”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的反革命分裂组织，它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鼓吹新



疆独立。它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大肆发展反革命组织,散发反革命传单,抢劫国家财产,筹集武器弹药,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图谋在我边境地区建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基地,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东突党”成立以后,由“东突党中央”和“分局”先后炮制出笼了《维吾尔亚的命运》、《东突厥人民革命党章程》、《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总纲》等反动文件,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公然宣称要“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些反动文件歪曲新疆历史,胡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叫嚣“东突党”要经常向人民宣传这一观点。这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还绘制了“东突党”的“党徽”、“党旗”和“维吾尔亚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图样。他们为了蒙骗群众,有时还搬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搞民族分裂的勾当。

“东突党”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迅速发展起来的。1968年2月,“东突党中央主席团”一出笼,就大量派遣人员,四处串连,发展组织,网罗党羽。他们利用苏联在我国东北珍宝岛和新疆塔城铁列克齐地区制造的武装入侵事件,制造和散布谣言,说什么“苏联很快就要打过来了”,竭力制造紧张气氛,并暗示人们分裂“独立”已为时不远了。他们还吹嘘“东突党已有23年的历史了”等,借以蒙骗群众,扩充组织。他们无缝不钻,无隙不乘,惯于利用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等一切社会关系网罗成员,甚至以暴力相威胁,叫嚣“不参加我们的组织就杀

头,就抄家”。他们对生活有困难者,对现实有不满者,先用金钱引诱,再施以暴力威胁,迫使参加其组织。

“东突党”在发展组织的同时,还大量印发反动刊物,主要有《火炬报》、《觉醒报》、《独立报》以及其他反动文章、传单、小册子等,并组织其成员收听苏联反华广播宣传。“东突党”的一些主要成员写了大量反动文章,极力歪曲历史,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诋毁新疆解放以来的成绩,公开鼓吹新疆独立,为分裂主义活动制造舆论。

“东突党”还积极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阴谋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为筹集活动经费,他们竟抢劫银行、仓库、商店、粮店,仅在乌鲁木齐、伊犁、克拉玛依等地,就抢劫22次,抢劫现金十余万元。他们还以收“党费”、募捐和发行“公债”的办法筹集经费。“东突党乌鲁木齐分部”居然印制了“公债券”,表现出颠覆我人民民主专政的野心已急不可耐。

“东突党”还多次指使各地党徒抢劫武器弹药及物资,为武装暴乱作准备。“阿勒泰分局”为准备暴乱,多次向“东突党中央”和苏联乞讨武器,并筹备服装、马料,绘制叛逃路线等。“博尔塔拉分局”阴谋抢劫小营房、骑兵分队和派出所的枪支后,在哈拉吐鲁克山口建立反革命武装根据地,进行反革命游击活动。“东突党伊犁委员会”、“乌鲁木齐分部”、“阿勒泰分局”还先后12次派人到

苏联、蒙古乞讨武器、电台,并要求派军事顾问。苏联间谍情报机关曾派遣间谍9批14人次携带发报机、武器和活动经费潜入新疆与“东突党”联系。

### (三)“东突党”的覆灭

“东突党”的倒行逆施,不得民心,最终陷于孤立,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1969年1月,自治区公安保卫部门组成专案侦察班子,经过周密侦察,基本掌握了“东突党”的活动情况,并获取了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这是一起解放以来发生在新疆的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反革命分裂集团案件。新疆军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立即将案件上报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汇报后,对处理这一案件当即做出了重要指示: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工作;要掌握政策,对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头头、后台,打击要狠;批判反革命集团罪行要严,处理被蒙蔽、被胁迫分子、坦白交待分子要宽;防止扩大化,防止敌人挑拨民族关系,乱咬乱供,转移视线。1970年3月,“东突党”反革命分裂集团被摧毁。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各族人民群众和民兵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为彻底粉碎“东突党”和清查“东突党”分子做出了重大贡献,奏响了军民联手平叛的一曲曲凯歌。

1969年8月20日,以“东突党南疆局”头目阿洪诺夫

为首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集团，纠集一伙叛乱分子，分别从麦盖提和喀什出发，妄图在八盘水磨汇合后，背靠苏联建立反革命武装暴乱基地。他们的反革命图谋，一开始就被我公安机关掌握，并处于广大群众和专门机关的严密监视之下。8月21日，我上级领导机关根据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报告，迅速组织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在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围剿这两股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的武装叛乱分子。

从麦盖提出发的一股叛匪不堪一击，迅速落入我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布下的天罗地网，四十多名叛匪悉数就擒。

从喀什出发的另一股叛匪行迹诡秘，去向不明。为了及时粉碎武装叛匪的阴谋，我上级领导机关迅速通知当地政府，组织民兵和人民群众，提高警惕，严密监视过往人员，掌握叛匪行迹。

阿图什县格达良公社阿沛里克大队位于克孜勒苏八盘水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山沟，当得知叛匪要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消息后，立即组织民兵和群众，严阵以待。8月22日晚12时，民兵连长的父亲在房顶上听见山脚边有脚步声，隐隐约约看到有许多人影。执勤的民兵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发现有许多皮鞋和胶鞋的脚印，断定不是本地人留下的，再加上这些人半夜行走，不敢进村，所以很可能是叛匪。执勤民兵当即派人向追击叛匪的人民解放军报告，同时组织力量跟踪追击。人民解放军在

当地群众的支援下,由民兵带路,在当地惟一的水源地发现了叛匪。解放军和民兵相互配合,迅速包围了叛匪,向顽抗的叛匪发起攻击,当场击毙包括匪首阿洪诺夫在内的5名叛匪,其余大多被捕获,仅6名叛匪向边境方向逃走。

位于边境地区的阿图什县哈拉竣公社的负责人得知叛匪向这一地区逃窜时,立即组织民兵配合解放军进行搜索。民兵们听到要追捕叛匪,都争先恐后积极报名参加,女民兵也积极请战。民兵托乎提外出回到家里,听说别的民兵抓叛匪去了,当即借了一匹马,快马加鞭追赶队伍去了。参加搜索叛匪的民兵越来越多,最后组成了有62名民兵参加的追击、搜索叛匪的队伍。民兵们个个义愤填膺,与追捕叛匪的解放军战士一起,翻山越岭,一天一夜行程七十多公里,在环境艰苦、缺水少食的情况下,人人精神饱满,斗志高昂,很快将逃窜的叛匪抓获。

在共同围剿叛匪的战斗中,军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人民热爱子弟兵的情景,随时随处都可以遇到。一次,解放军战士搜捕叛匪进入一个荒漠地区,由于缺水,行动困难。附近的群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送来水和食品,一位老大娘抱来一个大甜瓜送给亲人解放军。许多群众把自己家里的马送来了,让解放军战士骑马追击叛匪,还有的群众为解放军带路,一起参加搜捕叛匪的行动。在一次追踪叛匪的行军中,由于气候炎热,饮水奇缺,一名解放军战士把自己仅有的半壶水送给了带路的

牧民老大爷喝。老大爷很受感动，小心翼翼地从小黄梨里摸出一个包了两层手绢的大黄梨，送给了这名解放军战士。这位解放军战士接过梨子后想道，这岂止是一个梨，这分明是边疆人民热爱子弟兵的一颗心。他舍不得吃，把梨子装在包里，完成追捕叛匪任务后回到连队，他把梨子切开，分给全班战士每人一小块。小小的一块梨子，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一片深情。一天，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背着6个大甜瓜，在路上专等解放军，当路过的解放军战士给老大爷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解放军不能随便拿群众一针一线时，老大爷含着热泪说：“解放军不怕牺牲为民除害，一没损害群众的的东西，二没踏坏群众的庄稼，这瓜是我们农民送给子弟兵的，是我们对子弟兵的一片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人民群众热爱子弟兵的实际行动，对解放军战士是极大的鼓舞，个个表示决心，“要为边疆人民服务一辈子！”

通过破获、清查“东突党”反革命分裂集团的工作，使全疆各族人民受到了一次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民族观的教育，使各族人民真正认识到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就没有新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也就没有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东突党”反革命分裂活动，危害了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损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不得人心的，“东突党”的覆灭是必然的。

## 七、80年代新疆各族人民反对暴乱、动乱的斗争

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多极化格局日益明显,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些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难以阻挡,被迫调整对华政策,但是它们遏制中国发展,“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们从多方面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的幌子,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培植我们党和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以及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支持他们从事分裂国家的破坏活动。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对我国新疆的思想和政治渗透,在80年代表现得更加鲜明,更加露骨。他们从政治宣传、活动经费、武器弹药、培植叛乱人员等各方面支持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各种分裂破坏活动,并不断将各个时期从新疆逃亡国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撮合在一起,先后成立了旨在分裂中国新疆的分裂组织达数十个。

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分裂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与境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利用社会上偶发性事件或民族、宗教等方面发生的一般问题,不断挑起事端,借机闹事,丧心病狂地制造了一系列暴乱、打砸抢、非法示威游行等事件,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企图搞新疆“独立”。由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破坏活动严重地危及到新疆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同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壮丽篇章。

### **(一)闹分裂,搞暴乱,必然自取灭亡**

1981年1月,新疆的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经过长期密谋策划,拟在伽师县拼凑一个反革命组织。3月下旬,他们密谋商定,正式打出“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的旗号,下设“民族人民解放阵线”、“经济事务委员会”、“组织事务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大小头目分别冠以“主席”、“书记”、“常委”等等头衔。通过了反动的政治纲领,即“为争取在世界上有一定位置的伊斯兰国家之一——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和民族自由,领导国内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把他们(原意为异教徒,这里指汉族人)永远赶出我国,建立伊斯



兰共和国”。并提出“组织武装力量,用伊斯兰的武装对卡甫尔(原意为异教徒,这里指汉族人)帝国主义宣战”的任务,还设计了“党旗”、“国旗”的图案。在这个反动组织的策划下,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多次秘密集会,网罗党羽,刺探情报,特别是了解伽师县武器分布情况。5月24日,他们召开骨干分子会议,策划抢劫武器,攻打县城,发展反动武装的具体行动方案,公开进行分裂和颠覆破坏活动。5月26日晚,他们纠集了数百名“燎原党”党徒和暴乱分子,强迫县武装部武器保管员交出钥匙,打开枪库、弹药库,抢走各种枪支152枝、手榴弹80枚、子弹两万八千余发。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攻打县城,已发现阴谋败露,便逃到离县城3公里的沙枣林中,公然打出“东突厥斯坦燎原党”和“民族人民解放阵线”的旗号,称他们“是要把黑大爷赶出东突厥斯坦”的“一支圣战者的队伍”,妄图继续顽抗。

“5·27”武装暴乱事件发生后,我党政军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解放军、民兵和公安干警紧密配合,协同作战,采取了迅速果断措施,依靠各族人民群众,布下了天罗地网,使暴乱分子处在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在平暴过程中,由于极少数武装暴乱的骨干分子穷凶极恶,负隅顽抗,我公安人员对这一小撮暴乱分子,实行军事包围,武装打击,形成强大的威慑力,有效地制止了他们的暴行。同时,对其进行政治瓦解,先后派出公安干警、宗教人士和暴乱者的亲属数十人,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指出他们

已陷入我广大军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只有放下武器,投降自首,才能得到从宽处理,除此别无出路。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暴乱分子被迫全部缴械投降,暴乱很快平息。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策动的武装暴乱,完全违背了各族人民的意愿,他们的行为不得民心,各族人民极为愤慨,坚决反对。人民群众纷纷发表议论说:“现在党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搞了多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我们刚开始过上好日子,就要富起来了,这帮坏人一闹,影响了生产,我们坚决反对。”“现在党落实了民族宗教政策,我们很满意,这帮家伙闹事,不但影响社会安定,而且给我们宗教界造成不好影响。”“把这帮家伙抓住,我们就放心了。”各族人民协助政府,积极检举揭发暴乱分子,帮助公安部门捕获逃犯,收缴流散武器。城镇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发现6名逃犯躲在大队部,立即报告公安部门将他们一一抓获归案;许多小学生组织起来帮助解放军寻找流散的子弹;甚至还出现了父送子、哥送弟去公安部门投案自首的事例。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暴乱分子全部被收容归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器保管员的爱人,在武器被抢劫后,冒着生命危险,连夜疾跑7公里到县武装部及时做了报告,为我组织力量平息暴乱争取了时间,赶在暴乱分子攻打县城之前就做好了防暴准备,致使暴乱分子不敢轻举妄动,这就为迅速平息暴乱、减少破坏活动造成的损失奠定了基础。“5·27”武装暴乱的迅速平息,有力地打击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教育了各族人民群众

众,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的威信,各族人民群众齐声赞同平息暴乱的行动,坚决拥护人民政府依法严惩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们说:“我们有这样好的党和政府,有这样强大的军队,一小撮分裂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真是以卵击石,白日做梦。”

## (二)反汉排汉,不得人心,民族团结坚如磐石

1981年10月30日,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发生在喀什市的一件普通刑事案件(两名青年在打架斗殴中,一名汉族青年打死了另一名维吾尔族青年),借机制造事端,煽动民族仇视,挑动群众反汉排汉,组织暴徒进行疯狂的打砸抢。有十余万人口的喀什市,一时竟被打砸抢骚乱分子控制了局面,汉族居民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伙暴徒手持匕首、棍棒、皮鞭,呼喊着重:“打倒汉人”、“打倒黑大爷政府”、“维吾尔斯坦共和国万岁”一类反动口号,横行于街市,肆虐于八方,疯狂地进行打砸抢活动,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在这次打砸抢事件中有六百多名无辜汉族群众被打,其中两百多人致伤,2人死亡。暴徒们还拦截车辆,冲击机关,砸抢商店,抢劫财物,制造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极端恐怖气氛,制造了新疆和平解放以来的一次最大最猖獗的反汉排汉打砸抢事件。

在“10·30”打砸抢事件中,许多汉族群众受害是令人

痛心的。一小撮暴徒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搞打砸抢,打死打伤无辜汉族群众,制造了民族仇视,破坏了各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破坏了新疆安定团结的局面,其恶劣影响不是在一个短时间里就能消除的。

在这场动乱中,大多数少数民族干部、工人和市民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起来同一小撮暴徒和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采用各种方式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反对制造事端,反对反汉排汉,反对打砸抢,自动起来保护汉族群众,维护民族团结,涌现出大量的、难能可贵的感人事迹。

“10·30”事件发生后,喀什师范学院的领导干部立即向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做了工作,要求加强民族团结,坚决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反对搞打砸抢。当暴徒们冲进学院企图煽动少数民族教职工和学生参加打砸抢时,全院七百多名少数民族学生和二百多名教职工,都认为这种行为践踏了国家宪法,破坏了民族团结,坚决予以抵制,没有一人支持和参加打砸抢活动。体育系的一百多名少数民族师生,主动组织起来,保护学校的重要设施和要害部门。

在暴徒、分裂主义分子打人最凶恶的时候,喀什中级人民法院干部买买提·吐尔逊发现一辆拉着24名小学生的汽车被拦截,司机和学生被打散,他大声怒斥打人凶手:“你们打人是违法的,我是法院干部,饶不了你们。”并

收拢了 19 名小学生,安排在交电公司家属院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家中保护起来,以后又把他们分别送回家。他还帮助叶城县知青点一名汉族群众夺回被暴徒抢走的 2 000 元转账支票和 500 元现金。

乌斯库布衣街道办事处努尔伯希居委会居民组长帕塔木汗见到 2 名汉族妇女和 2 个汉族小孩子被暴徒追赶,立即把他们引进家中,让他们穿上少数民族服装,把他们一一护送回家。这个街道的居民塔衣尔·合加,把 7 个汉族工人藏在自己家中,把其中离他家较近的几位工人当夜护送回家,较远的几位留宿在他家中,第二天一一护送回家。

南疆建筑公司油漆工卡德尔·色以提,在人民电影院门口碰到 3 个被打伤的本单位汉族职工,他把他们背回家中,擦洗伤口,安排他们留宿,并帮他们找回丢失的自行车,然后报告公司把伤员送往医院治疗。

更值得称赞的是喀什师院各民族师生在“10·30”打砸抢事件中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民族友情。这是令人难忘、令人热血沸腾的一段真实的故事。10 月 30 日,喀什师院遭到社会上数百名受蒙蔽群众的突然袭击,使得全校师生的人身安全和国家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学生被暴徒的棍棒、石块击中,伤情惨重,鲜血染红了衣衫和课桌,惨不忍睹。数学系 81 级 13 位同学当时正在教室自修,惨遭一伙暴徒毒打,7 人身负重伤,神圣的课堂成了暴徒肆虐的场所。同学们怕引起更加严重的事态,

坚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以极其坚强的毅力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数学系系主任买买提·玉素甫带领部分师生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身躯挡住迎面而来的棍棒、石块,竭尽全力保护汉族学生。面对暴徒的嚣张气焰,他们一个个大义凛然,毫不退却,面对受蒙蔽的群众,他们尽力做好劝说诱导工作。在他们的血肉之躯的阻挡下,在他们的凛然正气的谴责下,迫使那些暴徒和受蒙蔽者退出了教室,那13位汉族学生终于幸免于难。与此同时,处在四面包围中的牛巍同学,在绝望之中跳楼而下,他一落地就被几个人围住,正在这紧张关头,数学系副主任白海提及及时赶到,他边劝说边阻挡,巧妙地掩护牛巍同学脱离危险区域。中文系77—2班的全体维吾尔族学生团结一心,保护了被一伙人包围的李老师,当那些受蒙蔽者高呼着反动口号并煽动他们闹事时,在场的同学没有一个表示赞同,也没有任何默许的表示。人们机智而沉着地应付这场严重的局面。体育系的阿不来提、努尔卡生木、阿不力米提三位老师在这场狂风恶浪之中,犹如中流砥柱,带领体育系全体民族学生,组成了一堵堵摧不垮的人墙,堵住了学生宿舍楼的四处大门,使得那些闹事者无机可乘。体育系的老师和同学,保护了宿舍楼上的几百名学生的人身安全,也保护了国家财产免遭损失。不平凡的10月30日之夜,师院虽然遭受了暴风雨般的袭击,然而民汉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团结犹如一道七色彩虹辉映师院,把师院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

喀什师院民族师生员工的正义行动,反映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暴乱、反对分裂、反对打砸抢、反对反汉排汉的,是维护民族团结,珍惜民族友情的。

### **(三)否定党的政策,制造动乱,受到各族人民的同声斥责**

1985年12月12日,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沆瀣一气,乘自治区换届选举之机,在幕后密谋策划了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的动乱。他们利用一些青年学生的无知和易于冲动的弱点,煽动乌鲁木齐地区七所高等院校两千多名维吾尔族学生上街非法游行,反对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各项大政方针,矛头指向党和人民政府。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乘机叫嚣要“汉人滚出新疆”、“新疆要独立、要自由、要主权”、“新疆独立万岁”等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煽动性口号,制造了一起严重的社会动乱事件。它干扰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干扰了领导机关的工作秩序,干扰了社会的治安秩序,对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12·12”事件发生后,新疆各高等院校的广大师生和各族人民群众,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反对动乱,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周围,做好各自的工作,共

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自治区中医学院广大师生在“12·12”事件发生后,领导带头,各民族师生团结一致,不参加非法集会,不参加非法示威游行,反对分裂,反对动乱,全院师生给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写信,表明立场,强烈要求维护正常社会秩序,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爱新疆的社会责任感。人民解放军乌鲁木齐陆军学校少数民族学员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不但自己拒绝参加非法闹事,而且多方面做好亲友和同学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以民族团结为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当有外校闹事者到陆军学校煽动少数民族学员参加非法示威游行时,他们坚决回绝,并理直气壮地说:“新疆这些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和进步,哪一点能离开国家的支持,哪一点能离开汉族同志的帮助?新疆的干部,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党的干部,新疆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新疆,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新疆,为什么老是这样分这个民族的那个民族的。你们这样闹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培养教育,也对不起苦口婆心教育我们的汉族老师。”还有多少少数民族学员自觉地抄写和翻译了有关民族政策的讲话和文献,利用一切机会和形式,做好自己的同学和亲友的思想工作。有的学员给亲友写信,教育他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参加闹事。有的学员当得知自己的亲友已参加了闹事时,当即提出严肃批评,说服他们“不要干这种蠢事、糊涂事”,并语重心长地开导:“党把我们从一个幼稚的小孩培养成一个大学生,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只有听党的



话,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学好本领,将来才能为四化多作贡献,也才能对得起党的关怀和培养。”在“12·12”事件发生后,新疆大学有位副教授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旗帜鲜明,诚心诚意做学生的劝阻工作,他所教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参加非法集会或上街游行。他对学生语重心长地说:“不是没有人来上新大,而是有很多人想来而不能来啊。国家花那么多的钱来培养你们,使你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你们应该珍惜,好好读书才对。”“要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经济上还不很发达,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国家要把你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才。应当像工厂一样,生产合格的产品,不生产废品,不生产不合格的产品。国家花那么多的钱,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你们年轻的一代一定要珍惜,决不能荒废年华,造成终生遗憾。”

在“12·12”事件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顾事实,否定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胡说国家掠夺了新疆的资源,并反对在少数民族中实行计划生育等等,企图把水搅浑,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煽动群众起来闹事。对于这些错误言行及阴谋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对。高等院校的各族师生员工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确实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新疆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相处,人民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新疆各族人

民。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的资源属于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所有，不是属于哪一个地区或哪一个民族独有。国土资源开发利用，总是在国家统筹规划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在开发新疆资源过程中，国家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支援新疆，各兄弟省区市也从物资、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给予援助，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的发展，促使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反对国家开发新疆资源，也就是反对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富裕，暴露了他们妄图把新疆分裂出去的政治野心。许多少数民族干部说：在少数民族中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盲目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这是少数民族本身繁荣、进步、发展的需要，符合少数民族的长远利益。但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蓄意反对在少数民族中实行计划生育，其目的也是要以反对党的领导，破坏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由此可见，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他们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在新疆的贯彻落实，与来自各方面的分裂言行划清界限，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新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 八、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 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起，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新疆频繁地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同时，不断强化反革命舆论宣传，利用学校讲坛和各种出版物，大肆歪曲、篡改、伪造历史，攻击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煽动民族分裂和反汉排汉情绪，鼓吹“新疆独立”。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叫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人，从1986年至1989年4年之间，相继炮制了三本书，即：《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以下简称“三本书”)。

“三本书”相继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它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对历史歪曲、篡改和伪造，散布大量破坏祖国统一、危害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搞乱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尤其毒害了一些对历史情况了解不多、涉世不深的青年。有的人拿到“三本书”，如获至宝，到处散布书中的错误观点；有的则认为“三本书”所作的“学术

贡献”不容否定；许多青年学生争相传阅，思想受到毒害。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三本书”的出笼拍手叫好，着手翻译出版，为煽动新疆独立、破坏祖国统一制造反革命舆论。可见，“三本书”所起的作用，绝非学术观点的不同认识，而是代表了客观存在的那股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思潮和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破坏民族团结、进行分裂活动，妄图把新疆从我们祖国版图分裂出去的政治需要。

1991年2月，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共同组织，召开了关于《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问题讨论会。新疆和兄弟省市的各族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少数民族文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宣传、教育、文化、出版、民族宗教等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共一百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的各民族学者、专家在认真审读“三本书”的基础上，用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对“三本书”的严重政治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深刻的批判，揭露了作者大肆歪曲、篡改、伪造历史，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丑恶面目。会议澄清了新疆历史上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有力地宣传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新疆各族人民都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这次会议，对于消除长期以来有人散布的错误的、反动的东突厥斯坦历史的流毒，提高各族人民的政治警觉性，进一步深刻认识维护祖国统一、维

护民族团结,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的重要性,对于自治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一)大气候下出笼的反面教材

吐尔贡·阿勒玛斯炮制的“三本书”相继出版发行,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当时国内外条件影响下的产物,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新疆的反映,也是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表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新疆同全国一样,存在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种斗争,又突出地表现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斗争。许多年来,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和国外以艾沙为头目的民族分裂主义集团与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相勾结,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新疆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行动,他们大肆鼓吹新疆“独立”,阴谋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妄图实现搞乱新疆、搞乱全国、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为了达到这一反动目的,他们一方面实施种种卑鄙阴谋和无耻伎俩进行反革命恐怖破坏活动,甚至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以求一逞;另一方面则从政治上、思想上、文

化上进行渗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从意识形态上打开缺口,他们披着民族、宗教的外衣,采取编写出版反动书刊,从境外偷运反动宣传画,散发反动传单,书写反动标语等手段,煽动分裂情绪,激起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竭力宣扬“我们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以此蛊惑人心,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到了80年代,西方大国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垄断传媒的优势,加快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思想渗透,利用“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严重地干涉他国内政。我国国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则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遥相呼应,打着民族和宗教的幌子干着分裂祖国的罪恶勾当。“三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炮制出笼的。

## (二)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三本书”的出现,不仅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而且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是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三本书”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新疆传播和影响的产物,是《东突厥斯坦历史》(即《东土耳其斯坦历史》)这一分裂主义的代表作在今天的翻版。

《东突厥斯坦历史》是一部向新疆鼓吹和移植泛伊斯

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作,集反动的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之大成。这部反动著作极力宣扬的基本观点主要有:(1)“民族至上”论。它夸大操突厥语系语言的诸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的时空范围及其历史作用。胡说突厥族早在9 000年前就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有横跨欧亚,其东南西北直达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的广大疆域,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2)“新疆独立”论。它肆意歪曲新疆历史,杜撰“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胡说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域各民族都是“独立”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的民族,把中原王朝和汉族等同于中国,把长城作为“划分突厥与中国”的国界,从根本上否认新疆自西汉以来即为伟大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3)“反汉排汉”论。否认我国多民族友好往来、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发展主流,把民族关系史描绘成汉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互相仇视、不断征战的历史,诬蔑汉族是“野蛮的侵略者”,诋毁中国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敌国”,汉朝统一西域是“侵占”,清朝收复新疆是“并吞”,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教徒”。(4)“泛突厥共同体”论。鼓吹所谓的突厥斯坦“革命的目的,是永远脱离中国的束缚”,叫嚷要增强东突厥斯坦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宗教信念”,妄图在新疆大地上召回已经土崩瓦解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亡灵。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敌对势力在利用各种途径向

新疆进行渗透时,不断宣扬和鼓噪这部著作的一系列反动观点,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也把这本书奉为至宝,吹捧为“科学的历史巨著”,秘密打印散发,其流毒一直在社会蔓延,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并成为当今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势力的行动指南。

### (三)“三本书”散布的主要错误观点

#### 1. 极力鼓吹民族“独立”和分裂主义

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我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同开拓了伟大祖国的疆域。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我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我们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三本书”的作者不顾历史事实,认为在历史上维吾尔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一个民族,历史上所有生活在我国北方和新疆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的古代民族,都有着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独立国家”。在《维吾尔人》一书中,作者明确地告诉读者:维吾尔“这个民族最初是他们自己的祖先和同胞匈奴人的大乌古斯——匈奴单于国、大蓝突厥汗国的组成部分,后来则建立了鄂尔罕回纥汗国、喀喇汗国、回鹘亦都护汗国、坎苏回鹘汗国、叶尔羌(赛义德)汗国等强大的国家”。这样,作者就不仅把匈奴、突厥等我国古代民族的历史直接当作了维吾尔族历



史,而且又明确地把匈奴、突厥的历史当作中国之外的历史来讲。他将南迁的匈奴称为匈奴向中国的迁徙,说匈奴等古代民族“迁入长城之内,在中国建立了国家”。在写到唐朝和突厥的关系时,更露骨地说:“有时突厥越过长城侵入中国领域,有时中国军队也越过长城侵入突厥领域。”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根本不把匈奴、突厥等看作是生活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古代民族,更不把匈奴、突厥生息和统治过的地方看作是历史上中国的领土。吐尔贡·阿勒玛斯实际上认为:“中国”只是指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汉唐王朝、“中国”的疆域仅仅限于长城之内,进而也就把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我国北部、西部地区的历史从中国的历史中割裂出去。

由此出发,“三本书”的作者把历史上维护祖国统一的本民族人物都说成是“叛徒”、“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极力鼓吹所谓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如当时归附于汉朝、为塞北与中原统一、汉匈两族和睦团结做出贡献的呼韩邪单于被作者斥为“叛徒”;而把敌视汉朝的西匈奴呼屠吾斯单于则捧上了天,吹嘘为一位“天才的军事战略家,刚毅的、自负的、爱国主义单于”和“不可战胜的英雄”。

## 2. 歪曲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散布有损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观点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相互交往、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的过程,它构成

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征。其基本内容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伟大国家。当然,毋庸讳言,在这个共同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和交往上的民族关系,有时也并不是和谐发展的,而是伴随着民族矛盾和冲突,有时甚至表现为相互争战。但是,如从民族之间的战争时间与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时间相比,则后者要比前者长得多,所以,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统一、团结、交流、进步,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三本书”的作者无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极力渲染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敌视仇杀和吞并的支流,把我国的民族关系史歪曲成一部战争史,特别是歪曲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在“三本书”中,作者把我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同中原地带的汉族政权完全等同,把汉族人建立的封建政权与汉族人民完全等同,认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地带的汉族政权和人民同各少数民族之间始终处于充满敌意的、对立的关系中,中原汉族政权或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历来是以掠夺和侵略为目的的。在作者的笔下,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与古代各少数民族之间除了不断征战之外,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始终处于充满敌意的、对立的关系之中。

“三本书”的作者还蓄意歪曲史实,别有用心地编造中原政权和汉族人的所谓挑拨离间和背信弃义。例如,

汉朝的班超出使西域活动三十多年，为国家统一和西域地区的和平积极奔走，做出重大贡献，也深得当地人民爱戴，但“三本书”的作者却恶毒地说：“班超利用塔里木盆地诸维吾尔汗国相互间的矛盾，挑动双方互斗，使他们互相征战，导致多次流血。”作者还把所谓的“土拉”和鲜卑与匈奴之间的战争，都说成是“由于汉朝的挑拨离间”。

我国历史上汉族与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多次联姻，虽发生在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但客观上有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和睦相处。但作者对此极力贬低，说汉朝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王昭君和唐朝太和公主等出嫁，是“中国帝王通过嫁给别国统治者的公主，能得知这个国家的内情，公主在陪同自己一道来的谋臣的指示下，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帝王通过嫁给别的统治者的公主所生后代的手段，为的是以后统治这个国家，使这个国家成为自己的附属国。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公主所生王子的继承王位问题，制造矛盾，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中制造不团结，将一个完整的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衰弱不堪，最后将其消灭”。

### 3. 过分夸大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维吾尔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有着值得自豪的悠久历史，在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开拓祖国疆域、缔造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程中，都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维吾尔族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新疆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被标榜为“认真负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对待历史”的吐尔贡·阿勒玛斯,却无视历史实际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论,随心所欲地过分夸大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例如,对于维吾尔族的族源问题,作者把古代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如塞、匈奴、鲜卑、柔然、“土拉”、突厥等,都说成是维吾尔族的“先民”和“同胞”,进而认为这些民族的历史也就是维吾尔族的历史,以此拉长维吾尔族的历史活动时间,扩大维吾尔族的历史活动空间。并且毫无根据地编造,距今8 000年前维吾尔人就作为一个民族生活于“中亚”;距今7 000年前,就有了农业经济,出现畜牧与农业经济并存的局面;距今4 000年前就创造了文字,“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三本书”中,作者吹嘘说:“维吾尔人的祖先在其历史上曾建立了众多强大的国家”,它们在“亚洲舞台上像狮子一样吼叫”,“使东方和西方为之震惊”,以此抬高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作者无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事实,妄断维吾尔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源,给了世界文化以“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世界文明最古老、最著名的黄金摇篮之一”,并借吹嘘之机别有用心地散布泛突厥主义的文化思想,鼓吹“共同突厥文化”的错误观点。

#### 4. 极力鼓吹和散布泛突厥主义思想观点

“三本书”不敢像《东突厥斯坦历史》那样直接提出东突厥斯坦问题,甚至还不时用几句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来装扮自己,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基本的政治立场、理论观点和《东突厥斯坦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断言维吾尔人与匈奴人、突厥人有“血缘关系”,“在起源方面互为同胞”,在“种族方面同出一源”,“创造的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民族文化”。在东突厥汗国时代,“突厥这一名称是操突厥语的种族和风俗相同或相近的维吾尔、乌古斯、柯尔克孜……等以及后来突厥化了的契丹等族共同的名称”。还宣称:包括“新疆的维吾尔人”在内的“这些突厥人民,从地理方面讲,在亚洲从东到西和西南的连成一片,伸展开去的广阔土地上生活着”,“这些突厥人民的绝大多数现在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他们的人口总数至少在一亿五千万人以上”,“这些突厥人民的语言被归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他们的种族属于白人种土兰(匈奴—突厥)型”。

关于维吾尔族的故乡,《维吾尔人》开篇第一句就是“应当坚决地断言:维吾尔人的故乡是中亚”。注意,作者所谓的“中亚”这一概念,与穆罕默德·伊敏使用的“突厥祖国”实际指的是一块地方,“它的界线西至黑海、北至阿他斯、东至日本海、南至黄河以及哈拉库木戈壁,上述广泛地区是突厥的地方”。显而易见作者所谓的“中亚”就是东突厥斯坦和西突厥斯坦的代名词。

#### (四) 义正辞严的批判

“三本书”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引起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干部、学者及群众的极大义愤,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义正辞严的批判。自治区党委领导和与会专家学者,认真审读了已译成汉文的“三本书”原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三本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错误观点,做了系统的、令人信服的剖析,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古代的地理、居民以及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的阐述。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深刻指出,吐尔贡·阿勒玛斯的“三本书”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了新疆的历史。“三本书”的要害,是否认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鼓吹独立,煽动分裂,为民族分裂主义炮制历史依据。“三本书”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东突厥斯坦历史》一脉相承,在许多问题的表述上,“三本书”就是《东突厥斯坦历史》的翻版,完全抄袭了三四十年代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的观点,并没有新的东西。他强调:“三本书”的出笼,是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必须认真地抓,抓到底,要彻底肃清它们的社会影响。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现任自治区政协主席)贾那布尔在讲话中认为:“三本书”表述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及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是通过学术的形式在史学界和文学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因而有它的复杂性和更大的蒙骗性,“三本书”是从深层次上毒害人们思想、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鸦片”。作者所承袭和鼓吹的错误观点,代表的是一股泛突厥主义的社会思潮,我们不应把它仅仅看作是作者个人的问题。他强调:对《东突厥斯坦历史》一书和《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所散布的错误观点,必须认真清理;必须彻底批驳泛突厥主义和打着“东突厥斯坦”旗号的民族分裂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要针对自治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认为,吐尔贡·阿勒玛斯编写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满篇充满了谬论和谎言,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对书中根据偏见所编织的种种唯心主义的怪想,要根据历史事实加以揭露。刘宾先生严正指出:《维吾尔人》等三本书,以伪做真,以非为是,以谬为正,颠倒黑白,把零散的错误观点体系化,组合成包括政治观、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在内的反动观念体系,用以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妄图取而代之。它们的毒化和危害作用万万不可低估,我们必须对这些反动谬论作坚决而持久的斗争。

维吾尔族学者库图鲁克·伊明在评《维吾尔人》一书的指导思想的专题发言中,严肃揭露了吐尔贡·阿勒玛斯坚持唯心史观,公开宣扬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他指出:作者根本不顾我国从秦始皇实现统一以来就是中央集权大国这一历史事实,把中国的维吾尔历史硬要写成一部“独立”史。作者无端制造了一个只有长城以内才是汉族的国家——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把历史上生活在长城以外的突厥、匈奴、维吾尔等其他民族从中国范围划出去,进而把这些民族以及他们建立的汗国和我国中央王朝的关系看作是和我国的关系,将二者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战争行为也说成是我国的侵略。作者不承认我国中央王朝派驻其他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否定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和中央王朝的归属关系,进而否定我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诋毁为实现这个统一而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而把破坏统一,反对中央王朝的人说成是“民族英雄”。库图鲁克·伊明进一步指出:从新疆的历史看,它与祖国的统一始终占主导地位,这是历史的主流;吐尔贡·阿勒玛斯大讲新疆的“独立史”,是企图煽动生活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的所谓“独立”意识,宣扬民族分裂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学术问题和对历史的不同看法,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维吾尔族学者牙生·那斯尔在评介“三本书”在民族问题上的严重错误的文章中指出,作者在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指导下,站在民族分裂主义的立场上,极力兜售大突



厥主义货色,完全表达了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政治主张,暴露了他搞分裂,闹独立,坚持民族有优劣高低之分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的真面目。

有的学者在评《匈奴简史》的专论中指出:吐尔贡·阿玛勒斯所写的《匈奴简史》,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是用民族观点(民族偏见)来观察和对待历史问题。《匈奴简史》充满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充满着匈奴族和汉族的战争、匈奴人民与汉朝人的斗争,鲜卑人与匈奴人的战争,还有其他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在连篇累牍的民族斗争和民族战争中,恰恰缺了阶级斗争。作者抽去阶级内容来谈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匈奴与汉族之间的战争,不敢正视阶级,以至全书连“阶级”这两个字也找不到。

许多专家学者在专题发言和论文中,对“三本书”的错误观点予以系统的批驳,并指出:《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错误百出,有学术思想方面的,有理论观点方面的,也有研究方法上的唯心史观。这三本书是曲解篡改以致杜撰史料、伪造历史的三本书,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的三本书,是为民族分裂主义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制造所谓历史根据的三本书。批判三本书的错误观点,肃清其影响和流毒,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

## 九、平息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

1990年4月,正当南疆各族农民掀起春耕生产热潮的时候,昆仑山下的阿克陶县巴仁乡却响起罪恶的枪声,一小撮丧心病狂的反动分子利用宗教,蒙骗和胁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策动了一起旨在分裂祖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各族人民、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民兵铸成的铜墙铁壁面前,这伙暴徒被碰得粉身碎骨,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很快被平息了。历史记载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殊死搏斗。

### (一)一小撮反动分子打着宗教旗号,策动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

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阴谋。1989年极少数坏人利用在清真寺做“乃玛孜”的机会,向教民们特别是年轻人煽动宗教狂热,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公开叫喊“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过去马列主义压宗教,现在宗教要压马列主义”。他们煽动民族仇

恨,疯狂叫嚣:“我们要进行战斗,把汉族从新疆赶出去。”要“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伙反动分子策划反革命暴乱采用的主要手段,是打着宗教的幌子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狂热。暴乱的“总指挥”则丁·玉素甫借用《古兰经》的片言只语,任意编制了一个“圣战法规”,愚弄教民,煽动民族仇杀。他编造的“圣战法规”第一条胡说,“圣战”目的“就是消灭异教徒,向异教徒发起进攻”。为此,“穆斯林的伊玛目命令任何一个人参加圣战,都必须服从”,“甚至穆斯林妇女为了自己,也必须杀敌”。

为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极少数反动分子从1989年就开始串连,拼凑反动组织,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1990年以来,这个反动组织先后开了4次会议,从组织、武器装备、人员分工等方面为暴乱做了秘密筹划,并加紧发展队伍,进行格斗训练。他们有严密的分工,有总指挥、副总指挥,有军事指挥和后勤、交通、联络指挥以及带兵打仗的指挥。这些人中有的是一贯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仇恨的反动分子,有的是杀人在逃犯,有的是劳改释放未改造好的分子,有的是惯窃。他们逼迫群众交粮捐款,共筹集现金1.3万元。他们用强收来的钱,先后购买了长刀、炸药,制造了手榴弹、炸药包,还购买了4匹马和摩托车等物资。3月中旬以后,巴仁乡少数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逐步升级,由秘密转向公开,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他们公然在清真寺院内架起高音喇叭宣传“圣战”,丧心病狂地叫嚷“要打仗”,“要在巴仁乡振兴伊

斯兰”。他们威逼群众手摸《古兰经》宣誓，在村里逼迫群众捐粮捐款，不交的群众便遭毒打；许多乡村干部、党团员和进步宗教人士受到威胁和恫吓。同时他们加紧筹集武器弹药和马匹给养，还纠集了数十名青少年，训练投弹、格斗。

3月27日伊斯兰教斋月开始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小孩上街卖酸奶子，瓦罐被他们砸碎；卖莫合烟的，烟草被倒在街上。他们还扬言，哪个妇女胆敢上街就要剪掉头发，哪个饭馆胆敢营业就要砸毁它。一时间，闹得人人恐慌不安。暴徒们发出狂言：“星期四（4月5日）我们就要把伊斯兰的旗帜插到乡里去！”

4月5日凌晨，一些反动分子便赤膊上阵了。他们纠集两百多人，打着手电筒在街上列队行进，耀武扬威，边走边念经文，然后集体做“乃玛孜”，准备闹事。他们首先围攻巴仁乡人民政府，妄图推翻乡政权，建立反革命活动的据点。

鉴于这一严重的事态，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阿克陶县立即派领导干部前往做说服教育工作，以制止事态发展。这些反动分子非但不听，反而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煽动。下午6时30分，奉命前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克州62名武警由州公安局局长带队赶到巴仁乡，在乡政府门前遭到闹事者的围攻、阻拦。武警战士进驻乡政府后，在极少数反动分子的煽惑下，约有二三百人狂呼乱叫地把干部、武警和公安干警围困在乡政府院内。

晚 8 时 40 分,闹事者开始向大门口的州、县、乡干部和武警扔石头,当即砸伤 2 人,在外面执行任务的 2 名司机也遭毒打。晚 9 时许,前来增援的喀什武警支队战士赶到巴仁乡,在乡政府门外的十字路口又遭到暴徒的袭击,两辆汽车的玻璃被砸碎,14 名武警战士、1 名公安干警和司机被打伤。武警战士下车驱散闹事的人,将车开进乡政府大院,并抓住一些带头闹事的不法分子。这时,围聚在乡政府四周的人越来越多,暴徒们又开始向武警、公安干警投掷石块。5 名奉命前去收容暴乱主要头目则丁·玉素甫的公安干警被暴徒抓去作“人质”,并抢走他们的手枪、对讲机、电警棍等,强行剥下他们的警服。晚 11 时许,武警阿克陶县边防大队副教导员许新建带领战士王景平、郭学文、卢建辉乘车前往巴仁乡执行联络任务,途经离乡政府 1 公里的大桥时,被一伙暴徒拦截,4 名武警被暴徒惨无人道地活活杀死,惨状目不忍睹。不久,喀什武警六中队副中队长艾里·牙生、班长吴勇、副班长田崇峰,乘克州政府司机阿地力驾驶的“巡洋舰”汽车,前往巴仁乡执行公务,途经该大桥时,又遭到暴徒的堵截和袭击,3 名官兵和司机都被拉下车遭到毒打。艾里·牙生被打昏绑架,吴勇、田崇峰惨遭杀害,“巡洋舰”被炸后推到桥下。

4 月 6 日零时许,暴徒用枪顶着抓去作“人质”的 5 名公安干警,通过抢去的对讲机与我方通话,要求交换被抓的人,并扬言,如不答应条件,就将 5 名干警杀死。我

方同意交换人员,但他们又不派代表前来。我方继续向暴徒宣传政策,晓以利害,劝他们悬崖勒马。几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头目对我方的规劝和警告置若罔闻,反而领着暴徒,捧着《古兰经》宣誓,并不断疯狂地叫喊,准备铤而走险。

到4点多钟,暴徒们终于孤注一掷了。他们向乡政府大院投掷了十余枚手榴弹和炸药包,并首先开了枪。武警战士董喜民、杨培忠、杜永亮当场被打伤。我武警部队开始对空鸣枪示警,暴徒们仍不收敛,继续疯狂地向院内射击、投弹,并将大院的围墙炸开3个口子。在鸣枪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武警、公安干警为了自卫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开始予以有克制的还击,击毙暴乱“总指挥”则丁·玉素甫,还将另一名爬在树上向我武警战士射击的暴徒击毙。当时,在院内的武警、公安干警有数十支枪和足够的弹药,完全有力量击退暴徒的围攻。但是,面对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混杂在一起的复杂局面,为了不伤害一个群众,武警和公安干警始终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坚持宣传政策。

6日晨8时多,增援的战士和兵团、地方的民兵,分两路到达巴仁乡,形成了对暴徒两面夹击的强大态势。暴徒一看形势不妙,立即溃散,仓皇逃窜,大部分被抓获,只有十几名暴徒携带武器逃窜。到9时50分,这场反革命武装暴乱便被一举粉碎。

## (二) 武警、公安干警和民兵英勇战斗, 平息暴乱

巴仁乡暴乱发生后, 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喀什成立了平息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指挥部。克孜勒苏自治州、喀什地区及所属各县成立了防暴指挥部, 巴仁乡成立了前线指挥部, 各指挥部都由当地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在平暴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 在各族人民群众的协助下, 以武警、公安干警、民兵为主力军, 打响了平息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战斗。

参加平暴的武警、公安干警以及兵团和地方的各族民兵, 立场坚定, 纪律严明, 执行政策, 服从指挥, 英勇战斗。在平暴中主动配合, 步调一致, 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忘我精神。面对凶残的暴徒, 他们舍生忘死, 用鲜血和生命筑起钢铁长城, 保卫人民民主政权。

4月6日凌晨4时44分, 总指挥部命令还击, 复仇的子弹开始向敌人射击。但是由于敌人首先盘踞着制高点, 对我武警部队实行交叉扫射, 给还击带来许多困难。暴徒的火力凶猛, 尤其是他们自制的手榴弹对战士们的威胁很大。在危急关头, 一线总指挥、喀什武警支队副参谋长部署兵力, 指挥若定。战士们勇敢冲锋, 抢占了还击战中的第一个制高点, 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二大队副

教导员站在第一线，不断向暴徒喊话，瓦解敌人，与敌人接上火后，他不顾个人安危，端枪向敌人猛烈进攻。在与敌人打巷战时，敌人投来的一枚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他受了伤。几个干部战士跑过来抬他时，他一再劝阻：“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消灭敌人要紧。”当听说要把他送往后方时，他忍着伤痛拒绝说：“我是带兵的，不能离开战场！”战士们含着泪把这位维吾尔族教导员抬到了附近一家院落给他包扎，鲜血不停地从伤口涌出，他昏了过去。六中队指导员指挥部队向乡政府靠近时，被一枚飞来的手榴弹炸伤，右肋间钻进了弹片，鲜血浸湿了衣衫，他忘记了疼痛，依然指挥战士们冲锋。武警克州支队副支队长和政委同 60 名武警官兵被暴徒围困在巴仁乡政府大院内，他们始终临危不惧地和暴徒展开斗争。还击战打响后，他们坚守前沿阵地，击退了暴徒们一次又一次进攻。

前线事态急剧扩大，喀什地区公安处派出取证组，前往巴仁乡取证。6 日凌晨 5 时，技术科副科长带领侦察员 3 人携带 1 台录像机、2 架照相机，在武警战士的保护下，跟随增援的武警三中队向巴仁乡进发。当取证组抵达巴仁乡时，暴徒拦截武警增援部队的仗打得正激烈，侦察员们不顾子弹在耳边呼啸，沉着冷静地将暴徒打死打伤武警战士和民兵的桩桩罪行一一摄入镜头。

为了取得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平暴指挥部迅速组成追捕小分队，乘胜追击逃窜的暴徒。克州、喀什各县及



兵团各农场积极配合,派出武警、公安干警和民兵协同作战。7日下午,我追剿小分队到达沙曼,获悉16名暴徒中有人身穿武警制服,向农民索要衣食后,向库尔干乡逃去。当晚21时,小分队轻装疾进,搜至库尔干乡,直达独立房。此时队员们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已精疲力尽,许多人双脚磨出了血泡,行走困难。为了尽快追剿堵击暴徒,决定成立马队。阿克陶县武装部部长为小分队筹措了23匹马,擅长骑术的少数民族队员踊跃参加马队。8日晨,雨雪交加,寒气逼人,这支23人的马队奔波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雪山上。雨雪浸透了他们单薄的衣裤,坚硬的马鞍将他们的双腿磨出了鲜血,但他们咬着牙,像尖刀般直插皮得力克高地。

这是一个由7户柯尔克孜族人居住的村落,偏僻荒凉,四面群山环绕。突然,西北部山脚下的石墙里出现几点晃动的人影。是暴徒!马队指挥立即部署4个小组准备围攻。

千米之外,暴徒发现我马队后,慌忙占领山坡高地,企图依靠石墙的掩护遁逃。马队分4个组迅速包抄过去。但暴徒负隅顽抗,向我开枪射击。第一组迅速逼近敌人,用强大火力掩护其他3个组跃进歼敌,一战士从左侧迂回到暴徒后面,刚打死一敌,又发现另一暴徒的手枪瞄向了战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入坑里,一脚将暴徒的手枪踢飞,高喊:“不许动!”暴徒说:“咱们都是穆斯林,何必这样?”这位战士义正辞严斥责道:“你是穆斯林

的败类!”随即将暴徒捆绑起来。

激战仍在进行。有暴徒沿石墙向山口逃窜,战士们奋不顾身前往堵击。有个战士的大腿和右额受伤了还拖着伤腿向前爬去,继续用火封锁山口。

13时30分战斗结束,6名暴徒被击毙,3名被抓获,有7人在交战前已逃跑,马队又乘胜追击,当他们得知暴徒们胁迫一牧民带路向克勒土孜方向窜去后,随即抄险路堵截敌人。

山高路陡,队员们牵着马与牦牛在柯尔克孜族牧民的带领下,艰难地行进着。不一会儿,狂风大作,雪花像坚硬的砾石打在队员的脸上。17时,小分队终于攀上了海拔4700多米高的克勒土孜冰达坂并发现了敌情。战士们继续向前冲去。在距敌约40米时,暴徒向少数民族战士大喊:“你如果是真正的穆斯林,就向身后的‘卡甫尔’(异教徒)开枪!”话音未落,一位少数民族战士射出一颗仇恨的子弹,将那个暴徒击毙。

这时,从左侧迂回包抄的阿迪里和另一个战士终于爬上了险峻的山崖,占据一个制高点,向敌人开火。激战中,阿迪里不幸头部中弹,坠下陡峭悬崖,壮烈牺牲。

小分队的战士们3天只睡了5个小时,吃了2个馕,却趟了6次冰河,行程150多公里,打了2仗,歼敌9人,抓获3人,缴获各种枪支6枝、手榴弹27枚、子弹80发以及其他物品。他们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驻在喀什的兵团农三师民兵在平暴中建立了卓著的功绩。4月6日凌晨2时,农三师接到指挥部紧急命令:农三师民兵立即投入平息阿克陶县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战斗!并命令农三师民兵于6时完成集结。农三师两百余名民兵仅一个多小时就集结完毕,乘车直奔平暴战场。凌晨8时,农三师民兵与部队同时赶到巴仁乡。看到桥头被炸毁的警车和被残害的公安、武警战士的遗体,民兵们个个义愤填膺,立即从远处向敌人包抄过去。运输公司民兵连奉命封锁一条道路,发现有十多个暴徒向西南方向逃窜。民兵连立即组织追捕,他们追到一座农舍门口,发现靠围墙一棵杏树杏花落了一地,墙头有人爬过的痕迹,立即进院搜索,在一间黑屋中抓获了喘息未定的3个暴徒。另一组民兵发现远处一农舍中有人窥探后消失,追到这座屋前,房主人神色惊慌,不让民兵进院。他们强行搜索,见一暴徒龟缩在羊群中握着长刀发抖……

与此同时,四十一团民兵配合着武警战士搜捕暴徒,一位民兵对武警战士说:“你们年轻,经验不多,我进去你们掩护。”他先后抓获2名暴徒。另一民兵听到一院中有争吵声就立即进去,发现一暴徒正要把32枚雷管藏在这户居民家中,在枪口下暴徒乖乖地交出雷管、匕首。

两天两夜的战斗中,农三师民兵共抓获暴徒十多人,缴获匕首22把、雷管32枚、大头棒2根。

### (三) 各族干部群众配合平暴部队捉拿暴乱逃犯

当我武警部队、公安干警、民兵对暴乱分子形成了强大的夹击态势之时，一度大施淫威的暴徒顿时魂飞魄散四处逃窜。可是他们终究逃不脱广大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

巴仁乡位于喀什西南，距喀什五十余公里，与喀什地区的疏附、疏勒、英吉沙3县接壤。喀什地区领导得知暴乱分子溃散逃窜的消息后十分焦虑，因为这些暴徒十分凶残，并且携带武器、炸药，随时都会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必须尽快缉拿归案。他们立即通知12个县(市)严密部署，捉拿凶犯。6日下午英吉沙县公安局报告：“有一股暴徒向英吉沙境内逃窜，请求增援！”喀什地区公安处立即组成了由政治处主任等10名公安干警参加的小分队，乘两辆警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英吉沙县公安局。接着，他们与县武装部民兵和公安人员一起出发搜捕暴徒，在水电站附近，他们发现有两个可疑的“小黑点”像爬虫一样朝山区蠕动，便立即开车追了上去。这两个“小黑点”原来是骑马逃窜的暴徒，因为马跑不动了，他们把马藏了起来，徒步向山区奔跑。小分队审问时，两名暴徒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一个队员辨认出了暴徒的特征，暴徒无奈地低头认了罪，并带着公安人员找到了藏匿的马匹。

他们决定将暴徒送到附近的艾古斯乡暂时看押。到了艾古斯乡乡政府院内,群众告诉小分队,办公室里有4个可疑的人。小分队赶到办公室,一眼就发现了两个脚穿白球鞋的暴徒,并从这两个暴徒身上搜出一个内压30发子弹的冲锋枪弹夹和一千多元现金。两名暴徒还供认:有4名同伙身上带着炸药逃窜到了附近的龙甫乡。深夜2时左右,小分队到达龙甫乡艾日克拉村。进村后,村支书主动配合小分队捉拿暴徒。小分队兵分两路:一路负责保护群众,看押俘虏;另一路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捉拿暴徒。院子里4名暴徒正在一起呼呼大睡,战士们闪电般地冲上前去,在4人的肩膀上各踩了一脚。暴徒来不及反抗,就被生擒了。

疏附县与阿克陶县毗邻,这个县的塔什米力克、铁力木、布拉克苏3个乡与阿克陶县巴仁乡接壤。巴仁乡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疏附县引起了强烈反响,使这个县顿时变成了对敌斗争的前线。“一切为了稳定”、“一切为了平暴”的口号响遍每个机关、每个乡村。没有车,县城机关几十辆大、小汽车统交指挥部调用;前线缺粮少油,粮食局的领导亲往押送;邮电局紧急动员,保证24小时线路畅通;塔什米力克乡十一村的干部群众一个晚上送来二十多匹马,以供追捕逃犯之用。

兰干乡二村四组有位个体运输户在平暴斗争开始时,曾带着自己当民兵的儿子,开上自己的车到县指挥部报到,坚决要求上前线。领导给他解释说,前线已经人齐

车足,他便要求上前线慰问,得到同意后,他买了420个饅、300个烤包子、1公斤莫合烟、2条香烟及10个手电筒,亲自开车送到前线,慰问一线干警和民兵。在那里,他又要求把儿子和车留下,参加前线战斗,经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才勉强同意离去。临走时,他还特意“挂了号”：“前线如果用车,请随时通知我!”

前线的生活异常艰苦,没有固定的住处,更没有食堂,指挥员和公安干警们3天3夜睡不成觉,也吃不上饭。县一中有位炊事员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非常不安。他自己掏钱买了1只大肥羊和200个饅,到布拉克苏一线慰问。他满怀深情地对指挥部领导说:“我不能到前线参加战斗,只好送来羊和饅表表我的心意。”

6日下午,正在疏附县塔什米力克十一村哨卡上执勤的几位公安干警和民兵,发现远处过来3个人。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立即隐蔽在农民家中,只留副村长在路口辨认,并约定好暗号:如是暴乱分子,村长就摸一下头。那3个人见前面没有哨卡,便径直走了过来。村长见确是巴仁乡的暴乱分子,就不动声色地摸摸头。房内的公安干警和民兵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冲上去,其中两个穷凶极恶的暴徒见势不妙,欲拔匕首顽抗,眼疾手快的公安战士却早已将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胸膛。

当然,敌人中不乏狡诈之徒,他们明知末日来临,却仍然作垂死挣扎。有的向山里逃窜,有的往林中藏匿,有的隐蔽于沟壑,有的避风于亲戚家里。但是,在我广大群

众千万双眼睛的严密监视下,没有一个歹徒能逃脱法网。

4月6日中午,铁日木乡农民报告,有3个行迹可疑的人在附近巴仁乡林场游动,身上好像还带着枪。接到报案后,16名公安干警和民兵奉命前往追捕。林场绵延五六公里,林中树木丛生、杂草茂密,地形极为复杂。他们一字排开向前搜索,不放过一点儿蛛丝马迹。然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仔细搜查,没有发现暴徒的踪影。他们忍着饥渴,又从场部搜索到职工住宅区,忽然,见一位妇女慌慌张张地锁了家门出来,不由唤起警觉。他们要求那妇女打开门看看,那妇女却以“丈夫外出买草,家无男人,不能开门”等理由加以拒绝。机警的公安战士透过门缝,看见拉草的驴车和驴均在院内,断定她话中有诈。于是,民警和两个民兵越门而入,从床下拖出了蜷缩成一团的3名暴徒,并从一块发面下搜出长刀2把、短刀1把。

同日下午,铁日木乡有个民兵在村口放哨时,见一个手提提包的人从巴仁乡方向疲惫地走来,便上前盘问,那人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一眼被那位民兵识破了真面目。但他怕自己身单力薄,对付不了这个亡命之徒,便故意对那人说:“我是特来接应你的穆斯林,你快到我家躲躲。”那人信以为真,便尾随他到他家中。将那人“安置”好,民兵伪称要到外面“放风”,将门反锁上,立即去乡政府报告。后查明,该犯原是巴仁乡反革命组织的骨干,曾多次进行过反革命宣传,并发展过反革命组织成员。

经过6个紧张、艰苦而令人难忘的昼夜,疏附县各族

人民终于将陆续逃来的暴徒抓获并收缴匕首、长刀、钢丝鞭、炸药包、自制手榴弹及大头棒等百余件。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对敌斗争中，各族干部旗帜鲜明，带头做好工作，为平暴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克州和喀什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从极少数坏人煽动闹事到暴乱平息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勇敢地站在第一线。克州、喀什各县的各族人民群众，坚决同党和政府站在一起，积极检举揭发坏人，积极参加追捕逃窜的暴徒，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一位从巴仁乡入伍刚 25 天的新战士和他的父亲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武警克州支队奉命赴巴仁乡执行任务时，那位新战士再三向领导请求准许他参加这次行动，4月5日下午，他随部队赶到巴仁乡。当时，乡政府门前已围满了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派去做工作的政府、公安工作人员遭到围攻谩骂。他父亲也在人群中，正劝大家不要做对不起国家的事，赶快回家种地，不要误了农时，这时他发现儿子来了，便心情沉重地上前对他说：“参加闹事的这些人很凶，你不要害怕他们，一定要服从指挥，听从领导，为保卫家乡人民的生命安全争取立功。”说完，他又回到人群中做劝导工作。随着夜色渐渐来临，暴徒们的反动气焰更加猖狂，开始在人群中呼喊反动口号，面对暴徒的疯狂行径，那位新战士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这样胡闹是没有好下场的！闹下去对你们、对国家都没什么



好处。现在正是大忙季节，你们应赶快回去种庄稼。”几个暴徒一看是他，便恶狠狠地说：“你赶快滚开，不然我怎样杀汉人就怎样杀你！”还威胁说：“你们家的人都在巴仁，你想不想让他们活？要想，就赶快滚开！”面对暴徒的威胁，那位新战士毫不惧怕地怒斥道：“你们对巴仁乡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人民会向你们清算的！”暴徒们见哄骗、威胁不成，便露出了凶残的面目。暴徒们为了发泄对那位新战士的愤恨，就把他父亲连揪带推地拉到暴徒群中殴打。在这危急时刻，支队领导立即命令武警战士从暴徒群中把他父亲抢救出来。他父亲脱险后，十分激动地对儿子说：“这些家伙十分凶残，他们还扬言要把所谓伊斯兰的旗子插到乡政府，你要同他们作坚决斗争，决不能手软。”说着他又对新兵连指导员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们了，你们放心叫我儿子干，不要担心，儿子就是死了，也不怪你们。”当战斗转入搜捕阶段后，为了不使暴徒漏网，他将认识的一些暴徒列了个名单，交给公安机关，并发动亲戚揭发暴徒，他还带人去搜捕。在他的积极协助下，有5名暴徒先后落入法网。

英吉沙县武装部部长是英吉沙县前线防暴平暴的总指挥，他一马当先，带领武警战士和民兵，按照县防暴平暴指挥部的部署，4月5日晚到与巴仁乡临近的艾古斯、龙甫、乔日旁等地，动员组织群众，设卡布哨，布下天罗地网。他反复告诫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决不能让暴乱分子漏网。在龙甫阿图什瓦克防区，他和民兵正在值

勤,突然发现前方开阔地带有两个黑点,他们赶过去盘查,确认是两名暴徒,便把他们捆绑起来。这时,一名暴徒跪在地下求饶:“我们都是穆斯林,请手下留情。”武装部长用枪对着他说:“你是什么穆斯林,你是穆斯林的败类。你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罪该万死。”暴徒只好束手就擒。这位武装部部长对敌人无比仇恨,而对人民却无限热爱,尤其是对汉族群众,更是倍加爱护。4月6日上午,他乘车前往各个哨卡,组织民兵抓暴徒,不到半天,就抓获了6个。有一个暴徒朝武装部的小车司机大声吼叫:“赶快打死他。”边喊边向这位汉族司机冲去。他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拔出手枪,厉声喝道:“你老实点!”然后命令民兵把暴徒押了下去。他想起在前方闸口处有三十多名汉族职工在施工,便带领民兵向闸口飞快地奔去,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帮助他们采取了防卫措施。接着他带领追剿分队,搜捕向山里逃窜的暴徒,山里地形复杂,气候恶劣,道路艰险,没有人带路行动将十分困难,他又主动带路,为追剿小分队胜利完成追歼任务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追捕携带枪支逃窜的暴乱分子中,不少群众积极要求做向导。追剿小分队到皮得列克村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主动提供线索,筹备饲草饲料,还有4户牧民宰羊慰劳战士。他们再三叮咛,一定要把这些暴徒消灭干净,不能让他们卷土重来,不然山里牧民不会安宁。

在追剿逃窜暴徒的过程中,沿途维吾尔、柯尔克孜族

群众为战士们无偿提供马 62 匹、牦牛 5 头、骆驼 32 峰，还有饲草、饲料。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用自己血肉筑起了一座新的长城，表达了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祖国和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崇高思想境界。

#### (四) 各族人民愤怒声讨巴仁乡武装暴乱的罪行

平息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得到全疆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和支持。克州、喀什地区及所属各县纷纷召开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反革命武装暴乱罪行。各族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极少数反动分子在巴仁乡制造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妄图推翻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分裂祖国统一，颠覆人民政权，打、砸、抢、杀手段极为残忍。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组织指挥下，驻地武警部队、公安干警、各族干部及民兵密切配合，一举平息暴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克州政协一位委员说：“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今天竟有极少数坏人企图推翻她，妄想使人民重新过苦日子，我们决不答应。解放前巴仁乡贫穷，解放后国家多方支持，经济才有了发展，1986 年被评为全国扶贫先进集体。如今暴乱发生在巴仁乡，暴乱分子是忘恩负义，罪恶滔天，对平息暴乱，我

坚决拥护，对首恶分子必须坚决严惩。”一位州政协副主席指出：“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将是一场灾难。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措施，予以平息，是十分及时的，完全正确的，深得民心的，我坚决拥护。”

阿图什市一位政协常委宗教人士说：“解放4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阿克陶县巴仁乡的分裂主义分子，搞武装暴乱罪恶滔天，破坏严重，我们必须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一位州政协委员宗教人士说：“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是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稳定、分裂祖国统一的阶级斗争，我们坚决反对。党对伊斯兰教和宗教人士非常关心，我们必须为党多作工作，维护社会的稳定。”阿图什个体工商户代表说：“巴仁乡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无论是哪个民族或宗教界人士，都是坚决反对的。汉族同胞为新疆的建设和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许多贡献，民汉之间永远是离不开的一家人。”一位州政协副主席说：“平息暴乱非常及时、非常正确、非常必要，我坚决拥护。不论是谁，不管哪个民族，只要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敌人，都要同他作坚决斗争。”广大教师、干部、工人纷纷表示这次平息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重大胜利，大长了各族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分裂主义者的反革命气焰。它再次雄辩地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坚如磐石，神圣不可侵犯。不管是什么人，打着什么旗号，只要胆敢铤而走险，进行反对党和人民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必将受到人民民主专政铁拳的严惩，只能是自取灭亡。

巴仁乡的各族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当暴乱“总指挥”则丁·玉素甫及其他暴徒被击毙的消息传来，有位年过半百的爱国宗教人士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说：“是党和政府及时平息了暴乱救了我们啊！不然别说我这老头子的脑袋要搬家，就连一般的平民百姓也都要遭殃呀！”

反对动乱，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阿克陶县巴仁乡各界人士在声讨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罪行大会上表达的共同心声。

4月30日下午，巴仁乡干部、农民、宗教界人士、中学生等一千五百余人在乡中学隆重集会，各族群众义愤填膺，愤怒声讨一小撮暴乱分子的罪行。会上，各族各界代表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控诉了暴乱分子打着振兴宗教的幌子，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裂祖国统一活动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在发言中说，这些反革命分子横行乡里，私闯民宅，毒打群众，强迫群众捐款、捐粮、捐物，筹集武装暴乱的资金和给养，威胁和迫害爱国宗教人士，胁迫群众“宣誓”，欺骗和煽惑年轻人参加暴乱，其罪行令人发指。他们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好，党的政策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策划暴乱不得人心，不能代

表巴仁乡广大群众。巴仁乡一万八千多名各族群众坚决反对暴乱,反对非法宗教活动,反对民族分裂。安定团结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这次暴乱扰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影响了春耕生产,搅得大家不得安宁,巴仁乡人深受其害。通过这一事件,巴仁乡人民更加认识到团结、稳定的重要性。他们在发言中纷纷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代表们发言时群情激奋,“愤怒声讨反革命暴乱罪行!”“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

巴仁乡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已经及时得到平息,但是它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和非常宝贵的。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在1990年5月12日召开的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全面总结了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的经验教训。他说:首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影响和破坏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国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巴仁乡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给我们上了活生生的一堂阶级斗争课,它证明分裂主义确实存在,这不是小题大作,更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铁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证明,自治区党委今年以来反复强调稳定是新疆的大局,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破坏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来自民族分裂主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对自治区客观现实的正确概括。这场惊心动魄的

斗争再次说明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不仅是长期的,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我们务必牢固树立反分裂的战略意识,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其次,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巴仁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从反面告诉我们,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对于稳定形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巴仁乡的事件有一条深刻教训,就是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无力,坏人就会乘虚而入,兴风作浪。我们要汲取这个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

再次,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文化占领农村阵地,切实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活动的管理。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但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新疆搞分裂、搞颠覆,往往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宗教的幌子,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仇恨,排斥和敌视其他民族。这是分裂主义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策动巴仁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头目就是在“振兴伊斯兰”的幌子下,通过煽动所谓“消灭异教徒”的“圣战”,欺骗和裹胁一部分群众进行闹事和发动暴乱的。这种伎俩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我们要用巴仁乡的事件,揭露、批驳暴徒们打着宗教旗号,用以蒙蔽、欺骗群众的各种口号、论点的反动本质,教育信教群众彻底与他们划清界限。要切实加强宗教的管理,维护宗教活动的正常秩序,不给坏人以

可乘之机。

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国边疆的新疆各族人民历来是坚决反对分裂的，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疆各族人民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祖国的，具有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他们过去是反分裂的主力军，今后仍然是反分裂的主力军，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 十、阿克苏地区各族人民粉碎民族分裂主义制造的系列案件

1996年2月10日至4月29日,阿克苏地区温宿、新和、沙雅、库车4个县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以分裂祖国统一、颠覆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的,针对基层干部、爱国宗教人士、汉族群众的抢枪杀人、蒙面团伙抢劫、凶杀、爆炸等恶性案件,严重地危害和破坏了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案件发生后,立即引起自治区党委、阿克苏地委和行署的高度重视,公安机关组织警力,果断而迅速地侦破了这一系列案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分子纷纷落网,受到应有的惩罚。经审理查明,这一系列恶性案件是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拼凑起来的民族分裂组织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阿克苏地区各族人民在这场反分裂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 (一)民族分裂组织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

1996年2月10日,阿吾提·阿不拉等5名歹徒身着旧式公安服装,冒充公安人员,驾驶北京2020型吉普车,携带“六四”式手枪及自制小口径手枪,先后在温宿县博孜墩农场的热买提·毛拉买提、买提尼亚孜·阿比孜等6名牧民家进行抢劫。在抢劫作案中,5名歹徒佯称自己是阿克苏市武装部、检察院、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前来收缴武器弹药,遂从热买提·毛拉买提等6名牧民家抢走“七九”式步枪3枝和猎枪2枝、各种子弹272发、猎枪底火4000发、火药1公斤、望远镜2具、人民币4000余元。当天下午5时许,温宿县公安边防大队博孜墩边防派出所在接到牧场个体司机热买提的报案后,该所指导员刘新来、警士曹世强乘坐报案司机的解放141卡车前往现场。刘新来、曹世强在现场进行调查了解后,感到案情重大,乘原车返回派出所途中发现案犯,在与案犯搏斗中2名边防武警和1名报案人均惨遭杀害。

3月22日早晨,2名蒙面歹徒手持匕首和枪支闯入新和县爱国宗教人士——热斯提清真寺伊玛目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家中将其枪杀。被害人85岁,是新和县伊协常委,清真寺主持,是一名优秀的爱国宗教人士。残害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是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

势力策划的所谓“惩处民族败类”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3月24日至4月2日在沙雅县先后发生了几起带有政治目的的蒙面抢劫案。3月24日,4名蒙面歹徒驾驶摩托车,手持匕首、斧头抢劫了县政协副主席家,抢走现金1.5万元;3月27日,该县清真寺伊玛目的家又遭蒙面歹徒抢劫,抢走现金6900余元;4月2日,该县一村长的家遭蒙面歹徒抢劫,在搏斗中村长受伤,歹徒驾车逃跑。歹徒们在抢劫作案中都声称他们抢劫钱财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组织”、为“圣战”。

4月2日凌晨,库车县阿拉哈格乡(距县城30公里)发生了一起特大恐怖杀人案件。11名歹徒手持匕首、枪支和爆炸装置,采用爆炸、枪击、刀子捅、割喉管等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死、炸死4人,杀伤3人。村党支部委员、全国劳模、古稀之年的卡吾力·托卡同妻子卡热汗刚进家门,卡热汗脸部就中了1枪,接着从外面投进来的2个炸药包,将夫妻二人炸伤。卡吾力·托卡的弟弟,村党支部委员阿吾力·托卡的家也遭到7名歹徒的袭击,阿吾力·托卡的颈部、背部被刺7刀当场死亡,其妻地里沙汗头部中弹死亡。随后,罪犯又窜到卡吾力·托卡的儿子、科技副村长安尼瓦尔·卡吾力家,安尼瓦尔·卡吾力的头部、胸部、背部、腿部分别被歹徒刺9刀,头部中1枪,安尼瓦尔的妻子热亚乃木·买买提(村计划生育委员)头部、颈部、背部分别被刺8刀,头部中2枪致死,其状惨不忍睹。暴徒又到该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加热甫·买买提明家中,6名

歹徒丧心病狂地对他连刺 7 刀致重伤。

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他们把目标对着忠心耿耿跟党走、全心全意为家乡建设辛勤工作的优秀基层干部，对着爱国爱教、反对非法宗教活动的爱国宗教人士，对着敢于和他们作斗争的普通牧民和武警战士。

## (二) 谱写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壮歌

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中，有 8 位同志壮烈牺牲。他们当中，既有共产党员、武警官兵、村干部，也有普通农牧民和爱国宗教人士。他们爱祖国、爱新疆、爱家乡，积极工作，勤恳劳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同一切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时代壮歌。

1996 年 6 月 10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热买提·毛拉买提、阿吾力·托卡、艾尼瓦尔·卡吾力、地里沙汗·吾甫尔、阿克木·斯迪克卡日、热亚乃木·买买提 6 位同志为革命烈士。1996 年 7 月 8 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部批准刘新来、曹世强为革命烈士。

热买提·毛拉买提，男，维吾尔族，1966 年 1 月出生于温宿县博孜墩牧场的一个牧民家庭，生前系温宿县博孜

墩牧场的牧民。他从小热爱集体,助人为乐,经常帮助五保户帕旦木汗老大娘拉煤、挑水、干杂活。1995年11月,博孜墩牧场干旱,一千两百多只羊被困在戈壁滩上,他主动拉水救羊,并为缺水最严重的夏坎乃提的5个羊圈拉水1个月,还免费提供汽车拉运草料,帮助牧民渡过了难关,挽回了牧场的经济损失。他坚持党的民族政策,自觉维护民族团结。1988年,他主动参加五团场煤矿特大雪崩抢险,从雪崩灾害中抢救出22名汉族职工,被农一师团党委、温宿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光荣称号。热买提·毛拉买提在大是大非面前,勇于坚持真理,伸张正义,坚持站在斗争第一线。1996年2月10日凌晨,一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博孜墩牧场作案,热买提等6户牧民遭抢劫,他出车归来得知情况后,立即驾驶自己的东风141型汽车到博孜墩边防派出所报案,并主动带领2名边防武警追捕罪犯,当追至阿克布拉克达坂时,与罪犯相遇,他以无比英勇的气概同众多罪犯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年仅30岁。一个维吾尔族的普通牧民,在堵截敌人的危急关头,赤手空拳地迎着持枪暴徒挺身冲了上去。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爱国主义精神!这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献身精神!

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男,维吾尔族,1911年1月出生于库车县老城帕克提巴扎尔,生前系新和县热斯提清真寺伊玛目。他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

会主义制度,曾当选政协新和县第一届至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新和县第一届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第二届伊斯兰教协会常委。他在任伊玛目的几十年工作中,组织广大教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并经常宣传党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在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教活动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时,他挺身而出痛斥宗教极端势力,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情况。他所主持的热斯提清真寺连续9年被评为“五好清真寺”。他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1989年4月19日热斯提清真寺发生的静坐闹事事件中,他勇敢地站出来,做正面宣传工作,并到法庭作证,揭露牙生·吐尔逊披着“宗教”外衣搞分裂破坏活动的反动行径。1994年“7·18”系列反革命爆炸案发生后,他立场坚定,理直气壮地揭露以艾沙·玉山为首的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阴谋,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劝告教民不要上敌人的当,要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由于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被民族分裂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96年3月22日清晨7时许,2名蒙面持枪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潜入他家中,将他杀害,终年85岁。

阿吾力·托卡,男,维吾尔族,1928年9月出生于库车县阿拉哈格乡,1960年6月入党。生前系库车县阿拉哈

格乡库那斯二村党支部副书记,是老党员、老模范卡吾力·托卡的弟弟。阿吾力·托卡担任村领导干部长达40年,担任库那斯村党支部领导职务长达25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一心一意跟着党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群众把昔日沙包连片、荒凉贫穷的库那斯建设成了“五星级”的林、路、渠、地规范化的高产田,成为库车县的示范田,为库那斯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阿吾力·托卡为人正直忠厚,善于团结同志,乐于助人,深受群众爱戴,他在担任村干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为个人谋点私利,想的只有农民和集体,被大伙称之为乡亲们的好贴心人、民族团结的好模范。阿吾力·托卡高度重视党支部的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和党员队伍的政治素质,增强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的能力。1990年春,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后,他立即组织党员干部揭露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和反动本质,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促进了本村的团结和稳定。由于阿吾力·托卡同志忠诚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的仇视。1996年4月29日清晨7时许,11名持枪、持刀的暴徒突然闯入他的家中行凶,他奋起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终年68岁。

地里沙汗·吾甫尔,女,维吾尔族,1934年4月出生于库车阿拉哈格乡,1960年6月入党。她从事基层妇女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长达40年之久,取得了显著成绩,

多次受到县、乡表彰。她认真组织该村妇女学习党的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妇女中广泛开展“三学三比”活动,为库那斯二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坚持不懈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走家串户,不辞辛劳,有时一天要走十多公里路程。1992年,库车县组织妇女做计划生育节育手术,由于旧观念束缚,工作阻力大,地里沙汗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她率先组织10名妇女到医院进行手术,为在全乡推广这项工作带了好头。1995年,该村有2名妇女分别到沙雅县、拜城县躲避计划生育,她知道后立即去做那两位妇女的工作,往返跋涉四百多公里路,说服这两位妇女做了节育手术。由于她工作认真负责,该村先后4次被县、乡评为计划生育工作先进村,阿克苏地区还在该村召开了地区计划生育经验交流现场会,推广了该村的经验,她本人也多次被县、乡评为优秀妇代会干部和优秀计划生育工作者。地里沙汗·吾甫尔所从事的工作受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仇视,1996年4月29日清晨7时许,民族分裂分子突然闯入她家中行凶,她奋起反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终年62岁。

艾尼瓦尔·卡吾力,男,维吾尔族,1969年3月出生于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生前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那斯二村科技副村长兼团支部书记,是老党员、老模范卡吾力·托卡的儿子。艾尼瓦尔热爱家乡,助人为乐,先后多次拿出自家的化肥、现金支援贫困村民发展生产。在担任库



那斯村团支部书记期间,除了大力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外,还结合实际给青年们讲农业技术的具体运用和推广,把团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青年们都愿意参加他组织的各项活动。有一个时期,武打片、吸毒片、带有色情的录像片开始泛滥,一些青年也跟着进行模仿。艾尼瓦尔·卡吾力针对这些情况,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了“人生应该怎样度过才有意义”的讨论活动。通过学习讨论大家提高了认识,决心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脱贫致富贡献力量。艾尼瓦尔·卡吾力担任科技副村长后,为了搞好村里农业生产,他更加注重提高自己的科技管理水平。每当县、乡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学习时,艾尼瓦尔·卡吾力总是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带上笔记本和钢笔,骑上摩托车到县里指定地点认真进行学习。他特别注意记录哪些种子出苗快、抗病虫能力强、需要施多少肥、打多少药、田间如何进行管理等,回村后马上召集全体村民,向他们详细介绍和推广这些新品种、新经验。每到春耕、春播、夏收、秋收等季节,他都要去各农家检修,把机械事故处理在农忙之前。由于艾尼瓦尔·卡吾力忠于党的事业,遭到民族分裂分子仇恨,1996年4月29日晨7时许,11名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闯入他的家中行凶,他奋起反抗,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年仅27岁。

热亚乃木·买买提,女,维吾尔族,1971年8月出生于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生前系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那斯二村计划生育干事。她积极支持本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带

头做绝育手术,并帮助妇代会做其他妇女的思想工作。她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时在田间地头,有时在家中的炕头,有时在上、下工的马路上,有时又在赶集的集市边。由于她辛勤工作,她分管一百多户人家的计划生育工作连续两年无超生,这中间,包含着多少心血和流过多少说不清的泪水啊。她与艾尼瓦尔·卡吾力结婚后,由于公公卡吾力·托卡是老支书,丈夫是村科技副村长,操劳着集体事情,事务繁多,没有时间顾及家庭,公婆又体弱多病,她一人承担起全家的家务劳动,全力支持公公、丈夫的工作,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突出贡献。热亚乃木·买买提的模范行为,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仇恨,1996年4月29日清晨7时许,她被闯入家中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杀害,年仅25岁。

刘新来,男,汉族,1964年4月出生于甘肃省张家川县龙山乡榆树村的一个农民家中,生前系温宿县公安局博孜墩派出所政治指导员。他热爱新疆,热爱祖国的边防事业。13年来,他无论是当战士还是当干部,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边防还是在机关,都始终如一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1989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学院学习,鉴于他在学校期间的突出表现和品学兼优的情况,校领导让其留校工作,他却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新疆,他把自己的理想、信念化作具体行动,无条件地全部奉献给了边防事业,奉献给了新疆各族人民。1996年2月10日凌晨,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博孜墩

边防派出所的宁静,牧民热买提报告家中被劫,刘新来和他的战友曹世强立即乘坐报案人开的141卡车赶到现场。刘新来、曹世强二人通过查看现场,询问被抢劫群众,得知5名案犯连续抢劫牧民枪支、弹药和现金等物后,乘吉普车逃离现场。刘新来分析这不是一般的抢劫案,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阴谋,决定回派出所向上级报告,在返回途中遇到一辆可疑车辆,遂上前盘查,竟遭到拒绝,该车司机驾车逃跑,刘新来指挥迅速追赶。当车行至阿克布拉克达坂时,那伙暴徒持枪顽抗,刘新来临危不惧,与战友曹世强和报案牧民热买提·毛拉提一起,同5名暴徒展开了英勇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年仅32岁。

曹世强,男,汉族,1968年12月出生于甘肃省清水县郭川乡宁川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生前系温宿县公安局博孜墩边防派出所专业警士。他热爱新疆,热爱祖国的边防事业,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专业警士,是一名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楷模。他爱惜部队的军车胜似自己的眼睛,在11年的军旅生涯中,十几年如一日,埋头苦干,练就了一身硬功夫,既当驾驶员,又是勤务兵,被部队首长、战友们誉为“最安全、最干净、最放心的驾驶员”,多次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他对待战友比兄弟还亲,为他人排忧解难,更是有口皆碑。有一次他驾车去温宿县办事,路过市建材厂,看到一位民族同志站在路中间挡他的车,曹世强下车问他为什么站在路中央挡车,那位民

族同志说：“我的汽车出了毛病，找不出故障出在什么地方，车就是发动不着，挡了几辆车，都没有停，只好出此下策，请师傅帮个忙。”曹世强一听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帮助修车，从中午1时一直修到太阳落山，才把车修好。曹世强就是这样一个乐于为他人排忧解难的革命军人。他热爱部队胜于爱自己的家，当战友们用对讲机告诉曹世强，他不满2岁的小孩已发烧3天，在家里躺着，一直有病的妻子急得团团转，催他赶快回家一趟时，曹世强却说：“现在所里只有3个人，我实在回不去，等后天支队举办的少数民族干部理论学习组结束，所里人多了，我就回去。”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他的遗言，1996年2月10日曹世强在追捕罪犯时，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我们的勇士走的是那样的匆忙，他们为了维护祖国统一而殉难，为维护民族团结而献身。勇士们的死，是对暴徒们残暴罪行的无声控诉和声讨；勇士们的死，是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阴谋和险恶的揭露；勇士们的死，擦亮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眼睛，也增强了反分裂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勇士们的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边防的安全和稳定。

### **(三)军民合力，迅速侦破和追捕暴力犯罪分子**

阿克苏地区系列暴力恐怖案件发生后，自治区及地区党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极为重视。“2·10”事件案发后，

阿克苏地区公安处立即着手成立了侦破“2·10”案件指挥部,并迅速调集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自治区公安厅工作组赶赴阿克苏地区指导案件侦破工作,同时要求各县打破地域和警种界线,全力以赴地争取早日破案。

武警阿克苏地区支队的官兵当听到一伙暴徒冒充我公安人员抢劫钱财、枪杀我边防武警和报案牧民后,纷纷报名参战,擒拿凶犯。4月9日,武警阿克苏地区支队按上级统一部署,协同公安机关对“2·10”案件罪犯可能藏匿的阿克苏市红桥居民区实施围捕。行动从4月9日凌晨2时开始至6时结束,初战告捷,抓获了“2·10”案件的有关人员3人,缴获硝酸铵炸药12.5公斤、导火索1.5米、反动录像带2盒、催泪瓦斯枪2枝及其他杀人凶器等有关证据,我参战官兵无一伤亡。4月15日,我公安机关发现“2·10”案犯阿吾提·阿不拉等人藏匿在库车县,我公安干警急速赶往库车县,搜捕“2·10”案犯,同时在通往拜城、乌鲁木齐、阿克苏的路段上设卡堵截,阿吾提·阿不拉等案犯感到在库车已无处藏身,便乘坐其同伙驾驶的红色桑塔纳车慌忙向阿克苏方向逃窜。我公安干警立即驱车拦截,坐在车右边的一名罪犯首先向外开枪,我公安干警机智地卧倒,并挥枪将一车轮胎打爆。公安干警向罪犯喊话,劝令他们缴枪投降。双方相持半个多小时,阿吾提·阿不拉等案犯拒不投降,并继续向我公安干警开枪射击。隐蔽埋伏在公路两边的公安干警、武警举枪还击,一举将车内的案犯击毙,缴获手枪、步枪、子弹、炸药、雷

管等物品多件。

“3·22”事件案发后，县政府迅速召集公安、司法、统战等有关部门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分析案情，组建了由24人组成的“3·22”专案组，迅速投入侦破和捉拿凶犯的工作。专案组干警们对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无不义愤填膺，一致表示要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尽快破案，为民除害。侦查工作一开始，专案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第一天即走访了68人，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调查范围越来越大，他们先后向两百多人做了调查，经过不分昼夜的明查暗访和群众提供的线索，发现了31名嫌疑人，经摸底排查否定了30人，最后确定了一个叫西日艾力的重要嫌疑人，通过对他的侦查又发现了两个名叫吐地·卡日和玛丽亚木·依明的嫌疑人。4月8日，专案组依法拘留西日艾力，在审讯中他装疯卖傻，拒不交待。4月10日又拘留了吐地·卡日和玛丽亚木·依明2人，他们起初试图顽抗，也拒不交待。后经强大的政策攻心，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交待了沙雅县的阿不都拉·卡斯木、买买提·阿不都拉、玉素甫·艾合买提和阿不来提·卡斯木4人杀害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的犯罪事实。原来，这4名暴徒于3月21日晚窜到新和县后，跟吐地·卡日接上头一起到西日艾力家吃了饭，临走时，阿不都拉向西日艾力要了一把匕首，从西日艾力家出来后，五个人到了玛丽亚木家。晚上11时左右，阿不都拉·卡斯木叫吐地·卡日领他去察看了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的房子。第二天早

晨,阿不都拉·卡斯木和买买提·阿不都拉两人潜伏在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的房顶上,等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出门时,从房顶跳下杀害了他。随后,又回到了玛丽亚木家,叫上玉素甫·艾合买提、阿不都拉·卡斯木两人逃往沙雅县。这4名歹徒逃到沙雅县后,继续作案。3月24日,他们窜到自治区政协委员、沙雅县政协副主席、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热木吐拉·卡日阿吉家,捆绑了他的岳父、妻子后,抢走了1.5万元现金,并威胁不许报案。3月27日晚他们又窜到沙雅县政协委员、伊协副会长家,抢走6900多元现金和一些金首饰等物品。4月11日被沙雅县公安局抓获。至此,杀害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的凶手除了玉素甫·艾合买提在逃外,其余全部抓获。

“4·29”事件案发后,库车县、阿克苏行署和自治区公安厅迅速抽调精锐干警赶赴现场,进行缜密侦查。自治区党政领导十分关注此案,指示要全力以赴,争取尽快破案。5月1日晚,公安机关依据掌握的线索,立即组织公安干警、武警中队官兵、民兵追捕罪犯。阿西木·阿不拉等9名案犯慑于我专政威力,变成惊弓之鸟,当日深夜仓皇出逃。他们一律身着夹克衫,脚穿解放鞋,统一携带装配好的爆炸装置,并带上手枪、匕首、斧头等凶器,图谋去县城进行更大的恐怖活动。当他们行至经比巴克乡附近时,爆炸装置发生自爆,3名案犯当即炸死,其他案犯被炸伤。正进行搜捕行动的公安干警、武警官兵闻讯后,火速赶到现场,将案犯团团包围。我警方发动政治攻势,敦

促案犯缴械投降,这伙丧心病狂的暴徒竟置之不理,不时向公安人员开枪射击,敌我双方展开激烈枪战。期间,又有2名暴徒先后引爆炸弹,4名案犯当场被炸死,案犯阿西木·阿不拉投掷土造炸弹,炸毁我北京吉普车1辆后,又凭借夜幕悄悄钻入警用“丰田”越野车内,炸毁该车,自己也被炸死在车内。另有一名案犯企图引爆炸弹伤害我公安干警,被公安人员当场击毙,我方无一伤亡。

现已查明,“4·29”系列凶杀案的8名案犯都参加过骨干成员牙生·阿不拉组织的暴力恐怖训练。这伙暴力恐怖分子的毙命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参战干警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重大战果,为打击暴力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受到了公安部通令嘉奖。

“4·29”事件表明: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妄图通过杀害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的老模范、老党员、老干部,制造白色恐怖,扰乱人心,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面前,他们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新疆各族人民、广大基层干部决不会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们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踏着烈士的足迹,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边疆、繁荣边疆做出更大的贡献。



## 十一、破获喀什“5·12”凶杀案

1996年5月12日清晨,古城喀什的居民们还沉浸在睡梦中。74岁高龄的阿荣汗·阿吉为着去艾提尕尔清真寺领拜,在他儿子的陪同下,早早地出门了。儿子照例用自行车推着老人前往,走了约四十多米,突然窜出3名持刀暴徒拦住去路,穷凶极恶地砍杀老人,接连捅了二十多刀。儿子奋力反抗,保护年迈的父亲,也被暴徒刺中十几刀。父子俩倒在血泊中,凶手畏罪潜逃。

阿荣汗·阿吉不仅是喀什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还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阿荣汗·阿吉遇刺,引起自治区领导高度重视,当即指示组成专家医疗小组抢救阿荣汗·阿吉父子。案件发生后,喀什地区公安处立即组织强有力的队伍投入战斗。经过半个多月的连续奋战,案件终于告破,努尔买买提、赛甫拉和阿不都拉3名犯罪嫌疑人被擒。阿荣汗·阿吉父子在自治区党政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恢复了健康,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阴谋策划、恶毒制造的“5·12”凶杀案彻底失败了,但它给人们留下了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问题。

## (一)为什么要杀害阿荣汗·阿吉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喀什的破坏活动由来已久,近年来,他们常常披着宗教的外衣,扯起“圣战”的破旗,利用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宗教的朴素感情,到处招摇撞骗,蒙蔽胁迫一些缺乏宗教知识、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他们摇旗呐喊。在这严峻的时刻,爱国宗教人士纷纷挺身而出,揭露他们妄图分裂祖国统一的狰狞面目,因此分裂主义分子恶毒地给爱国宗教人士扣上“民族败类”的帽子,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要对他们下毒手。1996年3月22日,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新和县杀害了县伊斯兰教协会常委阿克木·斯迪克卡日阿吉,然后把罪恶的黑手伸向阿荣汗·阿吉。

阿荣汗·阿吉出生于宗教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中外知名的伊斯兰学者和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界德高望重、影响极大。他从小受宗教家庭的熏陶,刻苦攻读经书,宗教学识渊博,是喀什最有名望的伊斯兰学者之一。他一贯遵循教义、教规、教法,为人正直善良,在宗教界享有崇高声望,他奉公守法,潜心宗教事业,是一名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和长老。他17岁当伊玛目,50年来一贯按《古兰经》、《圣训》喻示行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贯正确处理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坚持顺主顺圣顺当政的爱国爱教的原则,始终把自己的各种宗教活动纳入我

国宪法、法规 and 政策的允许范围以内。1986年，他参加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同年又随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出访阿联酋，并担任阿拉伯语翻译。在国外他遵守外交纪律，维护祖国尊严，积极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我国的大好形势，表现很好。同时，他还以渊博深厚的宗教学识、高尚的人格、虔诚的信仰，赢得了伊斯兰教界的好评，圆满出色地完成了出访任务。他每次登坛讲经，都以渊博的宗教学识和亲身经历教人行善、止人从恶，深得广大教民的信赖和尊敬。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了利用宗教，就千方百计地拉拢宗教人士。阿荣汗·阿吉是他们争取拉拢的主要对象。可是阿荣汗·阿吉是主持正义的、卓有见识的爱国宗教人士，不听他们那一套，不上他们的当。于是，他们采取人身攻击、造谣中伤、写匿名信、恐吓等卑鄙恶毒的手段，企图动摇他在信教群众中的地位。阿荣汗·阿吉不被威胁利诱，不顾个人安危，立场坚定地与他们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利用讲经的机会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宗教政策，用新旧社会的对比，在广大教民中大讲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大讲爱宗教必须要爱祖国的道理。他列举汉族人民为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做出的卓越贡献，揭露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鼓动“圣战”，只是为了达到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目的。阿荣汗·阿吉的言行触怒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并把他当作他们搞分裂、闹独立的一大障碍。最后，他们采取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卑劣

残暴的手段——暗杀，妄图事成之后，用他们的人取而代之。

阿荣汗·阿吉父子遇刺后，党和政府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关怀，把他们专程送到乌鲁木齐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在自治区著名医学专家的精心治疗和医护人员的细心护理下恢复了健康。1997年1月17日，阿荣汗·阿吉出席了自治区政协七届五次全委会，和各族人民见了面。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他们。2月9日，他又亲自主持了艾提尕尔清真寺1997年肉孜节会礼。

## (二)凶手是什么人

杀害阿荣汗·阿吉父子的凶手到底是些什么人？经过公安机关半个多月的连续奋战终于真相大白，凶手之一努尔买买提因拒捕，被当场击毙，另两个凶手赛甫拉和阿不都拉被捉拿归案。

努尔买买提是巴楚县阿瓦提人，从5岁起就被父母送到一个地下教经点学经。在十多年的塔里甫生涯中，接受了不少“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反动思想。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整天探听谁家有钱，谁家的鸡肥、羊肥、牛壮，偷东家，抢西家，无恶不作。有次在巴楚县城，他和几个地痞流氓把一个赶巴扎卖羊的老汉骗到县城外，强行要老汉的羊，老人不答应，努尔买买提拔出刀

子威胁说：“不给就捅死你！”老人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努尔买买提把自己辛辛苦苦养肥的羊抢走。16岁那年，努尔买买提转到喀什市一个地下教经点学经。在此期间，他不按教义、教法、教规的要求作一个堂堂正正的穆斯林，而是变本加厉，集偷抢嫖于一身，多次在疏勒、疏附、喀什流窜作恶，成了一个恶棍。有一年他在疏勒县和几个所谓“学友”到一饭馆吃抓饭，吃完饭不但不给钱，还让店主多挑几块羊肉给他们带走，店主不答应，他便拔出刀子要行凶杀人。店主无奈，只好屈服。没过多少日子，他在喀什市东湖公园附近偷了一辆自行车，卖了80元钱，然后去嫖娼。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背叛了教义、教规、教法，失去了一个穆斯林应有的品德和做人的道德，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后来，努尔买买提又流窜到乌鲁木齐鬼混，他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地下教经点，就披着塔里甫的外衣继续作恶。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这个地下教经点里，他碰见了和自己经历相同、臭味相投的赛甫拉和阿不都拉，这两个人和努尔买买提一样，都是地痞流氓，而且是乌鲁木齐一个反动组织的成员。在此之前，已在乌鲁木齐多次作恶，臭名昭著，群众恨之入骨。

这三个臭味相投的人结识以后，在赛甫拉和阿不都拉的举荐下，努尔买买提也加入了这个反动组织。反动组织的头目见努尔买买提等人来自喀什，就利用他对喀什情况比较熟悉的特点，决定派努尔买买提等人到喀什、

和田、阿克苏等地制造恐怖活动，暗杀一批爱国宗教人士。1996年2月，这个反动组织的头目与努尔买买提、赛甫拉、阿不都拉密谋，制订了行动计划，列出了暗杀名单，把阿荣汗·阿吉作为他们暗杀的主要目标。1996年4月，这三个家伙按照反动组织的指示潜入喀什，很快就与喀什的同伙取得了联系，并建立了秘密据点，制订了行动方案，多次对阿荣汗·阿吉家附近的地形及其活动规律进行了踩点和观察。3名凶手每人配带了一支小口径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并在作案前两天每人又添置了一把崭新的匕首。5月12日清晨，终于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震惊全疆的凶杀案。作案后，3名凶手及其联系人在疏勒、疏附、英吉沙等县到处躲藏。5月27日，案犯在疏勒县阿拉力乡的碱滩里被擒获，终究没有逃脱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

### **(三)谁布下天罗地网**

为缉拿“5·12”凶犯，喀什及临近县城的各族人民群众激愤，布下天罗地网。5月25日，公安部门获悉，几名案犯已逃往英吉沙县，公安、武警战士和各族群众迅速展开了强大的搜捕行动。5月27日中午，3名凶手逃到疏勒县阿拉力乡，因饥渴难忍，努尔买买提和赛甫拉到一农民家要饭要水，这位有多年党龄的农民发现两个家伙行迹可疑，在他们离去后，立刻向村、组干部汇报，又组织了

几位村民赶上去把努尔买买提和赛甫拉截住，把他们带到村委会办公室。村干部一边盘查他们的身份，一边派人到乡派出所报告。乡派出所接到报告后，所长立即驱车去卡点叫上副所长和另一位民警，三人乘车火速赶到八村。这时村口有三四十人围观。所长一行相继进入办公室，看见会计在一张桌子上算账，另外一张桌子坐有两个年轻人在吃馕喝茶，他们便上前盘问，令其交出身份证和刀子。两个人相继各交出一把刀子和一张假身份证。经过查证，他们确认这两人就是通缉在逃的刺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爱国宗教人士阿荣汗·阿吉的杀人凶手努尔买买提和赛甫拉。他们快速拿出手铐，冲上前去用左臂紧紧压住努尔买买提的颈部和右手，给其左手戴上手铐，努犯不肯就范，惊恐地叫喊：“赛甫拉，救命！”同时从左腋下掏出手枪，向右后方开了一枪。所长听到枪声，从后面抱住努尔买买提，努挣扎着又连开两枪。2名警察身受重伤，但仍与凶手搏斗，副所长阿不力米提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英勇牺牲，凶手挣脱逃跑。

当地群众得知凶手在村里出现，并再次行凶杀人的消息，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放下手中的农活，有的去找公安部门报告，有的拿起棍棒、砍土曼加入追捕的行列。一个农民开着自家的出租车和本村治安员最先向凶手逃跑的方向追去。车子开到戈壁滩上，路断了，2人跳下车跑步追赶，其中一人的鞋子跑掉了，坚硬的戈壁碎石扎破了他的双脚，鲜血染红了一个个脚印，他不顾疼痛，仍穷追

不舍,两个放羊的小孩告诉他俩,凶手藏在附近的羊群里。两位农民让小孩赶快回村子报告,他们迅速朝凶手躲藏的羊群围过去,终于发现了两个凶手的影子。他们高声喊话,让凶手投降。这两个亡命之徒竟威胁说:“我们向阿荣汗捅了刀子,还杀了两名警察,你们算什么东西,赶快滚蛋,不然当心把你全家都杀了。”罪犯边逃边向他们开枪,但两位赤手空拳的农民面无惧色,机智地边追边喊,以便引导公安、武警追踪。暴徒一举枪,两个农民便趴下;暴徒走,他们跟着走;暴徒跑,他们边追边喊。两位勇敢的农民在戈壁滩上追了二十多公里,长达三个多小时,终于把精疲力竭的暴徒逼得走投无路,躲到了英吉沙县和疏勒县交界处戈壁滩上的一处碱水塘里。

两位农民的追捕行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得到消息的公安、武警搜捕队伍迅速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当公安武警跟着喊声赶到碱水塘时,两位机智勇敢的农民正趴在碱塘边上,手拿木棒作枪,瞄着暴徒,嘴里不时发出:“啪、啪”的打枪声,两个暴徒已成惊弓之鸟,吓得躲进碱水塘中央,身子泡在碱水中,只露出两个头。

各路追捕队伍合围水塘,已成瓮中之鳖的两个暴徒仍负隅顽抗,不停地向我公安干警、武警开枪,公安、武警战士立即开枪还击,当场将努尔买买提击毙,将赛甫拉擒获,另一犯罪分子阿不都拉在逃。

在“5·12”凶杀案的追捕行动中,英吉沙和疏勒两县数万名群众、学生自发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追捕大军,



牙甫泉乡十四村的农民群众听说凶手进了树林,就把整个树林包围了起来。英叶乡 18 户有摩托车的农民自发组成了摩托车搜捕队,有的农民套上了自家的马车、驴车,主动提供给公安、武警战士使用;村里的老人、妇女烧好茶水,杀羊宰鸡做抓饭,慰问公安、武警战士。农民群众主动为公安、武警报告线索、带路,为公安、武警拉网合围提供了有利条件。当一辆警车陷在乡间小道上,公安干警还没来得及下车,就已拥上来一群农民,推的推,抬的抬,几分钟就把车抬了出来。喀什地区公安处负责同志感慨地说:“当时真有点像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支前的情景,那场面真是太壮观、太感人了。”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和天罗地网!



## 十二、平定伊宁“2·5”打砸抢骚乱事件

1997年的春节和肉孜节很难得的同时来临了。新疆西部边城伊宁格外热闹,呈现出一派喜庆的节日气氛。正当伊宁各族人民喜气洋洋置办年货、洒扫门庭、笑迎佳节之际,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打着宗教的幌子,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动了一起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

### (一)发生在边城伊宁的暴行

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发生在边城伊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蓄谋已久的。1995年以来,新疆跨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头目排祖拉和一些重要骨干多次到伊犁活动,并派出二十多名南疆籍成员以讲经为名到伊犁进行所谓“圣战”宣传,鼓吹民族分裂主义,发展成员和建立组织。1996年1月,“真主党”头目又派人潜入伊宁市、县的一些村庄,建立地下训练点,对骨干成员进行封闭式训练。1997年1月至2月初,该反动组织派出二十多名骨干在

伊犁地区各县、市进行秘密串连,确定在斋月的第27天(2月5日)在伊宁市上街游行。阿不都黑力力、阿不都米吉提等骨干分子叫嚣道:“我们要上街进行公开的宗教宣传,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成功的,都能进天堂,进了监狱也能得到真主的保佑,留在外面的人要继续干。”2月4日,阿不都米吉提对从各县赶来的参加者进行动员,口述了游行横幅的书写内容,最后确定了5日游行人员的集合时间、地点和路线。

2月5日北京时间10时30分,数百名维吾尔族青年举着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两条横幅,一条写着:“现在已经开始了。”另一条上写着:“用《古兰经》作武器,全力同异教徒作斗争。”他们先在胜利路塔西来普开市场集结,然后沿着红旗路、斯大林街、解放路非法游行。行至西大桥时,增至三百多人,沿途不断呼喊“不交税”、“不要政府的东西”等口号。12时许,约千余人集结在市人民医院门前,又打出一条横幅标语:“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天使,真主唯有一个。”继续在闹市区非法游行,公然呼喊“建立伊斯兰王国”、“驱逐汉人”等反动口号。13时左右,数百人聚集在伊犁地委、市公安局、群众电影院和红旗商厦等处门外寻衅滋事,呼喊反动口号。参加游行和闹事的人并不固定,此去彼来,时聚时散,其中夹杂着不少被裹胁蒙蔽的群众。为教育受蒙蔽者,在现场执勤的公安民警对非法游行队伍一再进行教育劝阻,但是队伍中的一伙暴徒非但不思悔改,反而以为我公

安民警软弱可欺，丧心病狂地喊叫：“如果集合游行不行，就要打人，要见一个打一个。”闹事的态势陡然升级，暴徒们手持棍棒、刀子、砖头、石块袭击在现场执勤的公安民警，打伤公安民警 12 人，砸坏警车、摩托车 4 辆，还砸、烧过往车辆，拦截殴打过路群众。暴徒们把一名汉族司机驾驶的桑塔纳轿车推翻砸坏，纵火烧掉了红旗商厦前面的一个鞭炮摊点，在白都拉清真寺附近砸坏一辆面包车，将汉族司机打成重伤。暴徒们还用石头、砖块砸坏了州供销社沿街住宅楼、州市工商局办公楼的部分窗户玻璃，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直到我公安干警采取分割隔离和驱散队伍、拘捕骨干分子等强制性措施后，事态才于北京时间 22 时平息。

2 月 6 日，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除继续组织非法游行、聚众闹事外，更加疯狂地进行打砸抢活动。暴徒们声嘶力竭地喊着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视、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口号，见汉族群众就打，遇汉族同志开的车就砸就烧，谁阻止他们的破坏活动就打谁、杀谁，杀人放火，无所顾忌。一伙暴徒在胜利路被服厂门前，用石头、棍棒把一位五十多岁的汉族人活活打死。在市人民医院十字路口，2 名汉族人横遭暴徒毒打，其中一名被打得遍体鳞伤，气绝倒地，当场死亡，另一名被打成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暴徒们还在团结靴鞋厂门前用石头把 1 名汉族人活活砸死，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在前进街路口将 1 名汉族人打死后，残忍地把尸体扔进火堆里

焚烧。在我公安武警官兵采取强制措施后,不甘心失败的暴徒们从当天夜里起到9日,分成许多小股窜入小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继续打砸抢烧杀。7日,一小股暴徒趁着黑夜在农四师砖瓦厂对1名汉族群众连捅8刀,造成重伤。另一小股暴徒闯入塔什库勒克乡的2户汉族农民家中,将6人打成重伤。

据初步统计,在这次打砸抢严重骚乱事件中,198名无辜群众被打伤,其中50名重伤;7名汉族群众被残杀;公安武警官兵30人被打伤,其中重伤14人;过往汽车24辆被砸坏,过往汽车6辆、警车9辆、民房2间被烧毁。严重破坏了伊犁地区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和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给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了重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 (二)奏响反分裂斗争的胜利凯歌

伊宁“2·5”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发生后,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处置的原则和措施,并派出区党委工作组前往伊宁,指导和协助当地政府平息事态。伊犁州、地、市迅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组成的联合指挥部和前线指挥部,统一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于是,一场平暴斗争在伊宁市各族人民坚决拥护和支持下,全方位地展开了。

2月5日至6日,伊宁市市长甫拉提·吾买尔、伊犁

地区专员库尔班江先后发表电视讲话,将打砸抢严重骚乱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号召各族干部群众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上当受骗,旗帜鲜明地站稳立场,积极投身于反对分裂、坚决制止打砸抢烧杀的斗争中去。警告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立即停止犯罪,投案自首,以争取宽大处理。伊宁市人民政府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介先后发布了告全体市民的第一、二、三、四号公告,并把公告张贴到了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当地的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介对这伙暴徒的打砸抢烧杀罪恶行为及时进行了报道。伊犁州、地、市3家党政机关还专门抽调450名各族干部组成若干个工作组深入到伊宁市的街道、乡村和居民点公布事实真相,揭露暴徒的罪行,教育和发动群众。这些措施使全市各族干部群众迅速了解到事实真相,极大地孤立了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取得平暴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鉴于这次打砸抢骚乱事件来势猛、情况复杂等特点以及非法游行队伍里夹杂着不少被裹胁、被蒙蔽的群众和围观人员,暴徒在与我公安武警官兵对峙时又阴险地将许多天真无邪的孩子推到最前面,给平暴斗争带来了很大困难。为了不误伤无辜群众和孩子,我执勤公安干警先是进行劝阻,直到非法游行队伍中的暴徒公然用棍棒、刀子、石头进行武力对抗,殴打无辜过路群众,砸毁和焚烧过往车辆时,才对非法游行队伍强行分割隔离,予以驱散,拘留了一批进行打砸抢的暴徒,当场抓获了这次事

件的直接组织、指挥者阿不都黑力力和阿不都米吉提。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不肯就此罢休，继续聚众闹事，不仅组织一批暴徒冲击伊宁市公安局，而且将在这次平暴斗争中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派小股暴徒闯入这些少数民族干警家中企图行凶。为把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我公安武警官兵奉命从当天起对伊宁市的主要街道和闹市区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人员、车辆出入伊宁市，对市区所有的行人和车辆进行盘查，使事态在北京时间 22 时左右得到平息。

2月6日，针对不甘心失败的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继续聚众在主要街道上非法游行、起哄闹事并更疯狂地进行打砸抢烧杀的情况，我公安武警官兵果断地采取了分段隔离、当场拘捕一批暴徒等强制措施。对仍在搞打砸抢烧杀的暴徒首先是鸣枪警告，在鸣枪警告无效情况下开枪击毙了 1 名暴徒、击伤数名暴徒，从而极大地震慑了暴徒，使大规模的打砸抢骚乱得以彻底平息。但坚持与我为敌的暴徒们化整为零，一小股一小股地窜到背街小巷和城乡结合部继续打砸抢烧杀。为此，我公安武警官兵、农四师民兵一方面日夜巡逻执勤在主要街道，并对电厂、飞机场、自来水厂、邮电通讯、伊犁河大桥、电视台、广播电台等重要设施和党政机关进行重点保护。另一方面组织了 21 支武装小分队，每支小分队配备几部汽车，暴徒在哪里捣乱，小分队就迅速赶到哪里去制止。

为了使伊宁市各族人民能安心地过好春节、肉孜节,挫败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继续搞破坏的图谋,展示我人民武装的强大威力,8日上午,公安武警官兵和农四师武装民兵在伊宁市联合进行了防暴演习。一架架武装直升飞机在蓝天中盘旋,一辆辆满载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官兵、农四师武装民兵的汽车在警车开道下缓缓驶过主要街道。

在我公安武警官兵、农四师武装民兵的协同作战下,进行打砸抢烧杀的暴徒纷纷落入法网。2月8日晚,我公安干警得知以阿不都热扎克莫明为首的一伙暴徒潜藏在伊宁县愉其翁乡时,顶风冒雪连夜前往抓捕。这伙早有准备的暴徒手持匕首、利斧、铁锹进行顽抗,将我4名公安干警打伤,其中2人重伤,抢走“五四”式手枪1枝,纵火焚烧了1辆警车,还向公安干警开枪射击,并冲进住在街对面的一户汉族村民家,惨无人道地杀死3人、重伤2人。前来增援的武警官兵迅速包围了暴徒,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对负隅顽抗的暴徒进行了坚决镇压,取得了重大胜利。

经公安武警官兵和农四师武警民兵的连续作战,终于给伊宁市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2月9日,是新春佳节的第三天、肉孜节的第一天,早晨,数万名各族穆斯林兴高采烈地走出家门从四面八方来到市区和各乡镇的清真寺,秩序井然地做肉孜节“乃玛孜”。事毕,大家互相握手问候。之后,依照风俗习惯前往坟地怀念故去的亲人。



肉孜节的平安到来,标志着平暴斗争在伊宁市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伊宁市的社会治安秩序和各族人民生活、工作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 (三)各族人民坚决支持反分裂斗争

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动的伊宁市“2·5”打砸抢严重骚乱事件,遭到了伊宁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事件发生前有人以宣讲《古兰经》为名,在巴彦岱镇进行非法串联,在一家餐馆里大肆攻击党和政府,说什么“人民币”、“驾驶证”、“结婚证”、“营业执照”、“身份证”都是“卡日拉”,让这家餐馆老板把自己的这些证件烧掉,跟他们一起干。这家餐馆老板不仅坚决拒绝,而且把这伙人痛骂一顿后从餐馆轰了出去。巴彦岱镇墩麻扎村和铁厂沟的各族村民和宗教人士也把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派来搞非法串联的人赶出了村子。

严重打砸抢骚乱事件发生后,各族人民群众对此十分气愤,纷纷主动参加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接受记者采访,找当地政府与党组织谈心表态,谴责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暴行,表示支持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要积极地做好对自己家人、亲戚、朋友的宣传教育工作,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伊宁市各清真寺的伊玛目们说:“春节、肉孜节本是各族人民探亲访友、合家欢聚的日子,现在却被这些坏分子搅

得一塌糊涂,这些坏分子根本就代表不了我们的民族,他们的所作所为给祖国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希望政府尽快把这些坏分子抓起来,我们要向各族穆斯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大家了解这次事件的真相。”伊玛目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各族穆斯林说明这次事件的真相,告诚信教群众:“一定要按照国家法规从事合法宗教活动,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安定了,大家日常生活才不会受影响,才能正常地从事宗教活动。”一位维吾尔族农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敞开心扉地说:“社会安宁了,大家才能心情愉快地过年。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过年就不像个过年的样子,我连饭都吃不香,觉也睡不踏实。眼看就要开春播种,我们农民迫切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巴彦岱的维吾尔族群众纷纷找乡党委和乡政府表态,坚决拥护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并向全镇各族人民发出了不做损害民族团结的事、不说损害民族团结的话的倡议。

为协助党和政府迅速平定这次打砸抢骚乱事件,伊宁市各族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检举揭发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侦破线索,帮助公安武警官兵搜捕漏网暴徒。根据群众举报,公安武警官兵将以阿不都热扎克莫明为首的漏网暴徒包围,当场击毙负隅顽抗的暴徒,抓获其余9名暴徒。在市区,各族群众组织了防暴纠察队,在郊区的各乡、镇、场和所属村(队)也成立了治安联防组,

为维护伊宁市的社会治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托乎拉克乡卡拉亚村的农民在新老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积极做好本村的治安工作。以维吾尔族民兵为主的治安联防组日夜巡逻在村里村外,新老村党支部书记还分赴村里汉族农民家中做安慰工作,告诉他们:“你们好好过年,不要担心害怕,我们民兵联防组给你们站岗放哨。”汉族农民十分感动,纷纷拿出自己家中过春节的食品前去慰问维吾尔族民兵联防队员。巴彦岱镇墩麻扎村的汉族农民自发成立“十户一保”组织后,该村维吾尔族农民不断去找汉族居民组组长,要求参加进来,说这样语言通、信息灵,更能发挥出“十户一保”组织的作用。

在打砸抢骚乱事件中,暴徒们把居住在当地的汉族居民视为眼中钉,叫嚣要“驱逐汉人”,把打砸抢烧杀的主要目标对准了汉族群众。但是伊宁各族人民历来和睦相处,在共同开发和保卫边疆的进程中建立了水乳交融、同甘共苦的手足之情,这种感情决不是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能破坏的。当暴徒们丧心病狂地殴打无辜汉族群众时,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挺身而出予以斥责和制止,其中不少人因此而被暴徒打伤。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和救助汉族群众。2月5日下午,伊宁市蔬菜公司职工张军在蓝天商场门前,遭到一伙暴徒袭击。这伙暴徒用石头、砖头把张军砸倒在地,抢走他身上的五百多元现金和自行车后扬长而去。一位过路的维吾尔族青年将浑身是血的张军

救了起来,拉到附近家属院里给他包扎好伤口,又跑到街上察看了一会儿动静,直到街上安定了才回来对张军亲热地说:“好兄弟,可以回家了。”张军获救后激动地告诉家人:“我从心底里感激这位救了我一命的维吾尔族好兄弟!”同一天,伊宁市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汉族女干部梁华勤也在数名维吾尔族群众的帮助下,平安地回到了自己家中。事情是这样的:去基层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梁华勤返回市区途中,在花果山附近遭暴徒袭击,一位维吾尔族老大娘见状迅速地把她藏在家中。半小时后,另一家维吾尔族兄妹3人又将她转移到自己家中,一再安慰她不要紧张害怕,并给做了可口的饭菜,直到街上平静了,才亲自护送梁华勤回家。

2月6日这天,打砸抢愈演愈烈,暴徒们疯狂地四处拦截并殴打无辜汉族群众。面对凶恶的暴徒,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没有胆怯,继续保护和救助汉族群众。一位维吾尔族中年妇女在伊宁街头发现一伙暴徒正在追杀伊宁市鞋帽厂汉族职工冯大海,便寻机把受伤的冯大海藏在自己家中,又让丈夫及时送他去医院治疗,使冯大海死里逃生。进城采购年货的塔什库勒克乡二村汉族农民姜福军一家也是在数位维吾尔族群众的帮助下平安脱险的。当时姜福军一家途经新华医院门前,一伙暴徒正在那里打砸抢、拦截无辜汉族群众,情况十分危险,这时2名与姜福军互不相识的维吾尔族群众,主动把姜福军一家人藏在自己家中。家住前进街的一位维吾尔族老大娘目睹

街上暴徒们的凶残行为后十分气愤,她主动到同住在一个院的6户汉族群众家中进行安慰,叮嘱他们这几天不要出门,并吩咐家人给他们代购每天生活必需的蔬菜和食品,自己还天天站在大院门口察看动静,为他们站岗放哨。有名维吾尔族干部得知伊宁市鞋帽厂职工被打,邻街房屋被烧,就立即赶到厂里了解情况,进行安排,返回途中在市人民医院附近看见1名汉族群众暴尸街头,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公安部门,当他听到市爱卫会汉族会计的儿子被暴徒打死,尸体停放在医院,家人不敢去看望的消息后,他立即向死者家人表示慰问,并代表死者家人去医院处理后事。郊区的维吾尔族农民得知市区发生了打砸抢骚乱的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塔什库勒克乡的一位维吾尔族青年把本村的汉族孤寡老人郭顺福接到家中一同吃住,直到事件平息后才放心地让老人回去。这个乡有位维吾尔族老大爷发现本村有户汉族农民,家里3人被暴徒打伤,伤势很重,毅然赶起自家的毛驴车,让3位受伤者躺在车上,为安全起见用旧棉被盖上做掩护,亲自送他们去医院。途中遇到一伙暴徒,当暴徒问老人:“车上拉的什么?”老人机智地说:“拉的白菜。”就这样,老人把他们安全地送到他们的亲属家中,并同他们的亲属一起又送他们到医院治疗。还有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他的邻居是从河南来打工的汉族夫妇,老人对这对汉族夫妇亲切地说:“不用担心,有我们在,我们会帮助你俩的,我们是一家人嘛。”

经历过严冬的人,倍感春天的温暖。在打砸抢骚乱事件中,吃够了苦头的伊宁市各族人民深知子弟兵是反分裂斗争的钢铁长城,是人民生命财产的忠实保护者。当2月8日上午,公安武警官兵、农四师民兵在伊宁市联合举行防暴军事演习时,成千上万的各族干部群众走出家门,拥上街头热烈鼓掌夹道欢迎,不断高呼“人民武装警察万岁!”“坚决打击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防暴演习大快人心!”等口号,许多人还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为尽快平息事态,让各族人民过好春节和肉孜节,确保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武警官兵、农四师民兵不畏严寒,不怕流血,风餐露宿、日以继夜地巡逻执勤在伊宁市的大街小巷。伊宁市各族干部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自发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慰问人民子弟兵活动。一时间,只见机关单位、学校医院、厂矿企业、普通市民纷纷捐款捐物,不仅给在第一线执勤的子弟兵送去了大米、面粉、羊肉、蔬菜、罐头、饮料、馕等慰问品,而且送医送药、写慰问信、演节目、赠锦旗,许多市民还提着自家做好的热饭热菜和滚烫的奶茶去慰问执勤的子弟兵。伊犁州水泥厂职工看到在该厂附近巡逻的官兵没有取暖的煤炭,除送去慰问品外特意拉去了两卡车煤炭。伊犁州友谊医院的医护人员在送去慰问品同时,还送医送药上门。伊犁师范学院各族师生坚持给在学院附近巡逻的官兵送汤送饭,并怀着敬佩的心情赠送了一面书写着:“平息暴乱,威镇伊宁”的锦旗。伊犁州百货公司职工发

现在单位附近执勤的武警官兵夜里在一间没电没取暖设施的仓库里轮流休息时,马上腾出一大间房子,通上电、生好炉子,让官兵们夜里能休息好。在巴彦岱镇,一位维吾尔族老人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做了满满一锅抓饭去慰问镇上执勤的武警官兵。喀尔墩乡的3名维吾尔族农民也给第一线官兵送去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和取暖用的煤炭、炉子,并对官兵们说:“天冷,你们很辛苦,我们是一家人,所以送些东西来表示一下心意,我们相信有党、政府和军队在,事态一定能平息下去。”有一位菜农含着眼泪,执意要将满满一架子车的黄瓜、西红柿、蘑菇、白菜、菠菜、辣椒、粉条、豆腐等蔬菜副食品和30公斤带鱼、20公斤香蕉送给一线官兵以示慰问,当官兵们说什么都不收时,这位菜农哽咽地说:“为了保卫我们老百姓,你们整天站在寒冷的街头,这么辛苦,我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感谢你们,希望你们能收下这点心意。”说完扭头就走,说什么都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

发生在伊宁街头的这一幕幕感人场面和一个个动人故事,充分说明了各族人民的的确是我们进行反分裂斗争的重要力量、坚强后盾。只要我们最大限度地团结依靠各族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分裂斗争统一战线,就能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后 记

党中央对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极为重视,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部署。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并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决定派工作队到重点地区,协助当地党政机关开展集中整治治安、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斗争;坚决维护新疆的稳定,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为配合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的需要,我们编写了《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史话》。这本书从1840年以来,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发生在新疆境内重大的反分裂斗争(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收集困难,尚有一些重大事件未能成稿,只有留待再版时予以补充、增订了)。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地粉碎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和暴乱活动,维护了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保护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从而,更加激发我们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仇恨,更加激励我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地与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我们也要永远纪念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学习他们忠于



祖国、忠于人民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徐玉圻、陈奕善(前言),朱少华(一),朱杨桂(二),顿时春(三),杨芊(四),刘向晖(五),张旭凯(六、七),柴鸿鸣(八),谢敏(九、十一),冯建江(十),祁若雄(十二)等同志。

本书稿于1997年3月开始编写,初稿写出后由主编徐玉圻、副主编陈奕善反复修改、补充、统稿,于1998年底定稿。最后,由陈统渭、单玉兴同志审定。

由于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情况比较复杂,资料收集不全,作者水平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请各方面人士不吝赐教

编者

1999年2月



+



责任校对

李玉新 ◆ 赵珍

# 新疆

## 反对 民族 分裂 主义

主 编 / 徐玉圻  
副主编 / 陈奕善

### 斗争史话

ISBN 7-228-05108-4



9 787228 051083 >

XJ0-0077501

ISBN 7-228-05108-4  
D·555 定价:12.00元